

中共党史资料

1956-1967 年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和中心问题名称一览

新中国派出的第一批留学生

《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出台的前前后后

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一个转折点

雷任民与 1954 年日内瓦会议

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始末

人民解放军“三支两军”述略

1975 年教育界的斗争

赫鲁晓夫眼中的毛泽东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央档案馆

70

总第七十辑

1999 年 6 月出版

中共党史资料

第七十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9年·北京

主 编：李海文

副 主 编：杨公之
陈 夕

文献编辑：罗一恒

责任编辑：傅 頔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共党史资料 第70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6
ISBN 7-80136-264-0

I. 中… II. ①中… ②中… III. 中国共产党—党史—史料 N. D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17181号

中 共 党 史 资 料 (70 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 央 档 案 馆 编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通讯处:北京 9723 信箱 邮编:100029

地址:北京朝阳区安外小关东里10号院(北门10号楼)

电话:(010)64946059 传真:(010)64968014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北京朝阳科普印刷厂

850×1168毫米 32开 7.125印张 160千字

1999年6月北京第1版 199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3000册

ISBN 7 80136 264 0·K·230

定 价:10.00元

目 录

文献资料

1956—1967 年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和中心问题

名称一览 (1)

附: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编制 王晓峰(5)

回忆录

新中国派出的第一批留学生 骆亦粟(9)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北大工作组 张承先(16)

《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出台的前前后后 方玄初(45)

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一个转折点 蒋本良(53)

专题资料

雷任民与 1954 年日内瓦会议 王红续(63)

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始末 卜伟华(96)

人民解放军“三支两军”述略 邓礼峰(128)

1975 年教育界的斗争 张 化(143)

人物介绍

- 听刘少奇讲他第一次去俄国 温济泽 (161)
西北革命的播火者——王懋廷 高哲中 薛生德 (163)

史实考证

- 赵世炎是中共一大前党员 鲜于浩 (171)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鲜为人知的外文刊物 程慎元 (175)

译文选登

- 赫鲁晓夫眼中的毛泽东
——俄文版《赫鲁晓夫回忆录》选译(一) 马贵凡 译 (181)
《中共党史资料》61—70辑目录索引 (217)

封面照片：1956年6月14日，毛泽东等领导人接见编制
《十二年科学规划》的科学家们

目 录

文献资料

1956—1967 年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和中心问题

- 名称一览 (1)
- 附：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编制 王晓峰(5)

回忆录

- 新中国派出的第一批留学生 骆亦秉(9)
-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北大工作组 张承先(16)
- 《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出台的前前后后 方玄初(45)
- 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一个转折点 蒋本良(53)

专题资料

- 雷任民与 1954 年日内瓦会议 王红续(63)
- 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始末 卜伟华(96)
- 人民解放军“三支两军”述略 邓礼峰(128)
- 1975 年教育界的斗争 张 化(143)

研究

- 第七项 中国海洋的综合调查及其开发方案
- 第八项 提高气象预报的准确率,发展全国气象工作
- 第九项 我国矿产分布规律和矿产的预测
- 第一〇项 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和其他地质勘探方法的掌握
与新方法的研究
- 第一一项 高效率的采矿方法的研究
- 第一二项 先进的选矿方法和共生矿利用的研究
- 第一三项 强化现有的并探索新的黑色金属的冶金过程
- 第一四项 强化现有的并探索新的有色和轻金属的冶金过程
- 第一五项 合金钢及特种合金系统的建立
- 第一六项 钛冶金及其合金
- 第一七项 发现并开发我国石油和天然气资源
- 第一八项 扩大液体燃料及润滑剂的来源
- 第一九项 可燃矿物作为燃料及化工原料的综合利用
- 第二〇项 全国能源的合理利用和动力技术的研究
- 第二一项 发电厂和电力网的合理配置与运行,全国统一动力系统的建立
- 第二二项 掌握现有的并研究新的、更完善的工业、运输业各部门的机器器械,特别是巨型机器器械的制造
- 第二三项 掌握并研究高效率、高精密度和高材料利用率的材料加工过程
- 第二四项 机器和工具使用期限的延长方法,特别是金属防腐问题的研究
- 第二五项 稀有和分散元素的开采、提取和利用
- 第二六项 改进现有的水泥、耐火材料、陶瓷和玻璃的性能并制造新型产品

- 第二七项 矿物肥料、农业药剂和重无机化学产品的生产过程的研究
- 第二八项 重有机化学产品和高分子化合物的生产过程的研究及其应用范围的扩大
- 第二九项 轻工业新技术的建立
- 第三〇项 区域规划、城市建设和建筑创作问题的综合研究
- 第三一项 建筑工业化问题的综合研究
- 第三二项 大型水工建筑物和水利枢纽的建设问题
- 第三三项 中国地震活动及其灾害防御的研究
- 第三四项 建立统一的、更完善的通信系统和广播系统
- 第三五项 运输装备新技术的研究和综合发展运输问题
- 第三六项 原子能的和平利用
- 第三七项 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
- 第三八项 无线电电子学的研究和新的应用
- 第三九项 生产过程的机械化和自动化
- 第四〇项 半导体技术的建立
- 第四一项 计算技术的建立
- 第四二项 改进电和超声的技术并扩大其应用范围
- 第四三项 国防上的一些问题
- 第四四项 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和农业机械的制造问题
- 第四五项 提高农作物单位面积年产量
- 第四六项 荒地开发问题
- 第四七项 扩大森林资源及森林的合理经营和合理利用
- 第四八项 提高畜牧业、水产业和养蚕业的产量和质量问题
- 第四九项 防治我国人民主要疾病的综合措施的研究
- 第五〇项 掌握生产现有的和研究新的抗生素、药物和医学器材

- 第五一项 总结和发扬中医的理论和经验
- 第五二项 劳动卫生、劳动保护的综合措施及防治主要职业病的
研究
- 第五三项 环境卫生、人民营养和体育活动的研究
- 第五四项 掌握现有的并建立新型的、更完善的控制仪表、精密
仪器和化学试剂
- 第五五项 统一的计量系统,计量技术和国家标准规格的建
立
- 第五六项 现代自然科学中若干基本科学理论问题的研究
- 第五七项 科学技术情报的建立

附：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编制

王 晓 峰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会上，周恩来总理宣布国务院已经着手编制《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以下简称《十二年科学规划》）。这是党中央重视科学研究、决心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措施。

周恩来在这次会上发言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需要充分提高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发挥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毛泽东在会议的最后一天讲了话，号召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而奋斗。

这次会议后紧接着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组织制定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1月30日，在政协二届二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对这个规划的总方针和要求作了明确指示：这个远景规划的出发点，是要按照需要和可能，把世界科学的最先进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来，尽可能迅速地补足起来，根据世界科学已有的成就来安排和规划我们科学研究工作，争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能够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中央对《十二年科学规划》十分重视，决定由周恩来亲自负责，陈毅、李富春具体领导组织。1956年初，来自全国23个单位的787名科技人员经过充分讨论后提出了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的初步框架（包括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两部分，分别由两个方面的科学家制定，本文只涉及自然科学技术部分的制定）。以后在此基础上，又集中了600多名国内各方面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对各部门的规划初稿进行审查、综合和汇编。另外，还邀请了一些苏联专家当顾问，

帮助拟定和审议规划。

1956年4月,国务院召开了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专门会议,决定成立由有关部门领导同志组成的十人小组,负责主持和领导规划的制定工作,其成员有范长江、张劲夫、刘杰、于光远、武衡等。《十二年科学规划》遵循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要求,确立55项科学技术研究的重要任务。以各学科为纵线,确定各学科在各项任务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各单位再根据各自的科学技术力量决定所能承担的研究课题。在初步确定55项重点任务之后,有一部分科学家认为,这种方法虽好,但忽视了各基础学科的理论研究。争论反映到周恩来总理处,后来经周恩来指示增加了第56项“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任务,列“情报资料”为第57项任务。同时还专门制定了基础科学的学科规划。

1956年8月,陈毅副总理召集了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扩大会议,对自然科学方面的科学规划工作做了总结性的讨论。科学规划文件包括一个《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和四个附件,即:《任务说明书和中心问题说明书》、《基础科学学科规划说明书》、《任务和中心问题名称一览》、《1956年紧急措施和1957年研究计划要点》。同年12月中共中央同意并批转了科学规划文件。

《十二年科学规划》的57项重要科学技术任务下,又分别详列了中心问题,总计616个。整个规划提出的57项任务,科学家们同意从中提出十二个重点,这些重点是:(1)原子能的和平利用;(2)无线电电子学中的新技术(指超高频技术、半导体技术、电子计算机、电子仪器和遥远控制);(3)喷气技术;(4)生产过程自动化和精密仪器;(5)石油及其他特别缺乏的资源的勘探,矿物原料基地的探寻和确定;(6)结合我国资源情况建立合金系统并寻求新的冶金

过程；(7)综合利用燃料，发展重有机合成；(8)新型动力机械和大型机械；(9)黄河、长江综合开发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10)农业的化学化、机械化、电气化的重大科学问题；(11)危害我国人民健康最大的几种主要疾病的防治和消灭；(12)自然科学中若干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

1956年12月，中共中央同意了上报的《十二年科学规划纲要（修正草案）》。

在《十二年科学规划》制定过程中，考虑到规划的全国规模性，在执行时必须分为几个系统；对几个系统实施科学规划的情况，应该有一个机构经常加以监督，以明确分工，密切合作。因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在1956年12月决定，把领导制定长远规划的科学规划委员会改为常设的高级协调机构，将原来规划委员会中的党的十人小组，改为科学规划委员会的党组，主任聂荣臻。1957年5月，国务院第48次全体会议确定了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是掌管全国科学事业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措施的领导机关。它的任务是：(1)负责监督《十二年科学规划》的实施，特别是重点任务的实施；(2)负责汇总平衡全国科学研究工作的长期计划和年度计划，成为国家计划的一部分；(3)负责各系统间重要的协调工作；(4)管理国家重点研究任务的科学基金；(5)负责制定和实施高级专家的安排、培养、分配和使用的计划；(6)负责研究和组织解决科学研究工作的条件问题（如图书资料、情报、仪器、化学试剂等）；(7)统一安排科学技术方面的国际合作。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对中国科学院、国家技术委员会、高等教育部、第三机械部、国防部（包括航空工业委员会和其他部门）、农业部和卫生部，实行统一归口管理。同时，指导地方科学工作委员会的工作。

《十二年科学规划》于1956年12月作为试行草案付诸实施。到1958年10月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科学小组、科学规划委员会党

组《关于十二年科学规划执行情况的检查报告》，并在批示中要求“苦战三年，基本改变我国科学技术面貌，争取提前五年，即在1962年完成科学技术远景规划，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到1962年底，中央科学小组和国家科委党组对《十二年科学规划》的执行情况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在检查的54项任务中，有46项已经基本达到了原规划1962年的指标。

首先是中国科学院各部门地方的研究机构从1956年的380多个发展到1962年底的892个（不包括地、县级研究机构），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大专程度以上的科技人员，从1.8万人增加到6.8万人，科技研究队伍大为加强。

科学技术有了比较全面的发展。农业方面：中国初步完成了全国耕地的土壤普查；采取品种、灌溉、栽培、肥料等综合的措施，大大提高了粮食作物的复种指数；基本掌握了11种主要病虫害的防治方法。工业方面：初步掌握了许多现代生产建设技术，能依靠自己的技术力量，设计建设某些大型工厂。1957年中国主要工业产品只有1.5万种，到1963年底已增加到3.8万多种。中国已经由只能生产一般比较简单的、中小型的产品，跃进到能够生产一些高级、精密、大型的产品。国防尖端技术也在成长起来。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医药卫生方面：控制和消灭了多种恶性流行病；断臂再植取得突破性成功。基础科学的研究工作已经得到比较全面的发展。1965年6月至7月，中国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获得成功，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合成蛋白质。

总之，《十二年科学规划》的制定和提前完成，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创举。它为中国科技事业进一步发展和以后制定第二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从组织、人才、经验上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派出的第一批留学生

骆 亦 秉

新中国 1949 年宣告成立后，面临社会主义建设的繁重任务，急需各方面建设人才。党和国家领导人自建国之初就考虑派留学生去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学习。1949 年 12 月至 1950 年 2 月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在苏联访问期间，据说曾会晤东欧国家领导人，周总理同他们谈到互派留学生学习对方国家语言文字以利发展团结合作关系的问题。1950 年 5 月 13 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分党组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副主席写了一个请示报告，提出了派遣留学生的计划。报告称：

关于派遣留学生，现正接洽者计有三批：（一）派往苏联的，前经少奇指示，准备派 200 名。当即经过文教委与政府各部门接洽，各部门皆已开出要派的人数和所学项目。拟会同外交部与苏方接洽，再作具体决定。（二）捷克斯洛伐克提出互相交换 10 名留学生（学语言文字、历史），并愿给我国 50 名奖学金，同时要求我国派 50 名公费生，我们考虑如果接受 50 名奖学金，则也须同时另派 50 名公费生，或者也回报给捷克以 50 名奖学金，方为得体。（三）波兰向我国提出互相交换 10 名（学语言文字、历史），此事急需决定。因此，提出下列两个方案：

（一）今年派遣留学生以派往苏联为主。如果依照此原则办理，则除与苏方接洽派 200 名留学生外，对捷、波只互相交换 10 名，此 20 名是学捷、波语言文字历史的。拟分配为外交部保送 10 名、教

育部保送6名、新闻总署保送2名、出版总署保送2名。

(二)与波、捷两国交换20名,分配如前述。另向捷派80名留学生,其中40名由捷政府提供奖学金,40名由我国给公费,学习重工业。同时向苏联派留学生200名。

文教委在报告中请求指示,并表示第一方案较妥。刘少奇5月15日对报告作了如下批示:“与波、捷两国交换留学生各10名立即可办。派苏联留学生在补贴问题未解决前暂时不办。”毛主席16日批示:“请周照少奇意见酌办。”周、朱、陈三位副主席都圈阅了这个报告。党中央最高领导亲自过问派遣留学生问题并审批有关报告,可见对培养人才的重视。

其后,中央进一步决定选派25名大学生去波、捷、匈、罗、保5国,每个国家5名,学习这些兄弟国家的语言文字和历史,以应外交工作之急需。周总理亲自部署,并指派文教委的冯乃超、外交部的伍修权、教育部的黄新民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具体落实。外交部与有关部门会商后照会波、捷、匈、罗4国大使馆进行具体协商。我与保加利亚虽已建交,但双方使节尚未到任,是通过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同保驻苏使馆联系协商的。中方同时表示欢迎对方派留学生来华。那时,中国同苏联、东欧各国的文化合作协定尚未签署,无章可循。由于双方关系友好、态度积极,迅速就互换留学生的具体办法达成协议。

以波兰为例,中国外交部于1950年7月4日向波兰驻华大使递交了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签署的关于互派留学生的照会。波兰大使布尔金于7月15日致函周恩来表示波兰政府同意。信中说:“根据波兰与友好国家现行惯例,交换留学生是建立在互惠原则上的,友好国家政府派往波兰的学生,波兰方面免费供宿,并提供奖学金1万8千兹罗提,高等学校免付学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派往波兰的学生,将享受和波兰政府订有文化协定的友好国家

学生所享受的同样权利和待遇。”其他 4 国的做法也大体相似。

文教委遵照中央领导的指示,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遴选学生,后在南开大学、北京师大、复旦大学也选拔了几名。遴选对象主要是毕业生(专业不限),也包括少数肄业生。1950 年 7 月,我从北大经济系毕业,接到组织通知,说准备派我和其他一些同学去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留学,并问我有什么困难,意见如何。当时我对东欧国家几乎一无所知,对去那里学习更毫无思想准备,本能地表示了服从组织决定。就这样,我成为被遴选的学员之一。据说最初选拔的都是男性,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提出了意见,改为每个国家派 4 男 1 女。文教委于 1950 年 8 月 23 日向周总理报送了去东欧国家留学生名单。报告称:“派赴捷、波、匈、保、罗五国留学生,已从本届大学毕业生 37 名及市委保送 10 名共 47 名中,经审查测验选拔 26 名,除 1 名准备将来派赴朝鲜学习外,计取赴上述五国学习各该国语文历史者共 25 名,附呈名单一纸,请予批准。”25 日,周总理亲批“照准”。由于向苏联派留学生的某些具体问题尚未解决,这 25 名学生就成为新中国派出的第一批留学生。

政府有关部门及当时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等青年组织对新中国派出第一批留学生都很重视。7 月底,教育部在北京西城某地开始举办为期 1 个多月的培训班,着重提高学员对出国学习意义和任务的认识、进行政策教育、对学员进行考试并最后决定人选,同时也解决一些思想问题。测试科目为政治、英语、历史地理。说起思想问题,记得最初通知我去东欧国家学习时,我思想上的第一个反应是东欧国家那么遥远,什么时候能回来?会不会长期回不来?现在想起来,有些幼稚可笑了。在培训期间,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外交部苏联东欧司长伍修权、美洲大洋洲司长柯柏年给我们作了形势、政策报告,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阎宝航介绍了外国习俗和吃西餐的规矩。教育部长马叙伦、文化部长沈雁冰分别接见学员,讲

了许多期望和嘱咐的话。团中央书记冯文彬、副书记廖承志、蒋南翔同我们亲切会见交谈,并请我们吃了一顿西餐,作为一种国外生活的预习。全国妇联负责人之一廖梦醒也出席了这次聚会。通过一个多月的培训,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学习任务之重要及党和国家企望之殷切,热情高涨,确有任重道远之感。刚集中培训时,每个学员具体去哪个国家尚未定,培训结束后由学员自报志愿、领导统盘考虑决定。我被分配到去波兰的一组。

临出国前,国家为我们25人统一发了服装。记得有两套中山装(女同学是西服上衣,长裤),一套是黑呢料的,一套是卡叽布的;一件黑色粗呢料大衣,羊皮内衬。这些在当时已算很高级的了。此外,还发了点钱供购皮鞋、内衣之用。后来对个别家庭经济困难的同学,教育部还给了些安家费。国家对我们的照顾可以说是无微不至。

1950年9月中旬,25名留学生满怀革命激情乘火车离北京去莫斯科然后分赴5国。教育部、外交部官员、团中央及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领导人以及5国驻华使馆外交官员到车站欢送,大家深受鼓舞。

九月下旬,分为5个小组的留学生分别到达5国首都。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对新中国都怀有深厚的感情,他们的政府和人民都把来自新中国的留学生看成是中国青年代表和人民的使者。留学生到达5国边境时,各国都派政府官员和青年组织的负责人到边境迎接,罗马尼亚甚至安排火车专列自边界送到首都。至今我仍记得那热情洋溢的场面。

对我们这批留学生的学业如何安排进行,5国政府和我国有关部门都没有经验,双方经历了一段相互了解的过程。周总理对我们的学习关心备至,8月初,他在外交部关于派遣留学生问题的一份报告中批示:去波兰学工矿的,可以入他们的采矿大学(当时有

关部门酝酿派 5 名学生去波兰学采煤,5 名去捷克学兵工),去学语文的最好特设一班,不分别人各系。中国教育部及驻 5 国大使馆即本此精神与对方国家研究磋商。先后与 5 国政府商定由他们的教育部门调派懂英语的语文教师单独给中国学生开课,第 2 年增加历史课,也是单独开。到了第 3 年,有的国家还专门为中国学生开了地理课、文学史课。这种特殊的做法,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在共同理想、目标基础上的紧密团结和友好合作的特殊关系。

我们去波兰的一组 5 人,除我外还有刘铁生、萧惠敏、李嘉训(女)、谢孟纲 4 位。到华沙后被安排在内“大学生之家”一幢大楼内居住,两人一间。后来为便于学口语,经我们要求,改为和波兰同学同住。这几位波兰同学是由波兰高教部通过党、团组织选派的,都是统一工人党党员、青年联盟中央(相当于我团中央)干部,政治上较强,大家相处很融洽。波高教部把我们的学习管理挂靠在华沙大学东方语系。系主任是波兰著名的汉学家雅布翁斯基,对中国感情很深,后来两次来中国参观访问,病逝在中国。除高教部派的语文教师每天到我们宿舍教课外,东方语系还安排了两名助教帮我们学习。第 2 年华沙大学派教师到宿舍讲授波兰历史,第 3 年在地理系为我们增开了波兰地理课。这些老师教我们都很认真负责,是我们的恩师和益友,我一直保存着他们的照片,至今不忘。那时波兰建国不久,经过二战严重破坏,经济还比较困难,黄油等实行配给制。我们在学生食堂吃饭,生活方面不提要求,饿了就到使馆去吃顿中国饭。波兰政府所发奖学金,按当地汇价约合 45 美元,不足以添置衣服,我国教育部得知后,拨款给我们添置了两套西服,一件夹大衣。在生活方面,5 国做法不尽相同。例如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除发奖学金外,还专为中国学生制做了衣服。

在 5 国,每逢双方国家重大节日如国庆、五一节举行庆祝活动

和青年学生有什么大的集会，中国留学生都被邀请参加。在青年学生的集会上，中国留学生的代表经常被邀坐在主席台，所到之处都受到欢迎。这倒不是因为我们这批学生有什么长处，而是因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当时在东欧各国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同时这些国家的人民受着执政的共产党、工人党的国际主义教育，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到了寒暑假，这些国家的教育部门或青年团就组织中国留学生去山上或海滨度假，我们与这些国家的学生朝夕相处，感情相通，无任何隔阂。这里顺便提一下，1950年底到1951年上半年，东欧5国先后选派了留学生来华学习。中国政府对他们也作了良好的安排和照顾。

中国驻5国大使馆对留学生的学习、思想抓得很紧，管得较严；同时也尽量照顾留学生的生活。同学们学习都很努力，并自觉地尊重使馆的领导，非常听话，定期向使馆汇报自己的思想和学习情况。后来我国教育部专门制定了委托使馆代管留学生的规定。那时有一个精神，即留学期间不要谈恋爱。大家都遵命实行，在国内有恋爱对象的就主动断了关系，这在现在看来可能是不可思议的事了。

中国首批留学生在5国政府和本国政府的关心照料下，在国际主义的气氛和友谊的海洋中学习了3年，初步掌握了这几个社会主义友好国家的语言文字和历史知识，1953年夏结束学业回国（赴匈牙利留学生学习期限延长1年）。那时的留学生都盼望早日回到祖国怀抱，无一人有滞留国外的念头。这也许是由于时代不同，想法不同吧。25名留学生回国后都按原计划分配到外交部工作。后来由于北京大学开设东欧国家语言课、外国语学院成立东欧语系，一部分同志被调任教师，还有两位同志因工作需要调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一名调入工业部门工作。这25名留学生在各自

不同的岗位上勤恳工作,为增进中国人民同东欧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为加强和发展中国同这些国家的友好合作竭尽全力,他们不计名利、不讲待遇,无私奉献,没有辜负国家的培养和期望。80年代中期开始实行干部“四化”方针后,这批留学生开始担任较重要职位,后来在外交战线工作的有5位同志担任了国家驻外大使,1位担任大使衔总领事,3位同志担任了驻外使馆参赞;在学校和研究机构工作的同志担任了正副教授、正副研究员。这些人现多已年近花甲。在40多年中,他们在政治生活和职业生涯中也经历过挫折、逆境和各种风浪特别是反右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甚至伤害,但他们忠于共产主义理想、忠于国家和人民,矢志不渝,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坚贞品格。如今,有些同志已经作古,其他人也都离休退休,安贫乐道,不失晚节。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北大工作组

张承先

“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共中央决定派我为北京大学工作组组长，代行北京大学党委书记职务，领导北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风口浪尖上，我经历了一场不寻常的严重斗争。在处理北京大学“六·一八”乱揪乱斗事件中，被江青指责为“镇压了革命”。康生宣布我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我随即被打倒。

关于“文化大革命”，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我在北京大学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亲身经历，深刻地体验到了这一点。

陈伯达、康生是以林彪为首的和以江青为首的两个反革命集团的重要成员，在制造内乱中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他们在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中进行了丑恶的表演，对这一段历史许多人并不清楚。在一些历史著作中也叙述不详，甚至有的以讹传讹。我作为当事人，有责任将这一段历史记录下来。

(一)

1966年5月，我正在北京参加中共中央华北局主持召开的华

北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作会议(当时我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在会上听了5月18日林彪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的传达。他在讲话中大讲世界上“政变成风”，并称中国有些人阴谋搞政变，他们要杀人。会上还传达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同志的所谓“反党错误”。当时感到气氛很紧张。在这次会上还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

当时，我对这一通知进行了反复认真的研读。《通知》提出：要“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任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读到这些段落，真使我大吃一惊，心里想情况有这么严重吗？出于对毛主席在我心中的崇高威望，我又不能不相信，也不敢怀疑。当时只是考虑自己觉悟不高，认识不清，要努力学习提高自己觉悟，跟上毛主席的重大战略部署。同时认真对照检查我在河北主管的文教工作，考虑在这方面工作中有无问题，想来想去也没有感到多大问题。

6月1日下午，我突然接到通知，让我在傍晚到北京饭店向北

京新市委第二书记吴德领受任务。吴德对我说：毛主席决定要向全国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七人于5月25日贴出的大字报，广播后北京大学党委可能陷入瘫痪状态，中央决定任命你为北京大学工作组组长，并由你代行北京大学党委书记职务，要赶在广播前进驻北京大学，领导北京大学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当晚召开了华北局和北京新市委负责人参加的紧急会议，讨论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的工作方针和行动计划。然后，吴德和华北局负责人苏谦益、池必卿、黄志刚带领我急急忙忙赶到北大，召开北京大学党委会议，宣布了华北局决定。这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已于晚8点广播了聂元梓七人大字报。6月2日晨零点30分，紧急召开了全校党团员、干部、学生干部大会，宣布华北局决定。我讲了话，表示：坚决支持北京大学的革命运动，放手发动群众，把北京大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这个突如其来的任务，使我感到担子很重，压力很大。北京大学聚集了很多全国闻名的学者，是全国著名的高等学府。而我对北京大学的情况一无所知，对“文化大革命”怎样搞法也心中没底。只是觉得在“天子”脚下的北京大学搞运动可非同一般，只能搞好，不能搞坏。搞不好，不只是对中央无法交待，对国内外也将产生不良影响。怎么办？我考虑再三，感到务必要谨慎从事，严格遵照毛主席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坚持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一致性”、“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等一贯教导去做，绝不能下车伊始就胡乱开展“斗争”。在具体工作中，一是依靠领导，坚决按中央的指示办事；二是深入调查研究，摸清北京大学的情况。

工作组的派出为何如此匆忙？我当时并不知情，后来才知道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北京大学聂元梓七人大字报是在康生秘密策划下搞出来的。1966年5月14日，康生派人以中央理论小组调查组的名义到北京大学调查，由他的妻子曹轶欧任组长。曹多次找到

聂元梓面谈有关“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曹还两次找北京大学党委常委、法律系主任陈守一谈话：说北京大学的学术批判有问题，你应该揭发，你如果同意揭发，还会有人和你一同出面揭发。两次都遭到了陈守一的拒绝。曹轶欧于是表示说：此事“算了”，但又叮嘱他对这件事严格保密不能与任何人谈。5月23日晚，果然如曹轶欧所说“还会有人出面揭发”，这就是经她面谈的聂元梓。聂元梓在邀集某些人商量之后，决定从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5月14日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讲话开刀，写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向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发难。大字报写出后，于5月25日公开贴在学校大饭厅东墙上，引起了全校的思想混乱和激烈争论。大多数师生员工认为：这是一张用诬蔑不实之辞攻击诬陷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北京大学公开贴出大字报的事也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当晚华北局书记李雪峰和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张彦到北大召开党员干部会议，传达国务院有关文件，批评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不应该贴在外面。周总理指示说：“大字报可以贴，但北京大学是涉外单位，要内外有别。”强调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认真遵守。由于聂元梓的行为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批评，学校内也有些干部师生批评了聂元梓大字报中的一些诬蔑不实之辞，于是曹轶欧派人将大字报底稿取走送给康生，康生背着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将大字报直接送给在外地的毛主席，并让曹轶欧告诉聂元梓要“顶住”。据康生自己在8月4日的北大全校大会上说：“6月1日下午4点，我接到通知（指广播聂元梓大字报的通知），我感到聂元梓同志解放了，我……也感到解放了，因为我们当时是支持这张大字报的，我们也受到了压力。”由此可见大字报出笼与康生等人的关系。

康生的这种突然行动，使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

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陷于被动状态。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同志按照过去党领导运动的通常做法，决定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免得使运动陷于无领导的混乱状态。我就是在这种紧急情况下被派往北京大学的。

(二)

1966年6月1日晚8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聂元梓七人大字报，当夜就有许多人给广播电台打电话提出质询和抗议。当晚收到的质询抗议电话59次。6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为主题，全文发表了这张“革命”大字报，并在配发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一文中，称“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随后陈伯达掌握下的《人民日报》又连续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等一系列社论，把聂元梓封为“革命左派”。这就在北京大学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而聂元梓则认为她胜利了，向“围攻”（聂元梓自称广播前她受到了“围攻”）她的人展开了猛烈反击，校园内出现了混战局面。许多青年学生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出于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热情，也纷纷贴出大字报。从6月1日到6月6日校内共贴出大字报5万多张，各种观点都有，其中也有反对聂元梓的大字报。每天来北京大学看大字报的近万人。北京许多学校派人来北大声援，不断有人访问聂元梓并向她取经。聂元梓一时成为“英雄”人物。北京大学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这种强大的舆论下，迅速激发起来。

6月4日，陈伯达到北京大学看大字报，了解情况。他对北大工作组说：“北大是地、富、反、坏、右的堡垒，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

阶级的堡垒，他们是在培养资产阶级、反革命和叛徒的接班人，是一个很顽固的堡垒，堡垒要从内部攻破，我们要有自己依靠的人”。陈伯达回去后，《人民日报》于6月5日发表了题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的社论。社论说：“北大社教运动后期，召开的国际饭店会议”，“是1965年发生的一个极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北京大学的斗争，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保皇派之间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修正主义的斗争，是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斗争，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是极其尖锐的阶级斗争”。这个论断当时也使我感到十分突然。因为，1964年开始的北京大学“社教(四清)”运动是经过反复的。开始由中宣部派出的北大“社教”工作队认定北京大学已经烂掉了。后来由于有不同意见，中央书记处决定进行复查，决定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万里主持国际饭店会议进行复查，结果否定了聂元梓等人对北大党委的“揭发”和中宣部工作队所作的结论。中央书记处在邓小平主持下，专门讨论了北大社教运动问题。认为北京大学是办得比较好的社会主义大学，只是有些问题。陆平同志(北大党委书记)是好同志，也只是有些错误。对中宣部工作队在北京大学“社教”运动中的工作方针和做法提出了严肃批评。当时，我还听说毛主席说过“看来陆平还是个好同志”。对中央已经作了结论的事，陈伯达轻易地予以彻底推翻，并把国际饭店会议称之为反革命事件，必然在北京大学引起更大的混乱。果然，《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一发表，北京大学内部就围绕着“社教”运动的历史旧账，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聂元梓对在国际饭店会议上不赞成她的观点的人开展无情斗争，进行打击报复，并要揪斗万里(工作组以万里是中央任命的北京新市委的领导成员为理由，拒绝了她的要求)，给工作组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在聂元梓发动的这场斗争中，斗争方式简单粗暴，打人、骂人、

揪头发、撕衣服、戴高帽子游街，使北京大学的混乱状态不断升级。《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后，把青年学生在毛主席号召下焕发的革命热情，进一步引向了“横扫一切、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方向，开始漫无边际地“横扫”起来。北京大学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在“横扫”中，遭到人格污辱，其住所被贴上“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的对联。有些前来北京大学声援的外校学生，随便勒令被报上点名的“黑帮人物”出来交待问题，有一次一些中学生打掉了陆平的眼镜。在这种激烈动荡、一片混乱之中，如何站在运动前边领导运动，成为当时十分迫切又非常难办的问题。

聂元梓七人大字报广播之后，原北京大学党委及所属党总支，除聂元梓掌握的哲学系外，全部陷于瘫痪。当时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工作组的各级机构，取代垮了的各级党组织。北京新市委在中央支持下，从中央机关、解放军和各省市抽调了大批干部，充实加强北大工作队力量。6月7日，从校到系（除哲学系外）全部实现了工作组的领导。据6月10日统计，北京大学共有208名工作队员。在校一级成立了北大工作组领导小组，我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有曹轶欧（她早已以中央理论小组调查组组长名义进驻北大，后改为中央文革小组调查组）、刘仰峤（高教部副部长，后来调回高教部）、杨以希（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彭林（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政治委员）、武振声（中央文办秘书长）、张德华（团中央候补书记）。聂元梓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克明（北大七人大字报主要成员之一）为办公室副主任。

在建立健全工作组各级组织领导的同时，中央对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运动如何进行作了一系列指示。

6月3日下午，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在大专院校代表会上讲话并传达了中央指示，分析了北京市“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提出：6月1日广播了北京大学第一张大字报后，北京市“文化大革

命”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在斗争方式、方法上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运动刚刚开始，领导还没有讲运动怎样开展，出现些问题也是正常现象。运动在打破常规开展起来的新情况下，领导要站在运动的前边领导运动。任何革命群众不是执行正确的政策，就是执行盲目错误的政策。北京市委过去的领导出了严重问题，但北京市广大党员是好的，不能设想北京市的党组织都坏了。有些同志犯了错误是执行了前市委以党的名义发的文件和指示，有的同志自身有毛病有错误，要主动检查，取得群众信任和谅解。有些人即使与黑帮有关系就应起来主动决裂，党是允许革命的。中央要求各级党委站在运动的前面领导革命运动。既要放手发动群众，又要掌握政策，有些方面要划些杠杠。经中央同意开展运动的八条要求是：①大字报要贴在校内；②开会不要妨碍工作、教学；③游行不要上街；④内外区别对待，不准外国人参观，外国留学生不参加运动；⑤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闹；⑥注意保密；⑦不准打人，污蔑人；⑧积极领导运动，坚守岗位。这些政策要尽快通知下去和群众见面。北京大学虽然尽快传达了这些指示，但北大运动实际上已经突破了这些杠杠。这些指示给我最深的感受是：工作组一定要站在运动的前边领导运动，要放手发动群众，注意掌握政策。

6月7日校系工作组全部到位后，新市委第二书记吴德于8日来北京大学传达了新市委的指示：北京大学这张大字报成为“文化大革命”全线进攻的号角。现在看来不少单位的领导已经积极起来领导这一场运动了，但也有相当多单位的领导还采取消极态度，有不少单位出现了“两派对骂”的尖锐状况。“革命派和保皇派进行着一场搏斗”。现在要狠抓领导权，这里有个夺权问题。目前情况下，还要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当然要有领导，要讲政策。所谓有领导，首先要把群众发动起来；讲政策，首先是支持革命群众，然后是划一些政策界限。现在主要是怕搞乱了，我们不应该怕大民主，不

要怕这怕那，不要束缚群众手脚。群众运动开始可能乱一些，这合乎规律，也可能大乱一场，然后再一分为二。只要我们旗帜鲜明，打击方向明确，加强领导也乱不到哪里。只要群众真正起来了，情况就会好一些。运动不是按设想的发展，我们原想分期分批进行。大字报一广播，一声号令，全面开花。我们不能用常规办法领导运动。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有气魄地领导运动。雪峰同志讲的八条是中央精神，当然是对的。有人从积极方面理解，有人从消极方面理解，束缚限制群众。例如上街有两种不同的上街。对北大声援，那么多人敲锣打鼓去，也是上街么！关于“内外有别”的问题，比如互相看大字报就不能限制，不是很多人到北大看大字报么！总之要有政策，政策首先要支持革命群众起来革命。工作队是临时调来的，来不及训练，思想准备不足，对学校“文化大革命”怎么搞不大清楚，工作队员要在运动实践中提高自己，边战斗边整训。越是放手发动群众，越容易使运动健康发展。我们说要造气势，不是说不要求做深入的细致的思想工作。在组织上要抓组织革命队伍，依靠左派，争取中间，分化右派，孤立打击顽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现在北大“左派”已经起来，当前的问题是争取中间，中间一过来，右派就会分化。总之，要放手发动群众，现在发动的还很不够。关于这次运动斗争的目标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党内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党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斗争不是对有资产阶级思想、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但并不反共的知识分子。群众起来不管是重点不是重点，都烧一下很难免。要引导他们把目标集中在批判重点上，不要转移斗争目标。

根据新市委传达的这些中央指示，结合北京大学实际情况，我与工作组领导小组同志酝酿后认为：在北京大学，夺取领导权问题已经解决，已经涌现出一支“左派力量”，现在是放手发动群众，壮

大革命力量，依靠与提高“左派”，大力争取中间派，明确斗争目标，注意掌握政策，结束混战局面，把运动引向深入健康发展的问题。根据这一认识，我对运动中的几个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和研究，现将当时的一些想法记叙如下：

1、关于要站在运动前边领导运动。

北京大学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聂元梓七人大字报广播之后，以聂为首的“无产阶级左派”在北大崛起，北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搞了起来。根据这一情况，北大工作组明确表示要“支持左派、依靠左派”，并安排聂元梓为北大工作组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克明为办公室副主任，全面掌握运动情况。但在实际接触中，我感到聂元梓对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性质任务和所要达到的目的也并无深刻的了解，运动中带有个人情绪、发泄个人不满，斗争目标不明确，矛头对准在过去运动中与她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对准由他们自己主观认定的“资产阶级保皇派”。斗争方式简单粗暴，不讲政策，出现打人、骂人、戴高帽子等现象，斗了一些不该斗的人，使校园内形成混战局面。特别是感到，聂元梓等把“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圈子划得太小，不注意争取中间力量，不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脱离了广大群众。而大多数群众，虽有革命热情，但有很大的盲目性，如果没有党的坚强领导，必然像中央指示中所说的那样“执行盲目错误政策”。因此，要搞好北京大学的“文化大革命”，只靠聂元梓等人搞是不行的，“依靠左派还要提高左派”，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制止混战局面，把运动引入正轨。由于北京大学各级党组织已陷于瘫痪，领导权已转移到工作组手里，北京大学的“运动领导权”问题已经解决了。当前实现党的领导的关键，是工作组必须站在运动的前列来领导运动。如何实现领导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其中也有个提高工作组的领导水平，取得领导资格的问题。因此工作组和广大工作队员需要进行战地培训，要

边学习提高、边参加和领导运动，“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2、关于放手发动群众问题。

在北京大学搞好这场“文化大革命”，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必须要把北大的广大革命干部、广大党团员、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广大学生发动起来，把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团结起来；要按照中央社教运动“二十三条”的精神，在团结95%以上群众的基础上，团结95%以上的干部。而北京大学虽然已经涌现出一股“左派革命力量”，但这股力量还不大，他们又不善于团结广大群众，对他们主观认定的“资产阶级保皇派”一律加以排斥，不加区别地进行斗争，使相当一部分群众对运动持怀疑和消极态度。经工作组深入调查摸底排队，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运动虽然表面上“轰轰烈烈”，但真正动起来的不过30%左右。处于中间状态的占有很大比例。面对这种情况，工作组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开展学术大议，深入发动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在“提高左派”的同时，争取中间派，壮大革命群众力量，这是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所在。

3、关于注意掌握政策。

在北京大学进行“文化大革命”，必须特别注意掌握政策。北京大学是高级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进行“文化大革命”不把广大高级知识分子团结起来、发动起来是不可能搞好的。在运动中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明确斗争目标，目标要集中对准“真正的顽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能说北大领导出了问题，北大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就都坏了。要解除各种各样人的思想顾虑，使得有这样那样缺点错误的人“洗手洗澡”轻装上阵。要团结一切可以争取团结的人，形成一支革命大军。

4、对于学术领域里的问题、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问题，解决起来要持特别慎重的态度。

吴德报告中指出：这次运动斗争的目标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

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不是对有资产阶级思想、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但并不反共的知识分子”。因此，特别要注意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把纯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起来。即便是对“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在批判中也必须坚持摆事实、讲道理的方针。毛主席说过，对学术问题，要通过“百家争鸣”来解决，对思想认识问题，要说服不能压服。现在简单地采取打人、骂人、扣帽子、打倒在地的方法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反而会适得其反。对像翦伯赞这样著名的历史学家，更不能采取污辱人格的办法。”

5、在北大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是很重的，必须采取“积极又稳步前进”的方针。

领导北京大学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首先要抓好学习。通过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学习文件，提高认识，擦亮眼睛，进行深入调查研究，找出重点人和重点事，并认真研究、弄清其问题的性质，对不同问题采取不同政策加以解决。这样逐步推进，才能把“真正的顽固的坚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孤立起来，暴露出来，达到“加以清除”的目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在冀鲁豫边区工作，对湖西“肃托”和太行整风中冀南三大队“肃反”造成严重后果的沉痛教训记忆犹新，现在面对北京大学这样复杂的情况，我认为必须慎重行事，绝不能再重复历史上的错误。

以上这些考虑，先在领导小组内进行酝酿，交换意见，又召开了若干座谈会征求群众意见。针对群众中存在的种种疑虑，经领导小组讨论后，形成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放手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明确斗争目标，贯彻党的政策，依靠北大广大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同学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6月13日在3000名积极分子大会上作了报告，经过讨论、听取反映后，又进行了修改补充。6月15日，在全校1万3千人的群众大会上做了动员报告。这个报告的基调和指导思想是“左”的，但在当时

却具体回答了全校师生员工存在的各种各样的疑虑和问题,指出了这次“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和意义,明确了斗争目标,讲明了党的方针政策,以及在斗争中应该采取的方法和策略,客观上起到了安定人心的作用。对北京大学已经出现的乱揪乱斗现象,当时指出,“有些人有气,出现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主要原因是领导没有跟上去,但明确今后不能再这样搞,这样搞不但不利于“文化大革命”进行,反而容易让坏人钻空子。强调“文化大革命”必须在工作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这个动员报告当时得到了全校广大师生员工的拥护。根据系工作组反映,许多师生说:“这是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既敢于革命,又善于革命的报告”。七人大字报成员之一、后被任命为工作组办公室副主任的杨克明曾参加了调查工作和座谈会、参与了报告的起草与修改,对这个报告也表示非常赞同。当时作这个报告的目的,是想通过这个报告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把北京大学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纳入有领导、有计划、严格按党的方针政策办事的轨道上来。

(三)

1966年6月18日上午,工作组召开全体工作队员大会,研究6月15日全校动员大会后的情况,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大会精神、领导好这场运动。9时左右,在校园内又突然爆发了乱揪乱斗事件。三十八斋前还设了“打鬼台”,四处揪人。工作组领导小组闻讯,立即停止会议,让各系工作组迅速回到各系,制止乱揪乱斗。我也立即赶赴现场,在两处斗得最凶、最集中的地方讲了话,讲明党的政策,强调指出不讲政策的“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最终制止了乱揪乱斗。

据当天下午汇总的情况统计,前后有60多人被揪斗,多是一

般干部，被斗者头上戴高帽，脸上涂黑墨，身上贴大字报；罚跪、揪头发、撕衣报、拳打脚踢、游斗。更加恶劣的是，还发生了多起污辱女同志的流氓行为。经查明，在这场乱揪乱斗事件中，有4个人行为恶劣。一个是庶务科的工人叫刘佳宾，此人原是国民党党员，当过国民党部队的上尉连长，被我军俘虏后，隐瞒身分混入我们内部，上星期就曾带头打过3个人，这一次又是他第一个带头打人。还有一个人在三十八斋前参加乱打乱斗，我到场讲话后，其他人都表示要听“毛主席的话、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并随即散去。而此人却在散会后两分钟不到，又揪来个女同志进行乱打乱斗。工作组成员赶到后质问他：“刚才张承先同志讲了话，大家都拥护，你为何还要这么做？”他蛮横地说：“你们工作组凭什么不让我斗？”又问他是哪个部门的，他说是北大附中的，经查附中并无此人。后查明，此人名叫修治才，1962年因偷窃被开除，现在没有正当职业。再就是有一个自称是东语系姓黄的，是“打鬼台”乱斗人的主角，带头打人，共打了8个人。他还专门找女同志作为斗争对象，趁机猥亵妇女。后查明此人并不姓黄，原名陈应复，有流氓习气，人称“小阿飞”。还有无线电系学生夏林翰，混入生物系参加斗争会时，他上台扯掉被斗女同志的裤子，并在女同志身上乱摸，后又在台下猥亵女同学。这个人过去一贯搞流氓行为，曾在王府井大街商店里偷东西被抓住，受过留党查看处分。

除以上这些坏人外，参加乱打乱斗的还有两种人，一种是本身有辫子可抓，怕大火烧到自己身上，趁机表现自己的。如政治系二年级有个调干生杨××，曾积极反对过聂元梓的大字报，这天在乱打乱斗中表现也很凶，当很多同学劝他“要进行说理斗争，不要打人”时，他大喊“要坚决地打，非打不可”。另一种人是单纯的个人报复出气。

在乱揪乱斗中，还有人故意制造场而，让外国人拍照。有迹象

表明这场乱揪乱斗是有人预谋和策划的。据房产科有个工人反映，17日晚上历史系有个学生给校外打电话说，“明天上午工作组开会，是个好机会，工作组不来，我们斗我们的，工作组来了我们就把他们撵出去”。根据工人王焕反映，在三十斋前有7个未戴校徽不明身分的人用电话到处联系说：已斗争过什么人，现在正在斗什么人。还发现十几个骑自行车的人到处搜寻他们想批斗的人，并把这些人的拉到同一个场合，在一个“斗鬼台”进行批斗。从这些情况看，这次乱揪乱斗很可能是内外结合、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

初步摸清情况后，经过领导小组研究，决定要抓住这一事件作为“反面教材”，对群众进行一次政策教育，把问题交给群众讨论，辨明是非。根据这一决定，在18日晚10时召开了全校师生员工广播大会，由我作广播讲话，向广大群众说明了乱揪乱斗的真相。指出：这次乱揪乱斗与以往的乱揪乱斗性质不同，以往的乱揪乱斗是有些人不懂政策感情用事；经过15日动员大会，在讲明政策后又发生这种情况，便不是一个简单的认识问题了，说明在乱揪乱斗中已经被坏人钻了空子，制造了混乱，给“文化大革命运动”抹了黑。我讲了应该从这次事件中汲取的三条教训，其一是要按毛主席指示，按党的政策办事；其二是，打破旧秩序后要建立新秩序，要建立纠察队，维持革命秩序；其三是搞好这场革命要在工作组领导下进行，工作组是支持同学们搞革命的，背着工作组搞秘密串连活动是错误的。要求同学们对今天发生的事件展开大讨论，来一次大检查，提高认识、提高政策水平。并查一查搞乱揪乱斗的是些什么人？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对这次广播讲话，广大师生反映是好的，有的同学说：“我们斗争目标不明确，方法不对，混战了一场，确实被坏人钻了空子。”有的工人说：“还是得按政策办事，不能乱来。”在群众讨论的基础上提出：进行全系批斗必须经系工作组批准，进行全校批斗必须经过校工作组领导小组批准；依靠“左派”建立纠察队，

维护斗争秩序；为防止坏人混入，对外校来声援者，安排专人热情接待，但禁止外校来人在北大揪斗人。经过这次动员之后，有人再想煽动乱揪乱斗确实比较困难了。当时认为：北京大学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了稳步深入发展阶段。

北京大学工作组领导小组把处理“六·一八”乱揪乱斗事件的情况写成“九号简报”。当时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看到后，于6月20日向全国批转了这个简报，批语是“现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发给你们。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关于“六·一八”事件的性质，在“九号简报”上以及中央的批示中，说的都是“乱斗现象”。但陈伯达当时认为，“六·一八”事件不简单，是一个反革命事件，一定有一个“地下反革命司令部”，要把这个“地下司令部”挖出来。他还具体提示要按照他创造的天津“小站四清经验”来搞，为此还指派张恩慈来北京大学绘制北大的“反动系统表”。我在河北工作时，了解陈伯达在天津市(当时属河北省)南郊区小站搞四清的情况。小站原来是个先进单位，受到过表扬。陈伯达在小站搞出了3个“反革命集团”，说小站是“反革命集团”掌权，并株连到南郊区委书记。对此，当时许多同志是有不同看法的。陈伯达要求在北京大学按“小站经验”来搞，我是有所保留的，并在实际工作中采取了慎重态度。康生在对“六·一八”事件性质的认识上是与陈伯达持同样观点的。在《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发出后，北大工作组领导小组决定写一个正式报告，即《关于北京大学二十天文化革命情况的报告》，由工作组副组长兼秘书长张德华负责起草。在这个报告中，因受到了陈伯达观点的影响，在反映“六·一八”乱揪乱斗情况时，作了这样的表述：“我们抓住这场反革命分子制造混乱，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事件……用以教

育群众接受教训”。这个报告写成后张德华送给我和曹轶欧审阅，当时我由于工作太紧张，就说先送“曹大姐”审阅。曹轶欧阅后，批了一段话说“德华同志：报告写的很好，在策略运用上很下了一番工夫，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只是在不关重要的地方添了几个字，如认为不妥也可以删掉”。这份报告曹轶欧肯定后即发出了，我没有看，也没有签名，甚至圈也没有划。当时曹轶欧在北大工作组领导小组中是受到特别尊重的。因为她是中央文革小组派来的，直通中央文革，她认可了即可上报。曹轶欧与康生息息相通，她了解的情况随时向康生反映，康生的意见随时由她到北大贯彻，由曹轶欧认可的东西，当然也是康生认可的。对于《二十天情况报告》中提到的反革命分子的破坏，当时大家并未十分在意，认为就是指在“六·一八”事件中暴露出来的少数坏人，并没有把事件的参加者都看成反革命分子。在处理“六·一八”乱揪乱斗事件中，除对暴露出来的4个坏人加以处理外，并没有抓反革命。当时的主要工作，是放在处理乱揪乱斗事件后，如何狠抓学习，提高认识，掌握政策，更深入地发动群众，特别是争取中间群众，以壮大革命力量等方面。同时，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摸清情况，对重点人和重点事进行分析研究，弄清性质、区别对待，以便集中力量向“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进攻。

北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在一段时间内是得到北京新市委肯定的，中央文革小组这一时期也没提出什么意见。这从康生态度上也可以看出来。7月3日康生找我谈话，说曹轶欧今后主要负责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公室的工作，仍兼任北大工作组领导成员，继续与北京大学联系。我当即表示同意，并向康生请示，问他对北大文化革命运动有什么意见和指示，康生说没有什么意见。在7月6日，在市委书记处书记郭影秋召开的全市工作团(队)负责人会议上，交流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专门让北京大学工作组介绍了经

验,得到了与会同志的肯定。

(四)

1966年7月12日下午,地球物理系陈必陶等5名同学贴出了《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的大字报,批评工作组在运动中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工作组领导小组决定通过这张大字报,进一步贯彻“放”的方针,把运动搞活。7月15日上午,市委负责人吴德、郭影秋来北京大学听取领导小组关于围绕陈必陶大字报进行辩论的情况汇报。吴德说:“六·一八”事件中,好人是多数,坏人极少,但好人也做了检讨,好处是警惕性提高了,副作用是对工作组的意见不敢提了。加上工作组控制的比较紧了些,运动死巴了。现在正确处理陈必陶这张大字报,是把运动搞活的关键。下午领导小组召开各系工作组长会议,传达了吴德的讲话,决定拿出3天时间进行工作组的整训。

7月17日凌晨1点半,我突然接到吴德的电话,传达李雪峰的指示,说对“六·一八”事件要重新进行估计。次日上午,李雪峰在北京市委书记处会议上,对北大工作组领导小组进行了批评。他说:对“六·一八”事件估计错了,这件事是万人革命的行动,估计这个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是错误的,估计错了就应当进行自我批评。北大的“文化大革命”18天“轰轰烈烈”,1个月“冷冷清清”,跟这件事有很大关系。当天下午,列席会议的武振声副组长向北大工作组领导小组传达了李雪峰的批评。领导小组多数成员对新的估价思想上想不通,我当时思想也不通。当日,我找到吴德提出不同意见。我说:处理“六·一八”乱揪乱斗事件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并通报了全国,怎么能一下子又说成是革命事件呢?!吴德对我作了解释,要求我转弯子,说这样检查有利于争取主动。当时,我感到如果完全

按照这样的口径向全校进行检查,广大工作队员和广大群众想不通,会引起新的思想混乱。因此,怎样检查颇费脑筋。经过领导小组的酝酿,决定了检查的调子。然后召开全校广播大会,由我代表领导小组做动员检查报告,检查了认识问题。我说:关于“六·一八”事件,确实有极少数坏人钻空子,制造了混乱;但我们对敌情估计过高了,对群众的革命热情估计不足,并采取了一些限制和束缚群众手脚的措施,影响了运动生动活泼的局面。工作组决心进行整改,现在就整训,用3天的时间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集中批评工作组领导工作的缺点错误。工作组引火烧身的行动,在全校引起了很大反响。继陈必陶五人大字报后,出现不少批评工作组的大字报。但许多学生表示支持工作组。说工作组是革命的,是在革命中出现的缺点错误,批评工作组是为帮助工作组。当时全校运动活跃了起来,连教授冯友兰也出来贴了大字报。工作组决定根据群众意见改进工作,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把运动搞活。

7月19日夜,聂元梓突然在哲学系发表讲话,称“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聂元梓讲话后,晚11时哲学系学生在大饭厅等处设立演讲台,传播聂元梓的讲话,批评工作组是保皇党。当晚我已吃过安眠药睡下了,突然被叫醒,得知聂元梓讲话的内容后,根据聂元梓提出的问题召开了领导小组紧急会议。在领导小组会议上,大家对聂元梓的做法非常气愤,说聂元梓曾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工作组所有工作情况她是清楚的,处理“六·一八”事件她也是表示同意的,为什么又跳出来反对工作组。杨克明也表示非常气愤。他表示“聂元梓本身有很多问题,需要向领导反映,让领导了解聂元梓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个人是不能依靠的”。领导小组研究认为,对这个新情况必须迅速向北京市委汇报,取得领导的指示。杨克明表示愿意随我一同去北京市委汇报聂元梓的问题。我于7月20日晨,到市委找到了李雪峰。李雪峰听了汇报后说:你们不能

把聂元梓的讲话简单看成是违犯组织纪律问题,要从政治上考虑问题,要考虑工作组本身工作上有什么问题。他要工作组听取聂元梓的意见,并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对工作中的缺点或错误多做自我批评,争取主动。当谈到杨克明在外边等着向他汇报聂元梓的情况时,李雪峰说“不听了,你们赶快回去”。我们随即赶回学校贯彻李雪峰的指示。

事后得知,就在聂元梓发表反对北大工作组讲话的同一天,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爆发了一场关于工作组问题的激烈争论。据7月23日李雪峰在全市各工作组组长会议上的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在7月19日和22日召开了扩大会议,讨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陈伯达在19日的会议上提出了反对派工作组的意见,认为工作组起了“坏作用”。刘少奇在会上说,大学里要不要派工作组的问题,是从当时怎样实现党的领导方面考虑的,派工作组比较机动。工作组的领导有缺点、出了毛病,但多数基本上是好的,现在还是帮助教育他们的问题。邓小平说:多数工作组是好的,不能撤,主要是教会他们如何做工作;多数工作组的成员是好人,搞“文化大革命”没有经验,对工作组的估计不能说都坏了,现在主要是帮助教育工作组。政治局会议上还对如何开展运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如:如何开展大辩论、辩论中如何领导、斗争面不能太宽、要明确斗争目标等。会议强调要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把队伍组织好。听了传达之后,我感到聂元梓19日晚的反工作组演说是很有来头的,她的演说与陈伯达同日在中央会议上的发言绝不是偶然的巧合,二者之间关系颇耐人寻味。就在这次传达会上,我作了发言,主要讲了北京大学的整改情况。

聂元梓19日发表反工作组的讲话之后,北京大学内部围绕着反对工作组和支持工作组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当时工作组根据市委的指示,正在认真研究考虑聂元梓的意见,并分头到各系广泛听

取广大群众的意见。我也亲自下到历史系去向学生征求意见。从当时反映的意见看,大多数师生不同意聂元梓的观点,对她带头反对工作组的行为很不满,并要求工作组“站起来”领导“革命”。21日校园内贴出不少大字报,大多是要求聂元梓就她反对工作组的演说澄清事实、回答问题的。这段时间有不少学生不断找我,反映对聂元梓的意见,有的表示要贴聂元梓的大字报,其中就有中文系学生张少华(我当时并不知道她的背景)。我劝告同学们说:聂元梓七人的大字报是经毛主席肯定的,你们贴她的大字报,就把阵营搞乱了,决不能这样搞。希望大家还是帮助工作组进行整改。

(五)

正当工作组认真进行整改,并在整改中得到大部分师生支持的时候,江青在陈伯达陪同下,于7月22日和7月23日两次来北京大学调查,说是了解北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第一次来调查时,我正在召开工作组会议,听取各方面对工作组的意见,准备做检查。听说江青来了,正在与聂元梓谈话,我感到不便前去打扰,以免干扰了中央文革的调查研究工作,因此让一位工作组的副组长去接待,并说明我正在开会作检查,什么时候要听取工作组的汇报,我即前往。但江青与聂元梓谈话以后就走了,并未要求听工作组的汇报。后来听说,江青、陈伯达这次来北大调查,说的不多。江青说:“我没有多少话要讲。因为我对情况不了解,我代表毛主席来看望你们,听听你们的意见,看看大字报”。陈伯达说:“我们不清楚情况,要调查研究”;“工作组要走群众路线”;“要采取辩论的方法把道理讲清楚”。“我们还要了解情况,回去后要研究”等。第二天,江青、陈伯达再次来北大调查时,我正好去北京市委听传达报告,晚上吴德留我谈话,回到北大已经很晚了。听接待江青的同志说,

已向江青说明,我去了市委。这次来北大,江青也没表示要听工作组的汇报,在听取了聂元梓等方面的意见后,江青发表讲话说:“我们都站在你们革命派一边”。还说“革命派跟我们在一块,谁不革命谁就走开”。陈伯达在讲话中强调:“江青同志讲的也是代表文化革命小组要讲的”。还说“要听取不同的意见,我们的意见是:说‘六·一八’是反革命事件是不对的,是错误的。”而1个月前正是他首先认定“六·一八”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并要求追查“地下反革命司令部”的。现在他不仅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而且闭口不提自己过去曾经发表的意见,反而板起面孔大批别人的所谓错误,真使人感到齿冷。这次江青、陈伯达到北大进行的“调查”,完全把工作组甩在一边,只与聂元梓等少数人接触,说明他们在如何对待工作组的问题上已经胸有成竹,预示着一场大风暴即将到来。

江青、陈伯达讲话之后,在北京大学进一步掀起了反工作组的浪潮,但北京大学内部在反对和支持工作组的问题上仍有激烈争论。7月25日晚,康生、陈伯达、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到北京大学召开座谈会,随后又召开了有万人参加的全校“辩论大会”。会上的辩论很激烈,多数发言者不赞成说工作组在处理“六·一八”事件中犯了路线错误。康生在会上发言说:“北大的文化大革命,你们是主人,不是工作组是主人”,公开号召群众起来反对工作组的领导。支持聂元梓的人登台批判工作组,说工作组把“六·一八”革命事件打成是反革命事件,把北京大学“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镇压了下去,把学校搞得“冷冷清清”,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对他们的观点,有许多同学登台加以批驳,说工作组是革命的,在处理“六·一八”乱揪乱斗事件的问题上是正确的,工作组是“延安”,而决不是“西安”。

7月26日,北京市委召开各工作组组长会议,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李雪峰讲了话,并传达了毛主席24、25两日在中央政治

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李雪峰说：前天和昨天开了两次会，总的方面主要讲“文化大革命”运动，其中几乎都讲的是大学工作组要撤退，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他传达毛主席话说：“文化大革命无非是革两个命。一个是斗坏人，搞黑帮；一个是搞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搞他们（指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你们（指与会者）行啊？我看你们不行，省委也不行，我也不行”。“什么教学改革，我也不懂，只有依靠群众，从群众里边集中起来。”“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现在工作组起的什么作用呢？两个作用。一个作用，阻碍的作用；一个是不会，一不会斗，二不会改”。“工作组一不能斗，二不能改，半年不行，一年也不行，只有他们本单位的人才能斗、才能改，斗就是破，改就是立，有破有立，只有依靠他们才行。”在当时中央的会议上，有些同志谈了各大学工作组的情况，有的认为北京大学的情况比较好。“限制了民主，向人家检讨了”。毛主席说：“我回北京的前四天（毛是7月18日回北京的），我是倾向保张承先的，但是有许多工作组是阻碍运动的”。会上有人讲到：工作组的同志是从全国来的，多数是好的，有从解放军来的。毛主席说：“什么海军、空军、陆军，什么张承先，你行？你行？你行？（指在座者）我也不行。”当有人谈到贴第一张大字报的聂元梓等七人中有四五个人现在不赞同聂元梓时，毛主席说：“分裂就分裂，不在聂元梓这个人有缺点，这是政治，她打了第一枪。”听了传达后，我感到毛主席当时的想法就是要放手发动群众，不怕乱，在乱中暴露问题，然后一分为二。对照这一指导思想，北京大学工作组在前一段工作中强调的要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开展运动的方针，肯定是不符合毛主席意图的。但毛主席虽然批评了北大工作组，也只是说北大工作组不会革命、阻碍革命，并没有说工作组反对革命、是保皇党。由此看来，我们的“错误”还是被看做是工作中的错误，只要我们诚心诚意地检讨自己的错误，是可以取得党和群众的谅解、顺利撤出北京

大学的。我在这次传达会上表态说：工作组在撤出学校之前，要站出来向群众作一个自我批评。然而形势的发展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就在7月26日市委传达毛主席谈话的当天晚上，江青等人再次到北京大学主持召开了万人“辩论大会”。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曹轶欧和中央文革其他成员都参加了大会。北京市委的李雪峰、吴德等人得到消息之后，也急急忙忙赶来参加会议。这个会议实际上成了批判斗争我的大会。会上，争论的非常激烈，双方相持不下，气氛十分紧张。大会进行中，几个北大附中的学生也上台来“揭发”：说北大附中工作组压制了他们，不让他们革命，他们几次找张承先反映意见，有时静坐半天，张承先都不见他们，最后见了，不但不支持他们革命，反而批了他们一顿，云云。在这些中学生发言时，江青积极插话鼓励，并带有煽动性地说：“大家看看张承先的官架子有多大，我来北大，他就不见我。”上面我已讲过，她两次来北大“调查”都赶上我有事分不开身，这些情况也都向她作了说明，她也没表示要听工作组的汇报，现在她却这样说，实际上是公开鼓动学生起来反对工作组。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对这种事情是无法辩白的，我只能对几个中学生提出的问题做了解释。我说：北大附中的工作是由张德华分管的。附中在运动中出现了违反政策的现象，如提出“打倒一切大大小小的权威”的口号，斗争普通教师，提出“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乱斗学生，等等，对此工作组的同志进行了劝阻。当有的学生不服来找我提意见时，我让张德华先出面接见他们，进行说服教育；后来有的学生非要见我不可，其中为首的几个是干部子弟（记得有彭小蒙、宫小吉等人），我即接见了他们，并以长辈的身分批评了他们违反政策的一些做法。我说明情况后，会场上鸦雀无声，看来江青的煽动并没有发生作用。

这时又有人上台来“揭发”说：“在‘六·一八’事件后的大讨论中，西语系的一名女生孙××被逼自杀了。”这一耸人听闻的“逼死人命”事件引起了会场的轰动，有人高喊“张承先交待！”“张承先交待！”对这个所谓的“逼死人命”的问题，我事先一无所知，当时只好说：我没有听说过有这件事，我查一查，如果确有此事，要认真处理。当时，自工作组成立以来一直是领导小组成员的曹轶欧在主席台上跳起来高喊“张承先要老实交待！”有的同学对这种作法不满，递上一个条子，要求当场宣读。条子中质问会议主持者：“你们是干什么的？你们有头脑没有？逼、供、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警告你们，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会脱离群众的。”康生听后勃然大怒，发脾气说：“只许工作组逼死人，就不许我们问一问吗？”事后查明，西语系确有一名女生因婚恋问题自杀未遂，根本与“六·一八”事件后的大讨论无关。会后，西语系的同学立即贴出大字报澄清事实真相，并质问歪曲事实的人意欲何为？西语系的工作组组长方明也立即对此事进行了调查了解，以备江青查问。但此事的事实已明，也就无人过问了。

由于在辩论大会上未能压倒支持工作组的意见，聂元梓的积极追随者孙蓬一上台发言，抛出了一枚“重型炸弹”。他说：“我刚从中宣部了解到，张承先在天津与陆定一有秘密勾结。”当时陆定一已经受到公开点名批判，把我和他拉在一起，无疑是一顶很大的政治帽子。所以，他的话音一落，会场上又响起了一片“张承先交待！”的喊声。我一听他把问题扯到北大以外的事情上去，就感到聂元梓等人已经没有什么文章可作！我沉着地走到扩音器前说明事实真相。我说：1965年春天，陆定一确实曾到天津休养，那时我正在天津医院住院治病。河北省委秘书长通知我说：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来天津休养了，你是省委分管文教工作的书记，应该去看望一下。我即去招待所看望了陆定一，并陪他吃了一顿饭。当时，中宣部副部

长许立群也在座，听他说是来向陆定一汇报学校“四清”工作的。当我问他们学校“四清”准备如何搞时，他说准备按延安整风的方式来进行。这次会面后，我即回医院治疗，以后没再与陆定一等人见面。我们之间的接触，完全是正常的工作关系。听了我的说明之后，会场上的群众很平静，没有人再追问这一问题。

此后，仍有不少群众上台来为工作组辩护。我当时心中很着急，我想大家千万别再登台为工作组辩护了，越辩护江青等人越下不了台，场面越难收拾。果然江青忍不住出来说话了，她情绪激动地高声喊到：“我揭发，张承先是个坏人。他把阶级斗争搞到我家里来了，我的女儿李讷在历史系受到坏人的迫害，这个坏人是张承先支持的。中文系有个叫张少华的是个骗子，她自称是我的儿媳妇，根本没有这回事，我根本不承认。这个骗子也是张承先支持的。”对她的这种“揭发”，广大师生感到十分惊愕，会后很多师生议论，真不像话，怎么把家庭问题也扯进来了。还有的同学故意问我，“你是怎样把阶级斗争搞到主席家中去的？”我唯有报以苦笑，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辩论大会的最后，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作了结论，他说：“对‘六·一八’事件怎么看，是革命事件！看成是反革命事件是不对的。对工作组的问题是阶级斗争的问题。在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问题上辩论得这样激烈不是偶然的，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我赞成大家的意见，撤销以张承先为首的北大工作组，这是一个阻碍同学们走上革命道路的坏工作组，一个障碍物，是压制你们革命的盖子。有的同学为工作组涂脂抹粉，除了别有用心的人不说，在一些同学中，好像没有工作组就不能革命了？要把压在同学们头上的盖子揭掉，让同学们自己起来革命。建议北京市委撤掉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随后，李雪峰代表北京市委口头宣布撤销工作组。江青建议北京大学“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作为文

化革命运动的权力机关,自己起来闹革命”。她还点名要聂元梓筹建这个委员会。

26日辩论大会之后,工作组即已无法进行工作,事实上被聂元梓夺了权。28日成立了以聂元梓为主任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工作组处于挨批判的状态。从7月30日至8月3日,校“文革筹委会”连续召开了3次全校批斗大会,批斗我和张德华,清算工作组的所谓错误。

8月4日,康生、江青再次来到北大参加大会,代表中央文革对北大“文革筹委会”的成立表示祝贺,并再次主持对工作组的批判。会上康生正式宣布撤销工作组,并对工作组“错误”定了性。他说:“聂元梓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宣言书,马克思恩格斯对巴黎公社是什么态度,你张承先又是什么态度!你把工作组的反革命的二十天报告仔细看一下,认真对照一下,完全是反动的报告,完全是反革命的立场,把革命群众说成反革命。”“你在北大镇压了革命!这是什么行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行为!”“你们犯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听了康生的话,我感到十分震惊。康生一向道貌岸然,我也一直把他当做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加以尊重,称他为“康老”,没有想到竟然是一个两面派。早在北京大学“文革九号简报”发出后不久,曹轶欧曾悄悄地给我通气说,中央对我们处理“六·一八”事件是很满意的,并将向全国批转我们的简报。从曹的口气中透露,这个消息是从康生那里得来的,康生本人也是同意的。至于工作组的《二十天情况报告》,则正是他的老婆曹轶欧批发的,他也没有表示过不同意见。现在他反过来说这是反革命报告,这种翻云覆雨的做法哪里还像一个共产党员呢?关于工作组的“错误”问题,在听到的毛主席的指示中,只是说工作组“阻碍革命”、“不会革命”,怎么到了康生口里就变成了“镇压革命”的“三反”行为了

呢？这样无限上纲，岂不是要置人于死地吗？其实工作组在江青、康生、陈伯达眼中，算不了什么。他们抓住“六·一八”制止乱揪乱斗事件大作文章，给北大工作组扣上“镇压革命”的罪行，其目的在诬陷刘少奇，诬陷他派工作组镇压革命，在全国推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江青在大会上作了发言，说“工作组是有靠山的。有什么靠山你们就揪他出来。”江青还要求学生揪住工作组不放，说：“什么时候你们认为不愿意听他们那一套了，再叫他们走。”康生、江青讲话之后，参加大会的北大附中的两个学生跑上台来揪掉了我的座位，并用皮带披头盖脸地抽打我。江青对此不但不加制止，还热烈拥抱了打我的那个女中学生。事后，我被打的事情不知怎么传到了毛主席那里。吴德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张承先可以和工作组一块出来，张承先有心脏病，有错误可以批判，但不能整死。此后，在北京大学的批斗会上，包括我 1967 年二次被揪回北京大学的批斗会，我都没有再被打过。我能安全地撤出北京大学而没有被整死，不能不说毛主席的这句话起了保护作用。

8 月 13 日，根据北京市委的决定，北大工作组全部撤出了北京大学。工作组撤出后，在北京市委党校进行整训。整训的主要内容是批判我的“错误”。这一时期，全国也掀起了批判工作组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整训中，北大工作组广大队员对于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对北大工作组所作的结论是不同意的。主持这次整训的原工作组副组长彭林是位老红军，他就在同我的个别谈话中表示不理解，说“我们到底犯了什么路线错误？”整训中，广大工作队员在档案内发现了曹轶欧的材料，特别是发现《关于北京大学二十天文化革命情况的报告》是她批的，上面并没有我的签字，大家对康生在群众大会上的表演非常气愤，连续 3 次派代表到北京市委，要求曹轶欧回来检查交待。北京市委当然不敢答应。工作组广大队员的气没有地方出，就把曹轶欧的批语用大字报公布

了。在批判我的会上，有的同志故意问我：你和曹轶欧是如何炮制“反革命报告”的。我只好说：“我是工作组组长，报告的指导思想是我的，至于谁批发，那只是个手续问题。”会后有的同志私下对我说，你这样答复好，如果你把曹轶欧拉出来，康生是绝不会放过你的。

工作组整训结束之后就解散了，我继续留在北京听候中央处理。到1966年10月左右，吴德派秘书来向我传达他的口头意见，说北大工作组问题还是一个工作中的政治路线错误，市委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并经请示中央同意，让我回河北。这样我就离开北京回到了河北。但北京大学的事并未就此了结。1967年初，聂元梓等人又根据江青的指示把我揪回了北大。到北京大学后，孙蓬一与我谈话，并让我看了江青批件，大意是说对张承先不能轻轻放过，要揪回来批透斗臭。根据她的这一“指示”，对我进行了多次批斗，这些批斗会的规模并不大，主要是追后台。重点追问邓小平通过他的儿子给工作组下了什么“黑指示”。我回答说，我根本不知道北京大学里有邓小平的儿子，系工作组也没有向我反映过这一情况，根本不存在邓小平通过他的儿子给工作组下指示这回事。追来追去没有结果，但就是不放我离开北京大学，把我软禁在一个学生宿舍里达半年之久。直到后来中央发出通知，提出在运动中不要揪住工作组问题不放，这才放我回到河北省。

《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出台的前前后后

方玄初

四届人大以前，国务院科教组的组长是刘西尧，副组长是迟群，另外还有负责人李琦、姚力。四届人大后，科教组取消，教育部恢复。

我于1973年调到科教组《教育革命通讯》工作，《通讯》的负责人是吉伟青，后来龚育之为副手。整个《教育革命通讯》编辑部的工作，由李琦分管。

四届人大恢复教育部，原科教组的许多人以为部长是迟群，没有想到是周荣鑫。有一天，李琦来到编辑部，跟我们打招呼，说周荣鑫同志马上就要上任了。鉴于当时的情况，他也不好多讲些什么，只意味深长地简短说了一句：新的领导班子肯定比过去要强。

跟周荣鑫一块走马上任的，还有副部长周宏宝。周宏宝原为上海第一钢铁厂三级车工，后来担任了上海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是中共十届中央委员。在我的印象中，他是工人出身，对教育较少发言，不像迟群那样霸道。从表面上看，在教育部内似乎没有太多的干扰。但实际上他是“四人帮”派来监视周荣鑫的。

周荣鑫上任前，科教组的大权都掌握在迟群手中。刘西尧被架空，有时来科教组看一下。那时迟群可以说是得意猖狂到了极点，有些事情，甚至不属于科教组的，他都能利用他的特殊身分把其他一些部门的领导人找来开会，听他趾高气扬地报告和传达布置。

周荣鑫很平易近人，到教育部后，认真了解情况，不久就开始

着手对教育的整顿。

首先,从整顿思想入手。教育部恢复后,迟群缩到清华大学去了,他手下的几员干将也走了,其他基本维持了原来科教组的人马,约四五十人左右。周荣鑫首先抓部内的整顿,从抓学习和思想整顿入手。六、七月间利用总结半年工作之机,集中时间组织了司局级干部学习班,并事先列出一些题目:如马恩列和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论述,怎样正确全面认识和理解毛主席七·二一指示和七·三〇指示?等等,让大家根据这些题目放开思想,联系实际敞开来谈。在这之前,由于吉伟青生病在家,龚育之另有任务,从5月份开始,由我负责《教育革命通讯》编辑部的工作。周荣鑫对《教育革命通讯》非常重视,常找我去谈情况,谈工作,对我的思想比较了解,也对我很信任,因此,要我在学习班上充分谈谈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能在学习班上起带动作用,并对此寄予厚望。因此,在这次学习班上,我首先作了一个3万字的长篇发言,联系马恩列的理论,比较系统地谈了当前教育上的一些严重问题,如:学校是不是传授知识的场所,学生要不要学文化,教育要不要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等,观点鲜明,措辞相当尖锐。接着吴寄寒发言,其他人的发言也很踊跃,过去一些属于“禁区”的话也在会上一吐为快。周荣鑫亲自主持学习班,显得非常高兴。

司局级干部学习班后,周荣鑫在8月23—30日在教育部召开北京、上海、天津、广州4城市中小学教育座谈会。当时周荣鑫并不想把目标搞得太大,先一步步地酝酿。因此这次座谈会时间并不长,规模很小,4个市各有1名局长参加,北京市是李晨参加,其他的记不清了。周荣鑫在会上作了几次讲话。他说:“毛主席从来没有讲过不要文化。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要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现在一谈起文化,就谈虎色变,怕得要死,赶忙出来说话,什么‘回潮’啊,‘又是七二年的风’啊!毛主席指示过的,

也可以不管，这样不成！”“几百万教师在培养学生，还天天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周荣鑫说完后，让我把在司局级干部学习班上的发言讲了一遍。我没有从头到尾参加这个座谈会，据说大家还谈得比较深，只是个别人的发言同会议不大协调。到了9月15—23日，教育部又在江苏无锡召开湖南、湖北、山东、江苏4省城市中小学教育革命座谈会。周荣鑫委托分管高教工作的姚力主持。会议传达讨论了周荣鑫的讲话，研究了城市教育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在两次座谈会前后，周荣鑫还在各种场合发表了许多讲话，这些讲话，曾被人们以手抄的方式在教育界广为流传。大家都很高兴，感到教育有了希望。据说，有一次邓小平在机场看见周荣鑫，对周说：现在学生都不念书了，你是教育部长，应当发表演说啊！这是对周荣鑫整顿教育的巨大支持。但是斗争也很激烈，有一次周荣鑫到航空学院讲话，紧接着就有人被派去“消毒”。从当时的情况看，周荣鑫的讲话在教育界确实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除了对部内的思想整顿、召开小型座谈会和在一些场合发表讲话外，周荣鑫还亲自抓《教育革命通讯》。每一期刊物的清样我们都送给他和李琦审阅。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毛主席说过‘矫枉必须过正’，但过正毕竟不是正，不能把过正看作是正。”为了在舆论上给教育整顿开路，我们按照周荣鑫的意图精心组织了《通讯》第8期和第10期的两篇评论稿子。第8期的评论《全面关怀青少年的成长》是约请北京市教育局韩作黎组织人写的，其中有一段专门讲文化学习的问题。现在看来似乎很普通，没有什么惊人之处，可是在当时这却是一个禁区啊，要偷吃禁果那还了得！紧接着周荣鑫又亲自出题目，要求发几篇重视基础理论的文章，这就有了后来的《研究基础理论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按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搞好基础理论研究》等。下面谈谈《通讯》第10期的评论《培养无产

阶级革命接班人的正确道路》。

说到这篇评论，很有意思。当时这篇评论最初打算用我们自己的话来论述，后来经反复研究，考虑到当时斗争的复杂情况，既要**对斗争有利**，又要**有权威性**，最后决定尽量引用毛主席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的话，都用**黑体字**排出，这样既有助于理直气壮地强化整顿教育的观点，又可作为“挡箭牌”，使“四人帮”和迟群之流“哑巴吃黄连”。因为《纪要》是在1970年经过毛主席批示“同意”的，当时在《纪要》中也谈到一些文化学习方面的内容，利用这些话来立论立据，在复杂的斗争中比较有力，也比较有利。对“四人帮”和迟群之流来说，也颇有点“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妙处。

根据我的了解和认识，当时周荣鑫的苦心是要抓学生读书的问题，这是个中心问题。邓小平要周荣鑫发表演说，提出的是这个问题，全国多少做父母的最焦虑的是这个问题，一切关心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和国家未来命运的人对教育整顿最期待解决的也是这个问题。文化革命居然革到不要文化，不要学生读书，受命当教育部长的周荣鑫怎能不心急如焚啊！

周荣鑫深深知道，要进行教育整顿，必须推倒压在教育战线上的两座大山，这就是对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并进行了酝酿。这个情况知道的人很少。大约是在1975年7、8月份，周荣鑫找了几个**人**，在小范围内酝酿了一段时间，并准备向中央起草一个旨在推翻“两个估计”的修改《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的报告。

“两个估计”是1971年张春桥、姚文元操纵下形成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里提出的，即：解放后十七年教育工作基本上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当时酝酿推翻“两个估计”，周荣鑫、李琦和我等几个同志在场。这个问题是周荣鑫提出的，先后商议过几次。当准备动手写的

时候,我们把《纪要》的原件找了出来,发现了一个大难题:《纪要》不仅经过毛主席圈阅,而且是毛主席批示“同意”的,“两个估计”又是《纪要》中最关键的部分,在当时要推翻它不但不可能,弄得不好还会引来严重的后果。几经商量无良策,只好暂时搁置起来。后来,周荣鑫改变了策略,认为《纪要》里头也有对我们整顿教育有用的东西,还是讲了一些“文化学习”,我们可以强调这些部分,打出贯彻《纪要》的旗号,在整顿教育中“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上面提到的《通讯》第10期评论文章用的就是这个策略。

要在全国内整顿教育,需向中央和国务院写报告,争取中央能转发下去。于是周荣鑫提出了起草《教育工作汇报提纲》的问题,希望用这种方式来改变教育界的状况。当时胡耀邦在科学院就已经先搞了一个《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

为起草《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当时专门成立了一个由几个人组成的小组,并由我负责起草工作。经过讨论,确定把《汇报提纲》立论的基点放在“新的形势重新把‘十年树人’的历史任务提到我们面前”这个命题上,即把毛主席1957年曾经提出的“我们要在十年内培养自己的无产阶级的庞大的技术队伍,百年树人,应该改为十年树人。没有这一条,社会主义建设不成。无产阶级没有庞大的技术队伍、理论队伍、专家队伍(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专家队伍)不行”这段论述,作为《汇报提纲》的旗帜,联系实际明确提出:要是教育上不去,就会拖后腿,影响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和四个现代化的全部进程。

《教育工作汇报提纲》第一稿写得直接干脆,比较尖锐,文字也较长。10月8日,在第一次研究《汇报提纲》时,周荣鑫说:“小平同志讲了两句话,形势大好,形势逼人。要看到逼人的一面,要头脑清醒;要端正路线,要有干劲搞四个现代化。”“汇报提纲的精神,要用小平同志的讲话来武装。”

到了第二稿的时候,《提纲》主要从正面阐述了4个关系问题:政治和业务、理论和实际、以学为主和兼学别样、教师和学生。一方面既全面讲清楚这几个关系,另一方面又联系实际明确提出要纠正排斥业务和不敢搞业务的倾向、学校不坚持以学为主的倾向、轻视基础理论的倾向、不敢教育和管理学生的倾向。《提纲》还专门谈了“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问题和整顿领导班子。此外,还汇报了高等院校下放后产生的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意见。

二稿起草后,周荣鑫说,稍微搁一下。此时《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已经送交中央,听周荣鑫讲,科学院方面也修改了好几稿,最后一稿是尽量地引用马恩列和毛主席的话来立论的。

过了不久,周又对我说,《教育工作汇报提纲》要加强有关阶级斗争的内容。估计周的这个考虑,同刘冰等人的信和当时形势的变化不无关系。8月13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党委常委、政治部主任吕方正4人联名写信给毛主席,揭发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的问题。信中说,迟群自党的十大、四届人大以来,由于没有当上中央委员和教育部长,个人野心没有得到满足,攻击中央领导同志;毫无党的观念;搞一言堂;任人唯亲,封官许愿,违反党的政策;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严重等。两个月后,刘冰又再次上书毛主席,继续揭发迟群对毛主席、周总理不满,公开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假左真右;和谢静宜大搞阴谋活动。刘冰的这封信是经李琦、胡乔木送上去的。当时周荣鑫对此比较乐观,但后来情况却起了变化,毛主席亲批这封信的矛头对着他的,同时迟群的亲信林均万(原在科教组,后来去了清华大学)写信诬告周荣鑫,为迟群辩护。估计是在这种情形势下,周荣鑫嘱我增加“阶级斗争”的论述,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讲清当时教育界存在的问题。

《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后来的情形是这样的:毛主席看了刘冰

等人的上书和林均万的诬告信后作了批示，“四人帮”即将刘冰等人的两封信指为诬告信，借机挑起了“教育革命大辩论”。11月3日，在迟群主持下，清华大学连续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就刘冰的信展开“辩论”。就在《汇报提纲》（11月10日稿）送到周荣鑫手上以后几天，11月18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便贴出了大字报，公开点名批判刘冰和周荣鑫。

这时，周荣鑫、李琦都“靠边站”了，薛玉珊从清华大学迟群那里回到教育部，任教育部临时领导小组副组长（迟群是组长），控制了教育部。紧接着，他把教育部的人拉到清华大学去看大字报。当时大字报的主要内容是攻击《教育革命通讯》8月和10月刊登的两篇评论，诬蔑周荣鑫在教育战线刮“右倾翻案风”，随即从批周荣鑫上挂到邓小平，对邓小平公开进行点名攻击。

当时《汇报提纲》第三稿（即11月10日稿）虽然已经送到周荣鑫的手中，但还没有上报国务院和党中央。在清华大学看大字报的时候，薛玉珊专门把我叫到一边，责令我交出两样东西：一是《汇报提纲》和原稿、修改稿；二是我在司局级干部学习班的发言稿，并要我交代周荣鑫是怎样向我布置的和向我讲过一些什么。

薛玉珊原来是军宣队的人，留在科教组的。周荣鑫任教育部长后，他回到部队，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时又到了清华大学迟群那里。除了他向我要《汇报提纲》和原稿、修改稿外，周宏宝也问过我关于《汇报提纲》的情况。我对他们说：稿子是我起草的，还未经周荣鑫修改审定，不好说是周本人的东西，也不好说都代表他的看法，《汇报提纲》稿中的错误只能由我负责。《提纲》的底稿很乱，我没有保留下来。我还对周宏宝说：当时你在教育部，许多情况你也是知道的。周宏宝默然，没有再说什么。至于我的那份发言稿，在薛玉珊规定的限期内我照原来所讲的底稿未加改动抄出来上交了（薛玉珊曾指令大批判组组织力量进行研究，肃清流毒）。

过了大半年,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就在这一两天内,我看到了教育部临时领导小组刚下发给所属各单位的一份组织批判《汇报提纲》的文件,后附《汇报提纲》(11月10日稿)。文件中有张春桥批示的一段话,说《教育工作汇报提纲》是“第四株大毒草”,要组织批判。教育部临时领导小组给张春桥的关于《教育工作汇报提纲》问题的请示报告送得太晚了,对此,张春桥大为恼火,在批语中还斥责了一番,说错过了同前“三株大毒草”一起批判的良机。当时,我笑了,“四人帮”已经被抓起来了,你们还批什么啊!那几天,薛玉珊等人像热锅上的蚂蚁,到处打电话找迟群、谢静宜联系,哪里还能联系得上呢?

周荣鑫1975年任教育部长,虽然不到一年,但他跟随邓小平励志整顿教育的思想是很明确的,决心是很大的,从整顿教育部司局级干部的思想开始,到最后主持起草《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希望能获得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批转,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教育工作的整顿,整个工作的脉络也是相当清晰的。“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由于形势的急剧恶化,周荣鑫整顿教育的进程被迫中断,而他自己也于1976年4月12日被“四人帮”迫害致死(“四人帮”成立了专案组,对他不停地追查,1976年4月12日上午,周荣鑫昏厥在自己办公室的追查会上,当晚就去世了),时年59岁。(周荣鑫去世后,薛玉珊等人集中力量追查和迫害李琦,被重点追查的还有办公厅的张文惠和盛丽华,并商定了一个下一步清查和批判的名单。)而周荣鑫主持的《教育工作汇报提纲》由于既未上报下发,“四人帮”也没有来得及批判,加以当初在起草时知道的人很少,看过的人更少,时过20多年,几乎已经湮没无闻。最近,幸得教育部从周荣鑫的档案材料中发现了当年送给他最后审定的《汇报提纲》原件,才使这件珍贵的教育史料重见天日,让人们得以从中了解这段令人扼腕的曲折的历史。

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一个转折点

蒋本良

和众多翻译出身的外交工作者一样，我的外交生涯是和我的翻译生涯相互交织的。我一生中担任的最具重要意义的两次翻译工作，一次是1975年9月7日周恩来总理最后一次会见外宾，另一次是1985年10月9日，邓小平作为顾问委员会主任会见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告别翻译。在这次会见中，邓小平利用当时戈尔巴乔夫新任苏联最高领导正全面调整对外政策的时机，以带口信的形式，采取了一项重大战略行动，对中苏关系和世界格局，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如果要我给戈尔巴乔夫当参谋”

1985年初，齐奥塞斯库通过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米库列斯库向钱其琛副外长提出，拟应邀以罗共总书记和共和国总统双重身分，偕夫人于下半年访华。从中罗两国间密切的友好关系出发，中国决定以胡耀邦总书记和李先念主席共同名义，邀请齐奥塞斯库夫妇访华。

关于访问的意图，罗方表示：在经济方面，希望大幅增加两国贸易额；在国际问题方面，建议中苏关系正常化，中越就避免冲突达成协议，中国参加五个核大国谈判、以某种方式参加经互会；在访华期间能会见邓小平，齐奥塞斯库夫人埃列娜希望会见中国著

名科学家并参加正式会谈。

10月7日，齐奥塞斯库率代表团抵华访问。约40人组成的代表团中，正式团员主要是党政领导人，其中有第一副总理、外长、外贸副部长、总统顾问和驻华大使。在齐奥塞斯库抵京前两天，罗方突然提出，齐奥塞斯库的长子瓦连丁随同来访，其礼宾顺序排在正式团员之前。对此，齐奥塞斯库夫人埃列娜后来在访问期间对李先念夫人林佳媚解释说：她的女儿和小儿子都来过中国了，瓦连丁这是第一次访华，他是原子能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

齐奥塞斯库抵京第3天，10月9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代表团一行。上午9点一过，我们接待班子工作人员，在钱其琛副外长带领下，从钓鱼台国宾馆的元首楼、齐奥塞斯库夫妇下榻的18号楼出发，先期来到大会堂。接着，参加陪见的李鹏副总理、陈慕华国务委员等，也先后到达。10点差一刻，邓小平到达福建厅，李鹏和陈慕华即向他汇报了齐奥塞斯库抵京后的访问和会谈情况，说齐奥塞斯库在两国贸易方面提出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希望中国成为罗马尼亚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我们不能完全满足。10点正，齐奥塞斯库一行在礼宾司长唐龙彬带领下走进大厅。邓小平在大厅门口迎接客人，唐龙彬和我在旁把排成长龙的客人们的职务，向邓小平一一作了介绍。

邓小平请齐奥塞斯库夫妇入座后，即问齐奥塞斯库同李先念主席和赵紫阳总理谈得怎样？齐奥塞斯库称赞说，达成的谅解和协议很好。埃列娜也插话说，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落实了。接着，邓小平介绍了中国开始的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改革。在讲到中罗两国经济增长率都是7%时，邓小平幽默地说：“这一点我们也是一致得很哪！”一句话使全场气氛顿时活跃轻快起来。随后，邓小平利用这个机会对外宣布了不久前中国作出的、使后来中国外交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的、中国对外政策的两项重大调整。邓小平说：我们

1982年见面以来，中国对外政策在两个问题上有了变化。一个是战争与和平问题。过去多年，我们一直强调战争不可避免。经过这段时间观察，和平的力量和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这对两个超级大国发动战争有制约作用，使他们不敢轻易发动战争。也是根据这样的判断，我们确定了改变过去“一条线”的战略方针。现在情况变了，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和平也可以赢得。所以，我们对外政策由“一条线”的战略方针，改变为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对这条新的外交路线形成的时间，邓小平补充说：上次见面时，我们这个概念开始形成，但还不清楚。今天可以清楚地以此来确定我们的对外政策了。听到邓小平这番论述后，齐奥塞斯库感到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使中罗之间的共同点增多了，十分兴奋，高兴地说：对独立问题，我们一贯有共同的立场。现在，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我们的立场也是完全一致的了。

齐奥塞斯库看到双方的谈话越来越投机，气氛也十分融洽，就把话题转到了他最关切的中苏关系问题上来，他以调解者的姿态对邓小平说：中国和苏联关系正常化不仅对你们两国重要，而且对社会主义各国和世界和平都很重要。对此，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苏关系问题的实质，他说，同苏联的问题就是消除三大障碍的问题。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做了很多积极的表示，但在消除三大障碍问题上始终没有松口。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不但解决了中越关系正常化问题，而且解决了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如果我给戈尔巴乔夫当参谋，我就建议他接受这一点。这时，齐奥塞斯库赶紧附和道：“我也准备这样做”。接着，邓小平进一步指明了消除三大障碍的途径，晓以利害地说：这么一做，中苏关系就可大大前进一步，中越关系正常化也就迎刃而解。而且，越从柬撤军，对苏没什么损失，它那基地还在。所以，这是最容易做的。消除三大障碍首先从这件事做起。随后，邓小平话锋一转，向齐奥塞

斯库说：“你可以见到戈尔巴乔夫吗？”事有凑巧，就在当月要举行华沙条约各国首脑政治协商会议，所以齐奥塞斯库说：就在22日，我们要在保加利亚的索非亚见面。邓小平乘势直截了当地提出：“你给我带个口信好不好？”齐奥塞斯库很痛快地就应允了：“好，当然可以。”于是，邓小平陈述了这个重要口信的内容：“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越南从柬撤军，而且能办到，我或者胡耀邦同志愿意跟戈尔巴乔夫同志会见。”邓小平还补充说：“我出国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但是，为了这样一件好事，我可以破例。”

齐奥塞斯库接受了这项重托，在中苏两个大国之间进行传话，既符合他谋求中苏和解的意图，又可以借此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所以觉得非常高兴，对邓小平的建议连连表示欢迎。但是，他仍感到不满足，又提出中越关系问题来，建议中国在越从柬撤军之前，就同越进行谈判，说同越谈判达成谅解，也可以促进同苏达成谅解。齐奥塞斯库的这番言论，遭到了邓小平的拒绝：“没有越从柬撤军这个条件，谈判没有用，那是搞政治骗局，欺骗世界舆论。”邓小平柔中有刚地补充说：“对越南，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我比你了解得多一些！”邓小平这句既风趣又辛辣的话，引起全场哄然大笑。最后，邓小平又回到苏联问题上来，指出要对它听其言、观其行：“我要告诉齐奥塞斯库，我们看苏联要看具体问题。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究竟是不是真正的变化，要看中苏关系是不是真正正常化。如果戈尔巴乔夫愿走一步两步，我们非常欢迎！”邓小平还郑重地交代说：“你向他转达以后，我们等候答复。”

会谈之后，接着举行授勋仪式，齐奥塞斯库给邓小平补授1年前邓小平80寿诞之际，罗政府颁发给邓小平的“罗马尼亚共和国之星”一级勋章。齐奥塞斯库表示，“授给您这个我国的最高勋章，是因为您为发展罗中友好合作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也因为您过去和现在为促进社会主义、和平和国际合作的普遍事业进行了不

懈的活动。罗中两国关系是持久和坚如磐石的，经受了困难的国际环境和历史的任何考验。祝您健康、长寿、精力充沛！”齐奥塞斯库随即把系有勋章的绶带，斜戴在邓小平的身上。招待员马上用托盘送上香槟酒，在碰杯声和热烈的祝贺声中，邓小平走向麦克风致辞：“这不仅是给我个人的崇高荣誉，更重要的是体现了罗中深情厚谊，我将为长期、稳定、全面发展中罗友好合作继续作出贡献。”

仪式结束后，本来会见也应该结束了，可是齐奥塞斯库又转身对邓小平说，他还有几句话要说。这样，在记者再次退场以后，邓小平和齐奥塞斯库又回到座位上。齐奥塞斯库希望邓小平能再次访罗，他说：“如果您准备去莫斯科，那就离布加勒斯特很近了，所以请您去莫斯科后到布加勒斯特来访问。”邓小平对此作了客气的推辞，没有作肯定的答复，只是说：“那另外商量吧！还要看这个事搞不搞得成啊！如果同苏联能够达成这样一个谅解，我可以破一次例。不过，我刚才说了，我或者胡耀邦同志。”齐奥塞斯库赶紧说，“您去更好，最好还是您去。”对此，邓小平说：“为了这样一件好事，我愿意去。”最后，邓小平告诉齐奥塞斯库：“其他问题你同胡耀邦同志谈。”

送走客人以后，参加陪见的李鹏和陈慕华以及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仍围站在邓小平四周，想知道邓小平还有什么指示和交待。这时，邓小平以他那浓重的四川口音一字一板地道出了这次会见的重大意义：“我今天打了一张大牌哦！”以后国际事态的演变，完全证实了邓小平的预言：他今天的这个口信，确实是在国际战略格局中打出的一张意义非凡的大牌。

一石激起千层浪

齐奥塞斯库结束访华以后，即赴保加利亚参加当月22日和

23日在索非亚举行的华沙条约首脑会议。后来，罗马尼亚派罗共中央候补执委、中央书记、国务委员会副主席埃纳凯到中国来通报说：在索非亚会议期间，齐奥塞斯库专门约见戈尔巴乔夫，进行了1小时的会谈，转达了邓小平的口信。戈尔巴乔夫耐心认真地听取了邓小平的口信，当即表示要予以认真考虑。

邓小平短短一句话的口信传到苏联后，在苏上下引起了强烈反响。11月初，苏共专门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邓小平的传话。11月7日，在十月革命节68周年招待会上，戈尔巴乔夫对我驻苏大使李则望作出初步反应，确认已经收到邓小平的口信：“贵国领导人通过齐奥塞斯库转达的信息，我们已经收到。现在我们有一切可能把两国关系提高到新的高度，我们应该走上一条新路，我们有这个政治意志和决心，让我们行动吧！”戈尔巴乔夫谈话时，站在3米外的葛罗米柯，尽管听不清戈尔巴乔夫的谈话，也默契地对李则望说：“我完全同意戈尔巴乔夫对你说的话”，以显示苏领导集体对此意见完全一致。与此同时，苏驻华使馆也给我外交部透露说，苏领导非常重视邓小平的口信，认为这是一个重要姿态，正在研究寻找办法，克服两国关系中的困难。

正当苏方急于导机，以给中方正式答复的时刻，恰巧李鹏副总理访问完捷克和保加利亚，回国途中要路过莫斯科作短暂停留。苏方立即抓住这个机会，迫不及待地要同中方举行会见。但是，中方通知说，李鹏只是过路，住在使馆。苏方为实现中苏会见的目的，首先千方百计地想把“短暂停留”，变成完全由苏政府接待的“访问”。为此，副外长贾丕才给中国使馆说，苏将邀请李鹏作为苏政府客人，食宿、服务、医疗、警卫完全由苏方负责。在我方重申了“李鹏只是路过，不是访问，时间很短，将住在使馆”以后，苏外交部部务委员、第一远东司长罗高寿又约见中国使馆代办，当面手拿“苏共中央批件”照本宣读说，苏邀请李鹏及随行人员作为苏政府的客人。

在我方再次婉拒以后，罗高寿又以“莫斯科道路交通不便，警卫和车队不能分”为由，坚持起码由苏方提供车辆。其次，在接待规格上层层加码，以达到戈尔巴乔夫亲自出马同李鹏会见的目的。贾丕才副外长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中方暗示，想让中方提出要求会见苏领导。原商量好的接待规格是：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机场迎接，部长会议副主席塔雷津陪同观看文艺演出。可是，贾丕才又给中国使馆打电话说，“除已商谈好的日程外，李鹏同志如想会见更高的领导人，苏方将给以积极的考虑。”李鹏抵达莫斯科后，贾丕才又当面对李鹏说，“如果您希望会见我们最高领导人的话，我可以安排。”到11月23日，在时间已经十分紧迫、第二天李鹏就要回国的情况下，贾丕才更是直截了当地在李鹏同塔雷津会见时，给李鹏递条子说：“李鹏同志，如果您准备见的话，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同志可以在今天下午十六时同您会见。”经过请示国内，我方答复苏方说，“李鹏副总理是路过，苏方哪位领导人准备见，可由苏方安排。”这样，终于举行了戈尔巴乔夫同李鹏的会见。

苏方之所以精心安排这次同李鹏的会见，是赋予了这次会见以高度的特殊的意义的，目的就是要对邓小平的口信给以答复，作出积极反应。

11月23日下午，戈尔巴乔夫同李鹏会见，苏方参加陪见的是总书记助理沙拉波夫，中方是李则望大使。会见进行了两小时一刻钟。戈尔巴乔夫在会见中作了长篇讲话，实际上是一篇经过充分酝酿的苏联新领导全面系统的对华政策声明。作为对邓小平口信的答复，戈尔巴乔夫在讲话中突出了“加速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新方针。戈尔巴乔夫说，“苏共中央政治局对目前苏中关系的评价是：不仅趋向正常化，而且趋向改善。政治关系方面，在一些问题上有共同点，但分歧也很多。”他表示，两国应恢复和建立一种积极的关系，“越快越好！”应该根据两国的根本利益来制定相互的政策，而

中苏作为两个社会主义邻国，根本利益是吻合的，“积累的问题或者能找到解决办法，或者将随着时间消失”。“我以苏联国防委员会主席身分向中国表示，苏联在远东的军力绝不威胁中国。”苏中两国有可能在国际舞台上扩大合作范围，如不是联合行动，至少可以平行行动。在具体建议中，他把重点放在实现两国最高级会晤上，说把两国关系提高到最高级别的时机已经到来，甚至提出在他不久去远东视察之际，在中方或苏方领土上、或在海上“就举行这种会晤”。他还提出两国关系离不开执政党之间的关系，所以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作为恢复两党关系的开端。

李鹏在戈尔巴乔夫长篇讲话后作了简短发言，表示中苏间确实存在一些共同点，但也有许多分歧。我们真诚希望两国和平共处，但“中国不会成为你们大家庭一员，苏联的小兄弟，而愿成为你们的好朋友、好邻居，平起平坐的朋友”。这时戈尔巴乔夫赶紧插话说，“苏联绝没有把中国当成小兄弟的意思，至少可以接受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中苏关系。”李鹏还重申了中国反对搞联合行动的立场说，你们想同美国改善关系，我们支持。“我劝你们放弃搞联合行动或平行行动的想法。”当李鹏讲到，如中苏领导人见面，越柬问题理所当然应优先讨论，戈尔巴乔夫立即表示，“那就让我们而谈吧！没有不能谈的题目，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包括越柬问题在内。”但是，戈尔巴乔夫又以“我们不能代替越柬解决问题啊！”为幌子，来搪塞自己支持越南侵柬的行为并推卸责任。

戈尔巴乔夫同李鹏的会见表明，在邓小平口信的推动下，苏新领导重新审定了整个对华政策，确定了“加速关系正常化”的新方针；改变了过去对三大障碍问题的僵硬态度，表示这个问题也可以商谈；同时原则上接受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两国关系的基础。从此，苏联在这一新方针指导下，大大加快了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步子。当年年底，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使节时，对李则望大

使说：我们进行了一次有意义的会见，“希望这能产生新的推动。大使同志，行动吧！”

在“大三角战略”游戏中“打牌”

邓小平口信打出的这张“大牌”，启动了中苏美大三角新一轮的牌局游戏。苏美都争打“中国牌”，以加重自己的战略地位。邓小平以他高超卓越的“牌艺”，趋利避害，为我所用，非但没有被苏美利用当作他们的筹码，反而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戈尔巴乔夫在实现“加速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方针中，始终是把眼睛盯着美国的，所以尽力回避“三大障碍”的实质问题，而追求“中苏高级会晤”的轰动效应。1986年4月，苏外长谢瓦尔德纳泽会见钱其琛副外长时，又催促进行“高级会晤”说：“戈尔巴乔夫今年夏天要去远东视察，愿在苏境或中方境内，在边界上或海上同中国领导人会见。”而邓小平在1986年1月10日的一项批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充分利用中苏每一点改善，打中国牌，从中国得到好处，此点必须时时警惕！”根据邓小平的指示，1986年1月20日，吴学谦外长约见苏驻华大使谢尔巴科夫，对戈尔巴乔夫在会见李鹏时提出的建议作出正式答复：“要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苏必须在消除障碍方面前进。”中苏高级会晤的前提条件，是苏联必须首先达成谅解，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

眼看着“高级会晤”这张牌不能马上到手，苏联又打起“外长互访”的牌来，要求尽快实现中苏两国“外长互访”。针对苏联打出的这张“新牌”，邓小平一再提醒要谨慎。1986年1月10日，邓小平在外交部一份请示报告上批示：两国外长互访“暂不确定，至少推迟”。1986年9月10日，邓小平又对吴学谦外长说：要把分寸掌握好，不要轻易把牌都打出去。外长互访等一下。外长互访就意味着

正常化,美国、西方就要考虑同中国关系问题。你在联合国同他见面,有问题可以在那里谈,见面同互访性质不同。国际上外长互访就是关系正常化,至少是半正常化,外长代表国家。又说:现在是真正体现三角关系,走得太远不利,现在吊着对我有利。

邓小平还针对苏“虚多实少”的策略,反其道而行之,在两国交往中实行“实多虚少”的方针,强调先从同中国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经贸、边界问题入手,改善中苏关系。他在同吴学谦的一次谈话中说:“世界都在看我们,同苏联的贸易关系和人员交往发展下去,不会丢掉东西。可先搞边界划定。”因此,中苏关系在政治领域未取得重大突破之前,在经贸、边界问题上,在互利基础上首先取得了较大进展,为全面改善关系奠定了基础。

在邓小平战略思想指导下,中苏关系获得了稳步的发展。在捎去邓小平口信的第二年7月,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讲话中,表示苏联将分阶段从阿富汗撤军,并正在同蒙古讨论撤出大部分苏军问题。9月,两国外长在联大会晤中,达成了恢复两国边界谈判的协议。到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终于同邓小平真正举行了高级会晤,中苏关系实现了完全正常化,邓小平宣布两国关系“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邓小平大三角战略牌艺的高超,使苏方的一些官员也深感佩服。1985年12月5日,深谙中国问题的苏副外长贾丕才访华时说:“中国外交政策的出发点是美中苏大三角关系,中国从中选择了一个最有利的地位,有时坐山观虎斗,有时迂回在美苏之间,坐收渔人之利。”

雷任民与 1954 年日内瓦会议

王 红 续

1954 年 4 月至 7 月召开的日内瓦会议,是一次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政治会议,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为促成印度支那停战作出了举世公认贡献。但是,大家很少了解到,周恩来还领导中国代表团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积极开展对西欧国家的贸易活动,改善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关系,在美国“封锁、禁运”的壁垒上打开了很大的缺口。

时任中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的雷任民,作为中国代表团的首席顾问出席日内瓦会议。在周恩来的领导下,雷任民带领一批精明强干的贸易工作者,与西欧国家的政府官员和工商界人士频繁接触,取得了重大成果。

一 周总理确定的任务与雷任民担当的角色

日内瓦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参加的大型国际会议。为开好这次会议,周恩来倾注极大的心血来抓出国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3 月 2 日,周恩来提出的《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得到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原则批准。《初步意见》提出了中国代表团参加会议的政治目标,即尽一切努力务期达成某些协议,甚至是临时的或个别性协议,以利于打开经过大国协商解决

国际争端的道路。但周恩来没有把视野局限于日内瓦会议规定的政治议题上。他在《初步意见》中接着又写道：“日内瓦会议的议题虽只规定为讨论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但并未排除讨论可能提出的具体问题。”“因此，我们除朝鲜和越南问题外，还必须准备其他有关中国、远东及亚洲的和平与安全等问题的材料和意见。尤其是发展各国间的经济关系和贸易交通往来，更为缓和国际紧张关系、打破美帝封锁禁运的有效步骤。在会议外，中英、中法、中加的相互关系也会触及，我们亦应有所准备。”^①

经过反复研究，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确定了中国代表团要在会议上争取达到的主要目标和次要目标：第一，推动会议在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上达成某种协议，这是最重要的政治任务；第二，充分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改善与西欧国家的贸易关系；第三，通过政治合作与贸易接触，推进中国与英国等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总之，周恩来把和平与贸易、经济与外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力图使它们相辅相成。

周恩来为日内瓦会议规定明确的贸易目标不是偶然的，是他自新中国成立后领导外贸等部门努力打破西方对华“封锁、禁运”的继续。建国前后，美国已经开始宣布了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的各种法令。1951年5月，美国更是操纵联合国大会非法通过对中国实行“禁运”的提案，致使参加“禁运”的国家达36个之多。同时又在“巴黎统筹委员会”内专门设立“中国委员会”，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禁运”的管制。当时，我国国民经济正处于恢复时期，同时还在进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封锁、禁运”给新中国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困难。面对这种形势，周恩来直接领导了外贸部门反“封锁、禁运”的斗争，规定了总的指导方针，提出了一系列措施

^① 《周恩来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56页。

和策略。其中包括,重视从对西方国家和亚非国家贸易中寻找突破口,争取从这些国家进口更多的急需物资,打破“封锁、禁运”等限制;并通过广泛开展同这些国家的交往,促进贸易关系的正常化,进而逐步实现邦交正常化。

周恩来特别重视利用一切国际活动的机会,派中国外贸工作者出席各种国际会议,以便在会上争取和团结各国工商界朋友和各界开明人士,积极扩大民间贸易往来,以求造成“以民促官”的态势。他曾精心指导我国外贸等部门选派代表参加1953年4月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同年2月4日,周总理亲自指定雷任民出席这次会议。雷任民在会前主持制定了贸易活动方针和计划,并在会议中努力加以实施。这次国际经济会议使中国对西方国家和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取得了初步的突破,与英、法等11国签订了民间贸易协议。

日内瓦会议召开之前,形势的发展更有利于中国进行反“封锁、禁运”斗争。第一,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后,一些西方国家对美国操纵下的“封锁、禁运”开始产生离心倾向,不少国家成立了旨在促进东西方贸易的民间组织,英、法两国的国际贸易促进会还于1953年春夏组织工商代表团访华,签订贸易协议。第二,随着朝鲜停战协定于1953年7月签订,美国的“封锁、禁运”政策更加不得人心,西方反对“禁运”的呼声越来越高。西欧许多国家的舆论都认为,朝鲜停战以后,对中国继续实施“禁运”既有损于中国,又有害于西方。法国舆论甚至认为,“禁运”侵犯法国主权和尊严;西德工业界主张取消“禁运”;英国政府在国内压力下也不得不采取某种积极态度。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前,西欧许多国家的政府和民间都对会议抱有很大希望,认为只要朝鲜和印度支那和平两大政治问题能够获得某种解决,就可以缓和“封锁、禁运”,改善对华贸易关系。可见,周恩来为中国出席日内瓦会议确定的贸易目标是顺

应了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因而具有充分的可行性。

在确定中国出席日内瓦会议贸易任务的同时,周恩来已在考虑选派得力的干部来担当这一重任。他在《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中提出:“中国代表团拟以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及一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五人组成。”^①从这个文件来看,周恩来总理为达到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的贸易目标,改善中国与西方的贸易关系,曾设想由一位外贸部副部长担任中国代表团的正式代表。实际上,周总理准备让雷任民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会议。

但是,经过中央书记处的反复讨论,最后中国政府正式宣布组成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代表团名单是:首席代表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担任,张闻天、王稼祥和李克农为代表。除了4位正式代表外,又任命王炳南担任秘书长,雷任民、师哲、乔冠华、宦乡等担任顾问,其中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雷任民是首席顾问。据雷任民回忆,周恩来特地指定由他出任代表团首席顾问,任务是率领贸易工作者在会议期间与西欧尤其是英国人士进行广泛深入的贸易接触,以英国为突破口,争取打开中国对西方贸易的新局面。周总理还说:不仅要打开贸易缺口,能有突破的就突破,还要宣传中国建设情况。此外,毛泽东和周恩来之所以改变让外贸部副部长作代表团正式代表的原先考虑,第一,这是鉴于日内瓦会议是一次政治会议的性质,要突出重点;第二,让雷任民担任代表团首席顾问而非正式代表,也主要是为了能够更方便地开展贸易接触活动,更广泛地结交朋友。比如,以顾问身分出现在日内瓦,就可以去小饭馆。^②

^①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版,第356页。

^② 1998年9月25日访问雷任民记录。

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外贸部常务副部长雷任民迅速挑选一批出席日内瓦会议的外贸干部，并主持制定了贸易活动方针和计划。

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后，周恩来总理与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等就日内瓦会议交换了意见，实际上是请示苏方，并协调各方的行动。

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周总理有一天对雷任民说：北京全聚德烤鸭店在莫斯科办了一所分店，不知经营情况如何。你是不是请代表团在那里吃一次，让大家给提提意见。雷任民欣然领命，安排全体代表团成员到全聚德设在莫斯科的这家烤鸭分店会餐。在品尝的过程中雷任民发现，这里制作烤鸭的方法与北京的有所不同：国内用的是填鸭，而这里用的是一般的鸭子；国内端给客人的是热的烤鸭，而这里给客人上的是凉的。总之，莫斯科分店没有按照北京全聚德烤鸭店的正宗做法，效果显然差了许多。雷任民向全聚德莫斯科烤鸭分店提出了这些意见。这家分店很高兴地接受了，以后恢复了传统的烤鸭制作方法。莫斯科烤鸭店以其正宗独特的风味获得了苏联顾客的欢迎，又在莫斯科和苏联其他城市开了不少分店。这件事虽小，却反映了周总理对中国对外投资企业保持自己特色和风味以扩大影响的重视。

1954年4月24日，雷任民率领一批外贸工作人员随代表团抵达日内瓦。雷任民等人到日内瓦后，没有同周总理等代表团多数成员一起住在城郊莱蒙湖畔查尔索瓦镇的万花岭别墅，而是住在市内的宝瑞华旅馆。这是周总理决定的，为的是方便雷任民及其助手们广泛开展贸易活动。虽然分开居住，但雷任民仍天天去总理住的地方参加汇报会，坐的是驻匈牙利大使黄镇提供的汽车。总理每天晚上都组织汇报会，新闻记者、翻译等都参加。这种汇报会平常只是情况交流，如有具体问题，再进行专门请示。

二 举行贸易问题记者招待会

在中国代表团到达日内瓦前后，各方面对中国贸易问题比较注意，有不少新闻记者向中国驻瑞士公使和代表团联络处进行询问。他们问：中国代表团中是否有贸易人员？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如何？会议期间是否做买卖？中国对外联络人员这时还没有接到指示，所以对上述问题没有给予答复。于是，到中国代表团进行贸易方面询问和接触的记者和其他外国人士大为减少。

周恩来总理了解到这种情况后，指示雷任民率领的中国外贸人员立即展开贸易接触活动，并让新闻组马上发布消息，透露中国代表团中有贸易方面的官员，如中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雷任民等。设在日内瓦宝瑞华旅馆的新闻办公室还向来访的各国记者提供介绍中国经济和外贸情况的材料。

消息公布之后，来中国代表团进行有关贸易方面访问的记者和其他人士又开始增多，而且所提出的问题也更加具体。比如，一位法国记者问雷任民：中国愿意开展贸易否？可交换的主要产品是什么？中国与法国签订的协议是否可以履行？通过香港的贸易是否仍很重要？等等。还有一位印度记者要求访问雷任民，并提出中印贸易前途如何等问题。

意大利《团结报》记者梅利5月4日晚采访雷任民。他主要提出两大问题，一个是中意建交问题，一个是中意贸易问题。他说，在今天你们的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及是不是英国代表团与你们接触很多，而且是英国代表主动向你们要求改进中英关系。你们的发言人的回答是，任何改善都是值得欢迎的。你认为这次会议是否可以建立中英间的正常关系，尤其是贸易关系？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于驳斥意大利政府所说中意不能建交的理由将很有帮助。意大利前

总理在1952年2月解释不承认中国的原因时说，英国承认了中国而无法建交，意大利如果承认中国也会遭到同样的失败。雷任民说，对于中英关系发展的前途，因为这是双方的事情，因此中方只能作一般性的答复，主要是我们对于会议的看法与期望。关于中意建交问题，我将用书面另外答复你。

梅利继续说道，对建交问题有一个短的声明就够了，但对于贸易问题就要详细一些，说明你们上一年对外贸易发展数字如何？别的国家怎样能从展开对中国贸易中得到利益？对意大利贸易发展的可能性有多大？可以从意大利进口什么商品？数量是多少？中国可以向意大利供应什么商品？采取什么步骤来展开中意贸易？是否能同意大利签订长期性合同？

雷任民说，我们可以用书面来回答你。请问意大利目前最困难的行业是哪几种？梅利答道，意大利困难的是机器业、纺织业及化学工业。希望中国能增加进口意大利的棉纱、人造丝、肥田粉等。雷任民说，中国对意贸易有很多是通过你们的公司，从你们那里买到人造丝、肥田粉等。

这次谈话之后，雷任民及其助手认真就意大利《团结报》记者提出的几个问题作了书面答复。

在日内瓦会议开幕之前，东西欧贸易专家会议于4月20日在此召开。参加这个会议的西方国家代表均为二、三流政府官员，会议计划于5月5日前结束，法国里昂博览会已邀请与会代表去参观。雷任民通过苏联代表嘉克林取得了各国代表名单及会议议程，还考虑通过东西欧贸易专家会议与西欧国家进行贸易接触。但与嘉克林研究后又取消了这个计划。因为他们估计在日内瓦会议尚未有眉目之前，出席日内瓦东西欧贸易专家会议的各国代表不会愿意与中国贸易人员接触，同时这个会议即将闭幕，时间也来不及了。

中国代表团初来日内瓦时，曾有若干外国商人通过中国驻瑞士使馆向中方贸易人员报价，试图销售铜、稀有金属及收发报机等。雷任民等对这些个别的具体交易，都介绍去中国进出口公司东柏林代表处接洽，说明在日内瓦不予接谈。

日内瓦会议开幕不久，越来越多的西方记者询问中国的外贸情况，中国代表团原先准备的材料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这时，周恩来总理说，让雷任民当代表团的顾问，就是为了这一点。总理要新闻办公室为外国记者举行一次中国外贸问题座谈会，由雷任民主讲并答问。^①

按照周总理的指示，为系统回答自会议开幕以来各国记者、官员及工商界人士提出的关于中国经济和外贸方面的种种问题，雷任民于5月15日上午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记者招待会从11时开始，持续约1小时20分钟，到会各国记者共120多人。台上是雷任民和邹斯颐。

雷任民首先在记者招待会上作了题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与对外贸易》的报告。他说，中国在解放前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人民的生活极为贫困。新中国成立后，经过3年恢复时期，中国的农业生产在1952年底已超过了抗日战争前的水平；中国的工业也迅速恢复和发展，全国工业生产的比重从1949年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7%左右，上升到1952年的28%左右。他还介绍了1953年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头一年任务的情况：中国已有122项重点工程开始和继续施工，其中一部分已经投入生产，如鞍山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西安等地的发电站以及西北棉纺织厂等。中国的机器制造业已能生产出旧中国从未生产过的许多优良产品，如

^① 参见熊向晖：《于细微处见精神——记周总理对我的几次批评》，载《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90页。

各种精密的工作母机、矿山机器、成套纺织机械等。中国人民的生活4年来已获得了普遍和显著的改善，社会购买力不断提高。

讲到1949年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情况时，雷任民指出，这4年中国的外贸总额不断地迅速增加：以1949年为基数，1953年的对外贸易总额增加了5倍多，创造了1930年以来的最高记录。1953年中国与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额比1950年增加了3倍半；中国和资本主义各国的贸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年，即1950年就迅速恢复并超过了抗日战争前一年即1936年的记录。但由于美国的“禁运”措施，和许多资本主义国家追随美国实行对华“禁运”，使1951年下半年中国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额锐减，某些国家的对华贸易甚至陷于完全停顿。而自1952年下半年开始，特别自1953年以来，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广大的工商界人士普遍要求恢复与中国的贸易，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对恢复正常的国际贸易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在1953年又开始上升，当年的贸易额比1952年增加29%。他说，根据西欧各国自己的统计，英国对华出口，1953年比1952年增加约1/3，同期的进口扩大了3倍半；法国1953年对华贸易数字比1952年增加了3倍；同期西德的对华出口贸易额增加了将近10倍，其他如比利时、瑞典、瑞士、意大利、荷兰等欧洲国家1953年的对华贸易额也比1952年各增加了2倍到3倍。他指出，西欧的工商界近年来先后组织代表团到北京访问并与中国签订了贸易协议。可是，由于某些国家执行美国的“禁运”措施，致使这些协议不能全部履行。所以，雷任民表示相信，假如没有人为的阻挠，西欧各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无疑将会更为发展。

雷任民接着介绍了4年来新中国与亚洲许多国家贸易关系的发展。他说，过去几年中签订的一系列贸易协定，如中印换货合同、中锡贸易协定、中巴棉煤协定、中印尼贸易协定、中缅贸易协定，都

是发展亚洲各国间平等互利经济关系的良好例证。他表示相信,如果消除了外来的强加在许多亚洲国家身上的人为的贸易障碍,今后中国与亚洲国家间的贸易,包括对日本的贸易,一定能获得很大的发展。他还提到继续扩大中国与埃及和中东国家之间贸易的很大可能性。

雷任民还特别地讲到中国与美国的贸易关系。他说,4年来虽然美国政府断绝了中美的贸易关系,可是美国的某些工商界和中国的企业机构还保持着业务上的联系,不少美国公司和厂商热切地表示希望与中国进行贸易。雷任民说,中国政府是支持这种愿望的,只要有可能,我们准备与美国工商界进行贸易往来。

在报告的最后,雷任民告诉各国记者,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计划的实现,将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一个极为广泛的前途。中国将继续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建立并扩大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关系。他还表示,中国认为恢复与发展国际间正常的贸易经济关系,不仅可使各国发展经济并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条件,还将有利于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保障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参加记者招待会的各国记者对雷任民的报告极感兴趣。他们听到报告中列举中国经济建设成就中各种产品增长的百分比时,都很详细地作记录。报告到中国对外贸易状况时,记者们尤其感到兴奋,遇到重要的地方,有的记者立即中途出去打电话发消息。雷任民谈到西欧各国1953年对华贸易比1952年增加的倍数时,记者们均极为关注。西德对华出口增加10倍这个情况,对英法记者刺激很大。谈到美国某些工商界仍与中国保持接触,及中国有可能随时与美国工商界进行贸易往来时,全体记者都极为重视。

报告后,各国记者开始就他们关心的问题提问。这些问题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是有关中法、中日、中瑞(士)贸易情况及前途的问题;第二类是有关外国投资问题(包括对苏是否优惠

等)；第三类是关于自由访问及签证问题；第四类是关于私商能否做交易的问题；第五，关于进出口的具体商品方面的问题；第六，有关合同交货等具体条件方面的问题等。

对于上述各种问题，雷任民给予了简明而又中肯的回答。比如在回答“中国是否需要外国投资”这个问题时，他说：中国的经济建设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中国胜利后3年的经济恢复以及五年计划的开始都是明证。但是我们不拒绝平等的互利的并且不带有任何条件的外国投资。记者对答复表示很满意。

举行外贸问题记者座谈会的方式是其他国家的代表团所未采取的。参加招待会的记者反应很好，认为招待会组织得很有力，配合图片，形式新颖，给与会者以深刻的印象。有的记者说，中国人熟悉西方记者的心理，事先准备周密，易于使人了解中国。有的说，雷任民的介绍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中国并不拒绝外资，任何国家都没有同中国贸易的优先权。有的记者称赞说，从周恩来和他的助手身上，可以看出中国人的自信和组织能力，他们具有没有大国架子的大国风度。还有的记者评论说，严肃和热情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可是在周恩来和他的助手们身上，这两种性格融洽地结合在一起，这真是奇迹。当时西欧主要国家的报纸都登载了雷任民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和答问，产生了广泛的良好影响。

三 把英国作为突破口

50年代，英国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占据着仅次于美国的重要地位，它的外交、外贸政策对西方阵营及英联邦国家具有重大的影响力。1950年初英国承认新中国后，一些北欧国家及亚洲的若干英联邦国家紧接着宣布承认中国。1952年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期间英国工商代表团率先与中国签订贸易协议，也引起强烈反响，打开

了中国与西欧国家民间贸易往来的大门。不仅如此，在东南亚问题上英国的政策也有很重要的影响。虽然英国与美国保持着“特殊关系”，在很多国际问题上协调一致，但英国以维护其利益作为对外政策的根本出发点，为了维护它的殖民利益和贸易利益，又与美国有一些矛盾。

鉴于出席日内瓦会议的英国代表团团长、外交大臣艾登对中国态度友好，当时英国一些政界和贸易界重要人士均在日内瓦，周恩来总理指示雷任民多找关系同他们接触，以英国为突破口，冲破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中国实行的“封锁、禁运”政策，打开英国市场。^①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雷任民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精神，率领中国贸易代表，把英国确定为工作重点，主动同英国政界和贸易界人士接触，充分利用和扩大英美矛盾，促使西方阵营发生分化，既实现了贸易目标，又有力地配合了对英外交活动。

其实，英国对发展对华贸易也有强烈的愿望。中国代表团刚到日内瓦，英国驻华的谈判代表杜维廉就来找雷任民，并面交英国工业联合会等3个团体给致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函的副本。此信的主要内容是：英国工业联合会、伦敦商会和中国协会正在联合组织机构，以便进行对华贸易，如中方同意，拟派代表团去北京。杜维廉还约请王炳南（外交部办公厅主任、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倬如（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和雷任民出席由他举行的晚宴。

雷任民随即将此事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周恩来指示说：可以与之接触，可表示我对英贸易态度，并相机试探让该3团体先来日内瓦初步交谈。

4月30日晚上7时半，雷任民、王炳南、王倬如等应邀赴宴。

^① 雷任民：《回忆周总理对外贸工作的关怀和指导》，载《不尽的思念》，第250页。

英方除杜维廉外,还有英国外交部副次官卡琪亚、英国外交部东南亚司官员艾的斯和前英国在京谈判代表处秘书傅德。在这次宴会上,杜维廉说:英国工业联合会、中国协会、伦敦商会等着他们来信的回音,并说假如中国能与他们接触则更有利于中英贸易的开展。雷任民对这3个机构要开展中英贸易的愿望表示欢迎。杜维廉接着就说:“假如你(指雷)愿意,我(杜)可以告诉他们(指3个机构)派代表到日内瓦见你。”雷任民回答:“可以。”杜维廉等得到这个肯定的答复很高兴,说3个机构的代表下星期就可以到达。

一周后,英国工业联合会海外部部长田南特来到日内瓦。他同雷任民及其助手中国进出口公司副经理石志昂等进行了多次会谈。双方就中英派代表团互访等问题初步交换了意见。雷任民告诉田南特,中国政府打算在6月派访问团赴英国。田南特说很欢迎,希望6月中旬左右去。他答应将于6月2日寄来邀请信。对英国工商界访问北京之事,田南特说时间最好在秋季。

在结束同田南特3次会谈之际,英国工党议员威尔逊(前贸易大臣,60年代曾担任英国首相)和保守党议员罗伯逊·布朗(保守党执行委员)来到了日内瓦。

5月28日下午,雷任民会见了这两位英国著名的议员。雷任民在谈话中向他们透露,英国政府已经同意中国派访问团去伦敦。威尔逊和罗伯逊提出想见周恩来总理的愿望,雷任民答应予以引见。5月29日晚上,雷任民在中国驻日内瓦领事馆宴请威尔逊和罗伯逊。两位英国客人在席间多次表示欢迎中国去英国设立商务机构,还特别声明这不是他们个人的意见,而是“有根据的”。他们还希望中国能派外交使节驻英国。5月30日上午,周恩来会见了威尔逊和罗伯逊。威尔逊向周总理提出,中国应该在英国设立贸易机构,并说英国为推动贸易也有必要在中国设立特别机构。周恩来也向两位英国议员谈了自己在改进中英关系、发展中英贸易等问

题上的观点。他强调：关于中国在英国建立贸易机构问题，我们将加以考虑。^①

鉴于保守党和工党领导人都提出希望中国在英国设立商务机构，周恩来指示雷任民考虑建立这种机构的技术问题。为此，雷任民于6月1日访问了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副司长和苏联驻瑞士商务代表，向他们请教如何在英国设立商务机构。苏方告诉雷任民，苏联于1922年3月16日与英国订立了一个贸易协定，那时苏联与英国还未建立外交关系。这个贸易协定规定，每方有权派遣商务代表或代理人，代表须为对方所同意的人，商务代表机构的人数由双方商定。一方对对方所派的负责人应协助其经常能与本国政府联系，给以利用邮局、电话、无线电、密码、信使之便利，并不能加以扣留逮捕，即应享受外交特权。他们还告诉雷任民，苏联目前在英国的商务代表处有代表1人，副代表2人，工作人员约四五十人。向苏联有关官员咨询了这些情况后，雷任民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周恩来弄清英国政府在设立商务机构问题上的态度后，于6月1日致电毛泽东、刘少奇并报中共中央：“对推进中英关系，目前可采取下列步骤：一、利用威尔逊及罗伯逊·布朗的建议，向英方正式提出设立常设商务机构的问题。此机构应享有完全的外交权利和地位，如同苏联早期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务代表处一样，实际上是一个外交机构。二、如英方同意设立这种机构，即由雷任民同志正式访英一次，安排设立商务代表机构的具体事宜，并可进行参观。三、视情况发展，再进一步提出派我方谈判代表驻伦敦的问题。根据各方面反映，不论是英国政府或人民都是欢迎的。”^②从这个电报来看，周恩来仍然主张用同英国互设商务代表机构的方式来

①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373页。

② 《周恩来传(1949—1976)》，第180页。

改善中英外交关系,并考虑派雷任民访问英国办成此事。但是,他同时又感到有可能用派真正的外交代表(即“谈判代表”)常驻英国的方式,以更大的步伐推进中英外交关系。

由于英方急于改善中英关系,形势朝更加有利的方向迅速发展。就在周恩来向中共中央发出上述电报的当天(6月1日)晚上8时,艾登宴请周恩来,并主动表示,双方应该努力进一步改善中英关系。他说:“我们有一个人在北京,而你们却没有人在伦敦。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是半截的。你是否也派一个中国的杜维廉来?”英国外交大臣的建议正合周恩来的心意,周马上表示,同意得像英国派谈判代表到北京那样,中国也将派代表去伦敦。^①双方于是商定互设谈判代表办事处。6月17日,中英同时发表联合公报,宣布建立代办级的外交关系。这比原来设想双方仅设立享有完全外交权利的常设商务机构前进了一大步。

威尔逊和罗伯逊对周恩来坦率诚恳的谈话极为满意。雷任民、石志昂等的言谈举止,也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回到英国后,仍然非常兴奋。威尔逊对一些朋友说:这是他生平最好的一次访问,从到的那天起,一直到走,每一件事都是有意义的。还说能看到周总理更觉得荣幸。他将在日内瓦与周总理和雷任民等谈话的印象写了两篇文章,发表在6月2日和3日的《曼彻斯特卫报》上。文章说,中国对发展英中贸易的诚意甚大。文章还披露了中国贸易代表团将去伦敦的消息。罗伯逊·布朗在去日内瓦之前对中英贸易持消极态度,但他从日内瓦访问返回英国后,对中英贸易非常热心起来,认为中国是有诚意通商的,于是敦促他所掌握的全英制造业联合会打电报给石志昂表示欢迎去伦敦访问。

^① 《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威尔逊的文章对英国各界影响很大,并且迫使英国工业联合会于6月2日急忙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布中英双方在日内瓦进行贸易商谈的经过,并宣布邀请中国贸易代表团的消息等。田南特在招待会上发给出席者每人一份准备好的书面新闻稿及3个团体在4月给叶季壮部长信的原文(中国外交部于4月底收到)。田南特在招待会上还宣布:“以上3个组织(英国工业联合会、中国协会、伦敦商会)加上英国商会联合会及全英制造业联合会已经组织了一个联合机构以处理双方互相间的访问。”但是,工业联合会在公布消息时特别强调,中英贸易是非战略物资的贸易。6月3日,英国工业联合会海外部部长田南特发出了邀请信。

四 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英国

1954年6月4日,石志昂接到田南特代表5个团体发来的邀请信。邀请中国进出口公司的5个团体是:英国工业联合会、英国商会联合会、中国协会、伦敦商会、全英制造业联合会。6月6日,田南特又给石志昂写来一封信。在后一封信中,田南特除了再次保证英方所有的全国性机构都将与中国访问团合作等外,又催石尽快把中国访英代表团的名单寄给他。

接到田南特的两封信后,雷任民同石志昂等经过仔细研究,确定中国访英代表团由以下11人组成:曹中枢(中国进出口公司副经理)、石志昂(中国进出口公司副经理)、丁克坚(中国出口商品专家)、任小轩(中国出口商品专家)、李树德(中国出口商品专家)、王孝达(机器、机车、车辆、船只专家)、王德馨(电气设备、电讯设备专家)、姚乃安(五金、纤维品及杂品专家)、钱乃正(化学品及药品专家)、庄慕兰(翻译)和强松寿(代表团秘书)。

据曹中枢回忆,周恩来总理本来准备让中国进出口公司经理

卢绪章担任中国访英代表团团长,但是,卢当时正在国内,因工作原因暂时离不开,所以雷任民建议改派副经理曹中枢担任团长。曹中枢(卢绪章不担任经理职务后,曹接任此职)此时驻在东柏林,主持办理一些中欧贸易事务。从1953年秋开始,他在民主德国负责组织中国进出口公司柏林代表处在那里举行的展览会,搞了半年。赴日内瓦之前,他还同英国对华贸易“新手”进行商务谈判,并促成“48家集团”的建立。^①

石志昂于6月7日正式将中国访英代表团的名单函复田南特,将此函副本抄送杜维廉,并于同一天在日内瓦发布新闻,宣布中国决定应邀组团访英。6月12日,中国访英团人员全部到达日内瓦,开始申请办理去英国的签证。经请示周恩来总理,访英团名称确定为中国贸易访问团,由曹中枢、石志昂分任团长和副团长。为了满足英方的要求,曹中枢准备了两国进出口各1亿美元的货单(期限为1954年6月至1955年底)。

接到石志昂的信后,英国的5个工商团体为解决接待中国访英代表团以及访问日程的安排等问题,决定联合组建一个全国性对华贸易机构,这就是6月11日宣告成立的中英贸易委员会。哈里·皮尔金顿爵士被选为中英贸易委员会第一任主席。

中英贸易委员会是一个半官方团体,以后一直是英国海外贸易局关于对华贸易的咨询机构,并同英国贸易部及政府其他部门保持联系。组成这个团体的5个工商机构在英国很有代表性:英国商会联合会由英国各地的100个商会组成;英商中国协会是专门处理英国商人对华贸易事务历史最悠久、最著名的一个商会;英国工业联合会代表英国各地12000个会员公司,绝大部分会员从事制造业;伦敦商会有4000多个会员,包括许多大银行、大保险公司

^① 1998年7月16日访问曹中枢记录。

等金融服务机构,下设由数百个公司组成的对华贸易部;全英制造业联合会也代表英国众多制造商机构。中英贸易委员会成立后,规定其宗旨为努力改善同中国的友好贸易关系,并使两国间的双边贸易有实质性的增长。^①

中英贸易委员会(或中英贸易协会)一般被称为英国对华贸易“老手”,而上面提到的“48家集团”通常被称为英国对华贸易“新手”。后者是在英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指导下形成的,是没有官方背景的民间团体。1953年6月,英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冲破政府的阻挠,组织了一个由副主席罗宾逊夫人率领的英国工商界访华团(一直被誉为“破冰者”),并同中国进出口公司签订了总额为3000万英镑的商业协议。为了顺利执行并扩大中英贸易,1954年3月中国进出口公司驻东柏林代表处邀请签署协议的英国厂商去东柏林进一步商谈。结果,除协议签署者外,还有一些对开展对华贸易感兴趣的厂商也纷纷派代表前往,一共48家公司。他们回到伦敦后,为了更有效地进行反“禁运”斗争,开展对华贸易,于同年4月成立了“中英贸易48家集团”,推选西德尼·戈登·斯隆为主席,英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秘书长罗兰·伯杰为顾问。48家集团成立后,在促进中英经济贸易关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起了先锋作用。但是,这个“新手”团体由于坚决反对“封锁、禁运”而不受英国政府的支持,甚至倍受排挤。同时,在对华贸易方面,它又与受政府支持的“老手”团体发生矛盾。

中英贸易委员会在政府的支持下,决心恢复“老手”已中断多年的在对华直接贸易上的垄断地位,所以它打算一手包办这次中国贸易代表团访英的日程和活动方案,要把48家集团等“新手”机

^① 解建群、林连德、廖训振、方扬春:《贸促春秋: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史(1952—1994)》上卷,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1995年版,第138页。

构完全排除在外。

但是,听到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发布的新闻消息中表示,访问团虽然受英国工业联合会等5个团体的邀请,同时也要与英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及其他工商团体接触,又闻伦敦传说英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在散布中国访问团是由他们邀请的,田南特等害怕英国贸促会也来安排中国访问团的日程并获取他们自己的商业利益。工业联合会等团体于是立即商讨这一问题,并决定如果中国不做出不见英国贸促会的满意保证,就不接待中国贸易访问团,英国政府也应该不给或推迟给中国代表团办理签证。^①

这时,英国外交部指示杜维廉在日内瓦就这一问题同雷任民、宦乡等交涉。6月15日上午,杜维廉来到宝瑞华旅馆,与曹中枢和石志昂谈话,后又会见宦乡。当天下午,杜维廉会见雷任民。他开门见山地告诉雷任民:我们都希望这次贸易访问团能够成功,所以我愿意坦白地说,据我知道,英国工商界的朋友很烦恼,因为自从你们发表了关于中国派贸易访问团的消息后,另外有一个很小的没有代表性的团体,就是英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也在活动替访问团作安排。邀请你们去的团体,他们在政治见解上与这个机构不同,因此不愿意同这个机构发生关系,现在有两个敌对的机构来作同样的安排会产生很多困难的。

中方的态度是很明确的:接受5个团体的邀请,主要日程由他们安排,但决不能限制自己的行动自由,妨碍结交新朋友。因此,雷任民马上告诉杜维廉:宦乡司长已和我谈过关于你同他在这问题上的谈话。(杜维廉插话说,他先与宦司长谈再与雷副部长谈,这样可使雷副部长在谈话前先考虑一下这个问题。)雷任民接着讲了中方

^① Wenguang Shao, *China, Britain and Businessmen, 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Relations, 1949-1957*. London: Macmillan 1991, p. 158.

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第一，中国贸易访问团与5个团体的关系是，5个团体是邀请者，中国贸易访问团是被邀请者。第二，中方发消息时提到，有许多英国贸易机构和政界及工商界人士通过函电和直接接触表示了对发展中英贸易的愿望，欢迎中国贸易访问团去并愿与访问团联系，访问团愿意到英国后与他们接触，我认为这是完全应该的。

杜维廉说：我觉得你们发表的消息是很明确的，但是在你们发表消息后，英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的行动使英国工商界的朋友很不安。我认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到英国来的中国访问团，对将来中英贸易的发展有密切关系，我们都希望访问团的成功，因此在开始时就希望他们走对路。杜维廉还表示：我想英国邀请的5个团体绝对不会限制你们的访问团去见你们要见的朋友，但是希望能得到保证，访问团与工业联合会等5个团体所介绍的厂商接触，而不与英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及其附属团体所介绍的厂商接触。

听完杜维廉的话，雷任民立即表示：我认为这次访问是由工业联合会等邀请的，因此关于一个正式的日程是应该由邀请的一方与被邀请的一方，根据访问者的愿望和可能商量确定。但是另一方面也可能有没有估计到的约会，或者有访问团过去认识的和有关系的团体和厂商，邀请访问团参观或接触，我认为并不需要得到工业联合会等的同意才能接触和参观。经过进一步磋商，雷任民把谈话明确为以下三点：（一）工业联合会等5个团体是中国贸易访问团的邀请人；（二）中国这次访问的主要对象是工业联合会等5个团体及其有关的厂商；（三）中国贸易访问团也将和他愿意接触的朋友和参观的工厂接触和参观，不受工业联合会等5个团体的限制，我确信工业联合会等5个团体也无意限制访问团要见他们想见的的朋友。

对雷任民上述明确归纳，杜维廉说：对，我想访问团能有广泛

的接触是好的。他最后向雷任民说：我很抱歉我们不能在这个月安排阁下到英国的访问，但是我希望在北京再与您商谈这事，以便不久后能邀请你到英国去。雷任民回答道：我关心中英贸易的发展，因此想到乘这次在日内瓦的机会，去英国访问一次是有好处的。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当根据情况考虑可能性。

通过在日内瓦的几次谈话，中英双方取得了谅解，这场风波很快得到平息，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英国的活动得以按计划顺利进行。6月18日，中英贸易委员会综合秘书马罗给石志昂发去一封信。信中说，邀请中国贸易访问团的5个团体组织了一个联合委员会，即中英贸易委员会，总部设在伦敦商会。马罗还在信中列了为中国贸易访问团初步安排的从6月28日至7月9日的在英活动日程。他要求中方对这个日程安排提出意见。

访问英国之前，雷任民指导访问团成员作好准备，并慎重地拟定了访问英国的方案。方案首先分析了英国邀请中国去访问的目的，认为主要是为了恢复中国老手对华贸易的垄断地位，排挤新手，便于贯彻政府的整个对华政策；为在经济上有利又不得罪美国，英国要在非禁运范围内扩大对中国贸易，以解决其有困难的产品出路，还企图把中英贸易不能充分发展的责任加在中国身上等。

鉴于此次访问英国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将在国际上产生很大影响，为保证访问任务的完成，方案提出了以下指导方针：第一，在访问中必须抱友好协商的态度，正面阐明中国的贸易政策，表示出中国对发展中英贸易的诚意，说明中英贸易有广阔的发展前途。第二，经过广泛接触，用事实说明不正常的贸易，即“封锁、禁运”，阻碍着中英贸易的发展，以扩大国际反美统一战线，孤立美国。第三，访问以工业联合会等5个邀请团体和他们所属会员厂商为主要对象，同时对新手，即英国国际贸易促进会、48家集团和伦敦出口公司，必须给予适当的支持。第四，此次访问英国的目的在于通

过参观、交换意见以寻求贸易可能性,为进一步发展中英贸易打下一个基础,不签具体合同,但可商谈对双方均无严格约束性的贸易轮廓,作为今秋英国访问团去北京谈判的基础。第五,要通过这次贸易访问,增进中英友好关系,巩固外交成果。为落实这些方针,方案还设计了一些步骤。

6月20日左右,雷任民把拟定的访英方案报告周总理和外贸部。周恩来总理批准了这个方案。

在访英代表团赴英伦之前,雷任民让中国银行伦敦分行行长到日内瓦给代表团成员介绍英国情况。这位伦敦分行行长不但给大家介绍了英国的情况,还送给代表团11位成员每人一份礼物:英国老式大礼帽。

按照既定方案,中国贸易访问团于6月28日至7月14日对英国进行了17天的访问。前两周全部为中英贸易委员会所安排的活动,最后几天与英国贸促会、伦敦出口公司、48家集团等接触。在此期间参观了伦敦、曼彻斯特、谢菲尔德、伯明翰、威尔士5个城市的大小18个工厂(包括有关中国出口者6个),出席了保守党议员罗伯逊·布朗主持的三党(保守党、工党和自由党)议员询问会与招待会,解答了议员们提出的有关贸易问题,以及工党议员唐纳利主持的工党领袖招待酒会,同25个工商团体、56家制造商和中间商进行了业务讨论,参加了18次宴会与便餐。在上述不同场合下同1200多英国工商业者有了接触,同5个团体组成的中英贸易委员会讨论了有关中英贸易的合同条款、买卖途径、交易方法等问题,其中进行了3次有关一般问题的大会讨论,一天半时间的分组讨论,和1次总结。

在参观工厂的安排方面,中英贸易委员会原来布置参观的仅限于英国急于推销的软货范围之内,经过争取,又增加了合金钢厂、钢铁厂和电气设备厂。出口方面参观了刷子厂、油漆及罐头食

品等工厂，了解了猪鬃、桐油和冻猪肉等的销售情况。在参观的工厂中，英方也是尽力限制在非“禁运”范围以内，如在谢菲尔德的两个合金钢厂只看到了工具部分，汽车厂只看到了轿车部分而没有看到卡车部分。

但是，英国厂商对中国访问团参观都很重视，希望取消“禁运”，恢复供应，建立直接商务关系。他们希望中国尽早在英国设立贸易机构。中国贸易访问团在参观和接触中感到，英国厂商普遍对“禁运”表示不满，如发电机制造厂经理说：“瑞士能出口发电设备是好政府，英国政府不好”；奥斯汀汽车厂经理说：“去年170万英镑合同因政府不发出口许可证而未能执行，引为遗憾，希望一旦情况好转，不要忘了我们。”厂商对中国访问团参观表现很积极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的产品销路困难，因此有些厂的生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有的甚至减产。比如，谢菲尔德两个合金钢厂生产工具部分的设备开工率仅为1/5，汽车、拖拉机、工作母机、火车头等厂都因缺乏订货而开工不足，通用电气公司有半制成品待售，因此他们迫切希望开展对华贸易。中国贸易访问团在参观中除了解情况外，还宣传中国的贸易政策，并根据参观工厂的产品说明中国的需要，指出前途，贯彻反“禁运”精神等，一般都给予厂商很大的鼓励。

各地商会对中国访问团的招待都比较好。曼彻斯特商会主席和副主席亲自由车站迎往旅馆，进门处悬挂“衷心欢迎”标语，当晚在各房间备以烟、水果、鲜花，有的房间还有电视（这在50年代上半期是少有的礼遇）。曼彻斯特市长参加了欢迎中国访问团的宴会，并在讲话中对中国大加赞扬说：“当中国人穿绸子时，英国人还穿皮子；中国人作诗的时候，英国人还在地下写字”，还说“最喜欢中国的绿茶，但战后已中断，希望将来能供应”，他最后表示将全力支持英国工商界对开展中英贸易的要求。

在英国，参观访问等活动进行得比较顺利。但在与老手团体讨

论今后如何签订贸易协定、合同等问题上，遇到了一定的困难。同这些英国对华贸易老手建立平等互利的新型关系并不容易。怡和、太古等老手都是中国通，在中国经营了上百年或几十年。鸦片战争以后，英国商人凭借武力和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享有各种特权。长期以来，他们在中国签订贸易协议或合同时，都是自己说了算，按英国的规矩办，维护英方的利益而不顾中方的利益。他们形成了一套签订协议和合同的惯例和做法。新中国成立后，这些英国老手仍然企图按老规矩办事。但是，中国方面不允许他们这样做，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一套新的签订贸易协议和合同的做法。于是，中国外贸部门与英国对华贸易老手之间产生了较大的分歧和矛盾。

中国访问团到伦敦后，当晚中英贸易委员会就将问题与意见提交曹中枢等考虑。第二天（6月29日），双方就合同条款、贸易途径、交易方法和贸易轮廓等一般性问题进行讨论。英方在讨论中提出了开展对华贸易的一些困难，如合同条款不平等互利，贸易不按正常方法，不能随时到中国去了解产销、品质等情况，中国出口价不稳定，以及在检验、仲裁等方面的问题，并强调恢复对香港中介作用的利用等。

中国贸易访问团除当场答复了支付方法问题外，对其他问题坚持研究后再予以答复。中英贸易委员会开始不同意，后经中方力争就同意了。

访英期间，曹中枢经常就一些问题和建议打电报或电话给雷任民，进行请示和汇报。这些电报、电话是通过苏联驻英国商务代表处打的。雷任民认真研究后，将回答的原则和口径电复曹中枢。

7月6日，中国贸易访问团团长曹中枢在中英贸易委员会一般讨论会上发言，对6月29日讨论会上英方提出的问题作了系统的答复，并说如果经过双方充分努力，中英贸易额在今后一年里可以扩大到8000万至1亿英镑。英方对曹中枢的答复在原则上没有

提出更多的意见,只是认为没有解决具体问题。随后,贸易会议转入分组讨论。

在7月9日的总结会上,双方就发表联合公报问题争执得很激烈。中英贸易委员会先是宣布,要就将在记者招待会上发布的发言稿征求中方意见,并要求中国贸易访问团一并出席。但是,此稿在中方全体代表到会议室时才送到中方住的旅馆。显然,英方打算让中方在没有作充分考虑的情况下就仓促地予以同意。当然,这一企图并没有实现。曹中枢看完发言稿后,发现其中有3条不能同意。他马上向中英贸易委员会提出:第一,中国并未保证英国厂商与中国接触,无须组织任何特别团体;第二,我们研究的是中国与英国的贸易,我们曾提出中英贸易经过香港、柏林都可以,而不是英国、香港与中国的贸易;第三,希望把贸易限制在“封锁、禁运”范围内的一段删去。同时,曹中枢也宣布了中方的总结意见。中英贸易委员会对曹提出的总结内容虽然同意,但又建议双方的两个总结同时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鉴于双方的总结在一些重要问题达不成共识,以及时间不推延则后3天访问的结果就不能包括在总结之内等原因,中国贸易访问团果断地决定,以不能取得协议为名而宣布不参加7月9日中英贸易委员会主持的记者招待会。事实证明,这一决定是正确的。

中国贸易访问团参加的两次英国议员招待会和同国际贸易促进会、伦敦出口公司及48家集团等的接触,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在一次招待会上,双方情绪高昂,彼此手拉手,唱起了苏格兰民歌。

7月13日上午,中国贸易访问团举行了记者招待会,邀请英国报纸和通讯社记者参加,共到记者41人,代表39个单位。中方作了发言,并回答了记者20多个问题。招待会结束后,中方以中国烟、酒、茶招待,记者们满意而去。英国多数报纸对此反应较好,把中国访问团在招待会上的发言摘登出来。7月14日,中国贸易访

问团离开伦敦，返回日内瓦。

在雷任民的直接指导下，中国贸易代表团对英国的这次访问比较成功。它增进了中英友好关系，巩固了外交成果，为以后扩大中英贸易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次访英对世界各国影响很大，特别是强烈地刺激了其他西欧国家。访英代表团抵英次日，比利时就有10几个厂商代表到日内瓦来访问中国代表团，并表示：“什么事英国能做，我们也能做。”接着，比利时的工业联合会邀请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比利时。这时，瑞典也发来邀请。法国远东经济协会在中国派团访英之后，也去日内瓦向雷任民表示希望中国派访问团去法国。中国对英国的访问，还刺激了摇摆中的西德，使之增加了发展对华贸易的积极性。可见，中国代表团对英国的贸易访问确实收到了打击美国“封锁、禁运”政策的明显效果。

五 广泛接触 打开对西欧贸易新局面

按照既定方针，中国贸易人员主要同西欧各国政府官员和工商人士谈发展贸易关系这类较原则性的问题。根据这一方针，在日内瓦会议前期，雷任民除了将英国作为突破口予以重点接触外，还带领外贸工作者与法国、西德、瑞士等国官员和工商界人士进行接触。会议后期，雷任民除安排和指导曹中枢、石志昂等对英国进行贸易访问外，还领导了对其他西欧国家工商人士的进一步贸易接触，取得了更大的成果。对会议前期已经进行密切接触的西德、瑞士和法国等国工商界，中国外贸人员继续与之接触。同时，对前期接触较少的意大利、比利时等国则加强了贸易接触，并应邀访问了比利时，密切了与比利时的贸易关系。

通过与西德东方委员会代表柯勒（东方委员会中国组主席、拜耳厂董事）、包特勒（东方委员会中国组委员、美最时洋行经理）、维丁（东方委员会中国组委员、北德银行董事）的贸易接触，双方形成

了若干共识,共同表示愿意扩大中国与西德之间的直接贸易。为进一步商谈有关问题,中国方面同意由西德东方委员会派一贸易代表团赴北京。双方商定,一切准备工作由东方委员会中国组与中国进出口公司东柏林代表处进一步接洽。西德代表在会谈中还提出希望中方贸易代表能去西德商谈,并欢迎参观西德的工厂。雷任民及其助手同西德东方委员会的贸易会谈,对推动中国与西德之间恢复和扩大直接贸易具有重要意义。

日内瓦会议期间,荷兰对华贸易委员会派薛卡斯(对华贸易委员会执行委员、全荷批发商联合会秘书长)、高德威(对华贸易委员会执行委员、南登化学工厂出口部经理)与雷任民等进行接触。6月9日、10日和29日,双方进行了3次会谈,商定了荷兰派工商代表团访华的问题。

6月初至7月上旬,意大利可默特公司总经理金梯力等到日内瓦与中国贸易代表进行数次会谈。在会谈中,几位意大利厂商代表主动提出邀请中国技术人员去意大利参观他们的工厂。双方还就意大利工商代表团访华问题进行了商谈。

5月下旬至6月初,雷任民等在与法国工商界人士的初步接触中了解到,法国工商界以至政府负责官员都很盼望能恢复中法正常贸易往来,只有皮杜尔一人反对,但又认为法国政府也有可能授意商人出面,希望由中方向法国提出扩大贸易的要求,以便增加其以贸易为讨价还价的资本。在这种情况下,雷任民建议对法国的贸易活动应采取冷淡态度。6月17日,孟戴斯·弗朗斯组成新内阁,他自己兼任外交部长,亲自率团到日内瓦谈判,并向法国公民许诺7月20日若不能就印度支那问题达成和平协议就辞职。所以,孟戴斯·弗朗斯对日内瓦会议的印度支那问题谈判采取了积极的态度。同时,他想扩大中法贸易,并开始采取新的步骤。得知政府这一态度后,一些多年来致力于促进中法贸易的法国工商人

士如香贝朗、奥布拉克、德普拉等来到日内瓦。雷任民和陈明等会见了他们，就一些促进中法直接贸易的重要问题达成了协议。

会议期间，雷任民等人接受瑞士政府的邀请，于6月16日参观了欧伯斯利水电厂。

在日内瓦会议后期，中国贸易代表在与比利时工商界和政界人士的接触中，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特别是安排了中国访英贸易代表团对比利时的正式访问。

中国贸易访问团到达伦敦的第二天，即6月29日，比利时工商界部分第一流厂商来到了日内瓦。这次访问是由苏其玛公司格丽莎夫人^①发动和组织的。6月29日和30日，他们同中国贸易人员进行了会谈。这批比利时工商界代表回国后反应良好，表示要请中国派专家去比参观他们的工厂，希望给预约性订单，以便向其政府要求出口许可证。

在日内瓦会议上，比利时外长斯巴克大胆地站出来支持周恩来的建议^②，为改善中比贸易关系创造了良好气氛。而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英国，给予比利时官方以很大的刺激，促其产生邀请中国贸易代表访问比利时的念头。一位名叫德勒诺的比利时贵族（钢铁厂老板，1952年中国曾向他订购过5万吨钢铁）向内阁总理范纳克建议邀请雷任民副部长从日内瓦回国途中访问比利时。范纳克同意这个建议。但是，当这一建议提交内阁讨论时，外交部长斯巴克表示反对，理由是中比尚无外交关系。内阁讨论的结果是，改由比利时工业联合会出而邀请中国进出口公司派代表团访问比利时，使之成为一次业务机构间的往来活动。

比利时政府之所以赞成邀请中国贸易代表团访比，除了是受

^① 格丽莎夫人是波兰轮船公司在比利时的代理人，参加过1952年莫斯科经济会议，还在1953年访问过中国。

^② 参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552—553页。

到中国贸易人员访英的直接刺激,还有以下几种原因:第一,比利时工商界要求与中国发展贸易的愿望十分强烈,对政府形成了很大的压力。第二,对外贸易在比利时经济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如钢铁的 2/3,工作母机的 2/5 都是依靠出口的。1953 年比利时对中国的出口达到 2400 多万美元,但 1954 年中国停止转口贸易后,中比贸易额锐减,所以他们争取恢复中比贸易。发展对外贸易对比利时政府解决当时的经济社会问题,特别是高失业率,具有重大的意义。当时比利时有失业者 30 万人,是其全国就业人口的 1/5。因此,范纳克把设法减少失业人数作为一项中心任务。商业部长拉洛克提出,减少失业人数的最好办法之一,就是发展比利时与东方国家的贸易。第三,比利时政府打算,从建立贸易关系开始,一旦国际形势趋于缓和,就把进一步发展贸易往来作为改进同中国外交关系的步骤。

7 月 5 日,比利时原参加日内瓦会议代表团秘书长盖飞尔要求介绍比利时自由党议员许林(在议会主持外贸事务)见雷任民。第二天中午,王炳南和宦乡宴请盖飞尔时,盖飞尔试探说,如果邀请中国贸易访问团去比利时,中国方面是否会拒绝,是否需要官方邀请?雷任民与宦乡研究,认为原则上可予以同意。

7 月 6 日下午,许林在盖飞尔和比利时驻联合国欧洲办事处常驻代表勒诺的陪同下来见雷任民。许林首先说:我趁出席日内瓦关税会议之便来拜访阁下,商谈关于开展中比贸易的问题。比利时是希望发展中比贸易的。当然某些商品的出口是有困难的,但根据最近国际政治局势看来,“禁运”可能有些放松。我来拜访的目的,是想了解如何在目前情况下使中比贸易增进进一步。雷任民接着说:我们愿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国的政府与人民发展贸易。中比两国可交换的商品很多,因此,具备了开展贸易的条件。中比过去已有贸易关系,但不是正常的,有的不是直接的。因此,中比之间的

贸易可能性没有被充分利用。在日内瓦我欢迎愿意与我接触的人接触。6月底也有比利时的工商界人士与我及我的助手们谈过。我同他们谈话的时间虽然很短,但是,我看到他们都有发展中比贸易的愿望。

这时,盖飞尔说:贸易要无限制地开展,在目前还是做不到的,因为比利时还受到某些条约的限制。但希望在目前情况下,能够听到你如何求得贸易关系前进的意见。雷任民反问说:你有什么意见?盖飞尔回答说:我的意见是根据目前情况做买卖,以后局势发展再展开。具体的建议是目前假如你们愿意的话,我可以与比利时工业联合会联系,请他们派代表到日内瓦与阁下进一步商谈。雷任民说:接触是有好处的,但我在日内瓦的时间很短,恐怕在一星期以内要离开。盖飞尔说:明天早晨我与工业联合会联系什么时候派人来,是否可能一面与阁下见面,另外与赴英访问团见面。他还提出另外一个建议:“假如本星期四或星期五工业联合会与阁下有一个结果的话,可以邀请贵国的赴英贸易访问团在归途中停留布鲁塞尔一、二天,以便进一步商谈。”雷任民说:这建议可以考虑,但是由谁邀请呢?盖飞尔说由工业联合会发邀请。

7月7日晚,比利时工业联合会的国外贸易委员会主席候维尔及秘书长格尔门由许林、勒诺陪同来到日内瓦中国贸易代表驻地。工业联合会代表向雷任民面交比利时工业联合会主席的一封信,并希望中比两国能恢复过去的贸易关系,还代表比利时工业联合会正式邀请赴英的中国贸易访问团去访问比利时。雷任民说:为了求得两国贸易的发展,双方的贸易工作者以及专家能相互接触是有好处的,原则上也愿意接受这邀请。他说,此事还需要报告对外贸易部。同时,他又让陈明等与比方就访问的具体安排非正式地交换意见。最后,双方就访问比利时的日程、与比工商界讨论的主要问题、参观对象等达成了一致意见。陈明还要求比利时工业

联合会给中国贸易访问团再发一个正式邀请信。7月9日，比利时工业联合会寄来由其主席德斯塔克签名的正式邀请信。

雷任民在与许林等会谈后，就请示李克农（周恩来在6月24—7月12日离开日内瓦期间，由李主持代表团工作），李表示原则同意。随后致电国内请示。外贸部及外交部回电称：中比没有外交关系，我们又没有准备，似以不去访问为好。回电还嘱咐请示周恩来，让总理作出最后决定。

7月12日，雷任民向刚刚返回日内瓦的周总理递交了请示报告。他在报告中写道：我们认为过去向比利时购买物资大部分为钢铁五金，均系转口输出，比厂商于我访问团去英后，急于希望和我直接贸易（有一厂因我砂钢片订货没有要，裁减500名工人），比急需出口者均为我所需要之硬货，如访比之行成功则不仅使工商界可藉以对政府施加压力，并可刺激西德及法国的工商界，虽中比无外交关系，但此次系由其官方代表介绍，该会国外贸易委员会主席并表示此次纯系访问，为时3天，参观工厂，交换一般性意见，我方亦不拟签订具体合同，同时，外贸部已将中比可能交易之进出口货单，及可提供参考之贸易金额电告，故访比之行不致陷于被动，而可在美国认为马歇尔计划模范国家的比利时打开一个裂口，使美国的“禁运”政策更显得孤立。周恩来很快批准了雷任民的建议。第二天，雷任民又向周总理报告了赴比利时的名义、名单和日期等，也很快得到批准。

访问比利时的建议和方案得到批准后，曹中枢于7月13日向比利时工业联合会回电，说明愿意接受邀请，并告以中国贸易访问团的名单、到达布鲁塞尔的日期等。在此电报中，告知对方访比名单为7人，包括曹本人。但在雷任民7月13日写给李部长并报总理的报告中，又将曹删去。曹中枢没有率团访问比利时，主要是考虑到比利时的地位没有英国高，必须降低规格。所以，就让中国访

英贸易代表团副团长石志昂率团访比。^①

中国贸易访问团原拟由伦敦直接去布鲁塞尔,但因14日才离开英国,时间太仓促,没空作准备,也来不及通知比利时方面办理签证,故改于7月16日从日内瓦出发。代表团于当天晚上8时到达布鲁塞尔,并在机场发表了书面谈话。

石志昂率领的访问团在比利时参观了10个工厂,包括3家火车头及车厢制造厂、2家钢铁厂、1家化工染料和肥田粉制造厂、1家人造丝厂、1家纺织机制造厂、1家冷藏设备和空气调节设备厂和1家电气发电设备制造厂。除了纺织机制造厂和冷藏设备制造厂的产品外,其他8家工厂的产品均为中国主要进口商品。访问团参加了1次一般性问题讨论会和1次总结会,同30多个团体的代表洽谈了有关发展中比贸易的业务性问题;出席了3个进口组、1个出口组和1个银行组的专业性会议,与50多家厂商和进出口商作了个别的业务洽谈。最后,中国贸易访问团与比利时工业联合会共同发表了关于发展中比贸易的联合声明。7月21日,中国贸易代表团结束对比利时的访问。

中国贸易代表团对比利时的访问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特别是由于发表了联合声明,对西欧国家产生了更大的影响。由于英国半官方工商机构不敢公开反对美国的“禁运”政策,致使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英国时无法与英国工业联合会等5个团体发表联合声明。中比联合声明则宣布,双方“愿为排除贸易障碍而共同努力”,这是对美国“封锁、禁运”政策的一个公开打击。比利时之行对增进中比贸易关系起了良好作用。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雷任民率领中国贸易工作者出色地完成了周恩来和中央交给的光荣使命,在这个政治会议上打了一场漂

^① 1998年7月16日访问曹中枢记录。

亮的经济贸易仗。他们掀起了反“封锁、禁运”的高潮，首先在美国的主要伙伴英国身上打开了缺口。通过广泛接触交谈及英国的示范作用，又在西欧国家引起了强烈震动和连锁反应，要求放宽“禁运”货单和扩大中西方贸易的呼声更加高涨。这些西方国家的工商界和银行界先后派代表团到日内瓦同中方商谈贸易，法国、瑞士、西德、挪威等国工商界都表示要组团访华。一些西方国家不顾美国施加的压力，先后同我国恢复和发展贸易关系。1955年，中国对西欧国家的贸易额比1952年增长了3倍，对英国、法国、西德和瑞士等国的贸易额的增长幅度尤为显著。

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始末

卜 伟 华

“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在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是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1967年春，周恩来在广州的一次讲话中谈到红卫兵运动时说：“饮水思源，我们就想到了清华附中红卫兵。”我哥哥卜大华和我分别是在1961年和1963年考入清华附中的。“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是初中三年级，他是高中二年级。虽然红卫兵的成立已经是30多年以前的事了，我作为一个亲身经历者，愿意把我所了解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写出来，供研究者参考。本文根据当年留存下来的一些文字资料，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旨在对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前后的情况作一介绍。

—

西山脚下，圆明园旁，白杨丛中，一派春光。……

啊，清华附中，你——朴实、进取、忠诚、坚强

——就象那日夜守卫你的白杨。

——引自《清华附中校歌》

1960年，清华大学党委决定创办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由万邦儒任校长。同年暑期开始向全北京市招生。清华附中从创办之日

起,就明确提出了“把清华附中办成第一流的中学”的奋斗目标,这就是:清华附中要在不远的将来,不仅要赶上全国第一流中学,而且要在可比方面,在教学质量和水平方面赶上和超过解放前名牌学校。在清华大学党委的领导下,清华附中在各项工作中坚持高标准、高质量,学校教学质量迅速提高,很快成为北京市比较有名的好学校之一。

1964年10月,高等教育部批准清华大学和南京工学院试办预科,学制为2年,学生待遇按普通中学学生的标准执行。试办预科是中央学制问题研究小组(1964年2月成立,组长林枫,副组长蒋南翔)提出的改革学制、提高教学质量的一项重要措施。清华大学决定从清华附中学完高一课程的学生中择优选拔90人进入预科,要求在数学、外语、语文和其他学科的基础知识及基本技能方面,适当提高程度,使之和工科大学本科的要求更好地衔接。90人分为两个班,分别称为预641班和预642班。1965年2月,教育部就预科学生毕业后的安排问题,函复清华大学、南京工学院:预科学生毕业后,应参加统一考试,成绩合乎录取标准者,试办预科的学校可以优先录取。1965年9月,清华附中又从学完高一课程的学生中择优选拔,建立了预科651班和预科652班。

在60年代的学校教育中,普遍存在理想主义的倾向。所谓理想主义,即时时事事以载于书本的最理想的描绘为准绳去衡量一切事物,凡不符合这种标准的就要受到批判。由于环境的封闭和教育的片面,青少年很难了解到现代文明和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的全貌,容易以偏概全,把自己接触到的东西当作是最好的,最典型的一种说法是: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最幸福的,而世界上2/3的人民则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方针在社会上迅速蔓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不断升温,这一切使广大青少年的思想和世界观的形成受到了深刻的影

响。毛泽东关于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培养接班人的主张,以及他对正规的学校教育的轻视和轻率的否定,也对当时的一代青少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964年11月,高等教育部转发《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谈话纪要》中提到,毛泽东谈到教育问题时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清华附中作为清华大学的一个部门,也在教职工中传达了这一个《谈话纪要》。清华附中党支部还专门组织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高中女生听了传达。1965年夏天,毛泽东与在北京外语学院进修的侄孙女王海容进行过一次谈话,其中谈到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是“没出息的”,鼓励学生违反学校的纪律,造学校的反。这次谈话的内容后来逐渐被透露出来,在北京的一些大中学校里悄悄地流传着,使不少中学生感到特别带劲,倍受鼓舞。毛泽东在谈话中所倡导的那种“造反”精神很快就被一些中学生所接受。^①

清华附中预科班的学生不仅学习成绩好,而且思想比较活跃,其中以预651班的学生最为突出。他们中有许多人不满足于按部就班地学习,有的人提出要在一年内学完所有高中课程,有的人提前开始自学高等数学。清华附中校领导在教育改革问题上是比较开明的,也采取了一些很开放的措施,如允许同学到图书馆去上晚自习等等。我和我们班上一个同学向学校提出:数学课以自学为主,以老师辅导为辅,学校竟然也同意了,让我们在上数学课时自己到图书阅览室去自学。后来到初三第二个学期开始时才以要准备考高中为由停止了我们的试验。当时,《光明日报》上正组织“怎样才能生动活泼地主动地进行学习”的讨论。预651班在这个讨论中经常进行激烈的辩论。许多人把自己的观点写成小字报,贴在本

^① 参见拙文《红卫兵运动与“文革”前的学校教育》,载于《中国青年研究》1994年第1期。

班教室后面的板报栏里。1965年10月28日,预651班学生骆小海在板报栏里贴出了一张题为《造反精神万岁》的小字报。其中写道:“造反,造旧事物的反,是历史的伟大动力。……拿我们学生来说,什么教育制度,学习方法,纪律规章,天地六合,都藏有旧的东西,对待它们,只有一种精神:造反!”“鉴于目前教学纪律对学习束缚之甚,大有造反的必要。这边革命分子一喊‘造反喽!’那边保皇分子慌忙打出和平旗帜,大喊‘遵守正常秩序’。……和尚的偶像很多,什么阿弥陀佛,弥勒佛,观音菩萨之类的,是多神教;穆斯林的偶像只有一个——真主,是一神教。保皇‘同志’的偶像比和尚还多,什么‘书本’呀,什么‘高等数学’呀,什么‘学校的规定’呀,……是万花筒。万花筒的花样是无穷无尽的。既然有了偶像,自然是正教了。既然是正教,自然有资格骂造反的异端分子:‘你们疯了!’”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半年多以前,清华附中预651班的这些中学生就已经在按照自己对毛泽东讲话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解,开始以“造反”作为自己的旗帜,并喊出了“造反精神万岁”的口号。

二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从此开始,全国范围内的群众性批判运动不断升温,一大批学者、专家和他们的著作受到批判。同时,在“全国学解放军”的号召下,大力提倡“突出政治”,大搞所谓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

在这种形势下,清华附中的一些学生开始把与部分教师和学校领导之间的一些具体的意见分歧,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来认识。这些学生开始主要集中于预651班和预642班,还有一些其他

班级的学生也同情和支持这些学生的意见。这些学生中多数是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也有一些其他家庭出身的学生。早在一两年前,他们就与学校领导在一系列问题上意见对立,并进行过多次交锋:

1964年7月,他们就“学校里有没有阶级斗争”,“学校里要不要贯彻党的阶级路线”两个问题与校方进行辩论。一位学校党支部委员明确地答复这些学生:“学校里就是没有阶级斗争!”“家庭出身好的也出了不少反革命。”

1965年2月,他们认为学校提出的“兴无灭资,团结百分之百”的口号“提得过右,而且在实际中它贯彻得还要更右一些。”

1965年5月和1966年4月,他们两度向学校提出要求开展“小整风”,大搞阶级教育活动(如清明扫墓),两忆三查(即:一忆阶级苦,忆先辈闯江山的艰苦卓绝,二忆自己的成长过程,忆党对自己的辛勤培养;一查自己入团来的表现,查自己的觉悟,二查自己的革命斗志、朝气,三查自己的工作,找差距,学先进),但均被学校拒绝。学校某党支部委员和团委会书记反驳说:“阶级教育在哪里不能搞?非要到烈士墓去搞!”“两忆三查不能搞,我们应当坚持正面教育,以表扬为主。”^①

1966年5月10日,骆小海写了一篇题为《从我校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看我校是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批判校领导的文章。指责学校不把毛主席的书作为最高指示,而是把清华大学怎么说的,《北京日报》、《前线》杂志怎么说的作为最高指示。文章说:“看一个单位,一个党组织是不是革命的,只要看它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就行了;把不把毛泽东思想放在首位,把不把毛泽东思想当作最高指

^① 王铭、张晓宾:《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党支部的资产阶级办学方向应当彻底批判》,1965年5月20日。

示,是看待一切个人或集团革命与不革命的试金石。”在骆小海与另一位同学合写的小字报中,他们通过学校将《前线》杂志1965年第12期社论《学习的生动活泼和主动性从何而来?》印成小册子让大家学习一事,得出结论:“学校充当了邓拓的毒贩,同反党分子唱出了谐音,这决不是偶然的事情。”^①

同日,万校长在全校大会上作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预651班许多学生对万校长所作的报告提出意见,质问校领导“为什么今天才作动员报告,已经落在形势的后面了,晚一天作动员报告就是犯错误。”^②他们认为校领导在报告中没有强调这场运动的深远意义,没有强调突出政治,没有强调在运动中要自觉革命,没有强调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认为不强调这些,那就是假革命。此外,还对学校过去不突出政治的问题提出了意见。学校领导不同意这些意见,并在不同场合批评了这些意见。5月11日,卜大华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万校长的报告是很不令人满意的。他提出了要全体同学参加这场斗争,‘党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在斗争中要有所收获’,但是又强调‘不搞大辩论,大批判’,‘不要忙于批判自己’,‘集中火力,起来战斗’等等。这实际上就是让大家不要带着自己的思想来千篇一律地向反党分子开火。难道这就是突出政治了吗?……如果象校长所号召的那样,不带着问题,不结合自己的思想参加战斗,结果只能是走形式,根本不会有多大收获。”文章最后提出:“要在全校掀起一个自觉革命的高潮,开展一个突出政治的大讨论,深入严肃地批判我校过去突出政治不力的错误,从而把我校师生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推向一个更高峰,让毛泽东思想真正在我们头脑中确立统治地位。”

① 引自申克美、骆小海于1966年5月写的一张无标题小字报。

② 引自预651班班主任向党支部的汇报材料。

5月20日,预642班学生王铭、张晓宾起草了一份题为《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党支部的资产阶级办学方向应当彻底批判》的给党中央、毛主席的较系统的汇报材料。这份材料列举了从1964年下半年起,本校高62级(62级是指1962年入学的,下同)、高63级、高64级的部分学生与附中党支部所进行的一系列“斗争”。这份材料的前言中写道:“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党支部是个不坚强的党支部。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不以毛泽东思想挂帅,骄傲自满、固步自封,长期拒绝接受学生的严肃批评,坚持错误的资产阶级办学方向(其到底是认识问题还是立场问题,有待于进一步认识、讨论)。在当前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在5月17日《解放军报》发表‘突出政治要落实到人的思想革命化’的按语后,清华附中有相当多的同学认清了学校的资产阶级办学方针的错误,纷纷要求党支部开展‘突出政治要落实到哪里’的讨论。然而清华附中的党支部躲躲闪闪,一直不公开表示态度。他们一方面不准对学校工作有不同意见的同志说话,另一方面,四处宣传,歪曲或夸大学生提意见中的某些错误,企图制造舆论,压制和打击学生的正确批评,情节较为恶劣。我们是清华附中的学生,我们大多数人在清华附中学习、生活了两年、三年以上,而且大多数人是清华附中团委会、学生会、班级团支部及其他学校工作的学生干部。我们对于清华附中党支部的错误了解得比较深刻,而且曾多次向党支部提出批评,均未得到党支部郑重的答复。在这里,我们认为有很大的必要,向敬爱的党中央反映清华附中党支部的实际情况和错误言行。我们一致认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定要进一步深入下去,这个革命一定要落实到人的思想革命化上去,特别是要落实到彻底改造知识分子这个关键问题上去。我们目前同清华附中党支部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的结果。这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我们一定要斗争下去,一定能取得胜利。我们下定决心,一届届、一代代和清华附中党支部的错误方向斗下去,直到把清华附中彻底搞红为止,直到把无产阶级教育方向在清华附中牢牢确立为止,直到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红旗在清华附中真正地骄傲地飘扬为止。”

起初,与学校对立的学生很少,全校总共也就几十人,学校领导态度比较强硬,并通过各种途径对持反对意见的学生施加了一定的压力。一名党支部委员曾对学生们讲过这样的话:“反右斗争时,党委开始不表示态度,有些党员就提意见,写大字报,‘一评党委态度’,‘二评党委态度’,结果成了右派。”一些支持校领导的学生,明确表态拥护党支部,反对预651班等少数人,经常可以看到他们与反对派学生在食堂、宿舍等地进行激烈的辩论。反对派的学生势单力薄,常常被围攻,有时还有些推推搡搡的事情出现。但他们并不就此退缩。反对派学生早就把学校规定的作息时间抛到一边去了。他们常常在晚上活动,有的时候在教室里,有的时候就到学校西边的圆明园遗址去,开会,研究形势和商讨对策。往往要在熄灯铃响后很久才回到宿舍楼里来。好几次,等他们回到宿舍楼的时候,宿舍楼大门早被锁上了,他们只好从倒垃圾的孔道爬进楼里。有一天,在他们又要从垃圾道里进楼的时候,突然发现,在进口的上方摆着几十斤重的暖气片,令他们倒吸了一口凉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上越来越激烈的“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反对学校领导的学生不但没有被压下去,反而逐步发展,扩大,同情或支持他们的人也越来越多。

反对派学生开始大多是高中生,后来逐渐有一些初中生也加入了同情、支持预651班观点的行列。我是在5月中旬左右开始对学校领导产生怀疑的。我看了预651班的一些批评校领导的小字报和文章后,觉得很有道理。5月18日晚上,我们班的男生在宿舍

里就文化革命的问题开展了热烈的讨论，讨论一直持续到深夜，不少其他班的同学也来参加讨论。从发表对学校领导的批评意见到酝酿着要给校领导贴大字报。我记得有一个我不认识的高中生把我拉到一边，很诚恳地对我说：“我爸爸是个右派分子，他犯错误就是从给党委提意见开始的。”他劝我一定要三思而后行，我听后并不为所动。其实那时候我们还都是些十几岁的孩子，对政治问题的看法都极其幼稚。反对派学生向校领导发难的一个重要题目是关于“突出政治”。当时，《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都多次就“突出政治”问题发表社论，《解放军报》明显比《人民日报》的调子要高得多，有时甚至是和《人民日报》针锋相对的。例如，《人民日报》曾提出，突出政治要落实业务，而《解放军报》则提出，突出政治要落实到人的思想革命化。我就曾向邝桃生提问：“突出政治问题学校不是也经常讲吗？”邝桃生对我说：“不但要听其言，而且要观其行，关键在于突出政治到底是落实在哪里？是落实业务，还是落实到人的思想革命化？”我听后觉得好像顿时开了窍，心里对他佩服极了。

5月29日傍晚，在圆明园遗址上，卜大华、骆小海、邝桃生、王铭、张晓宾、张承志、陶正、高洪旭等十来个学生在一起开了一个小会。与会者认为，当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为了迎接阶级斗争暴风雨的来临，为了更加有力地与校方进行斗争，有必要成立自己的组织，并一致同意将组织命名为红卫兵。“红卫兵”是前一阶

段张承志写小字报时所用的笔名。^①当时，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思潮正迅速在全国蔓延，“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口号非常流行。红卫兵这一名称，简洁而响亮，能使人不由得想起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青年近卫军和中国大革命时期的工人赤卫队。这一天就成为了红卫兵的诞生日，从此揭开了红卫兵运动的序幕。

三

5月31日，清华附中红卫兵成员邝桃生、骆小海、卜大华、王慧成、张晓宾、王铭联名写信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反映清华附中存在的问题。信中说：“我们是清华附中的学生。我校党支部共有党员24人，预备党员5人。其中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出身，工农出身的占的比例很小。这个党支部长期以来，没有认真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拒绝把毛主席的书当作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很少阶级斗争观点，基本上没有执行无产阶级的办学方针，没有突出无产阶级政

^① 张承志在《红卫兵时代》（日文版，日本岩波新书1992年版）一书中写道：“清华附中党支部领导了全校对‘三家村’的批判。作为共青团员的我，和其他同学一样，抱着像红军长征、奋起抗战那样严肃而神圣的心情投入了这场运动。”

班里的运动形式是在教室里贴小字报，凡是共青团员都要负责联系一至两名要求入团的同学，我和我负责联系的周向明一起，组成了一个小组。我在我们写的小字报上的署名就是‘红卫兵’。征得周向明的同意，我用红铅笔把自己发明的这个名字写在小字报的末尾，并画了一个骑马的战士的图像。

这种小字报和后来文化大革命中满街的大字报是不一样的。这只不过是按老师的要求制作对教室的一种漂亮的装饰。在中国的学校里，过去就有在教室里以墙报形式贴出学习成绩和国家政策的习惯，所以，我最初以‘红卫兵’署名的小字报，不是以后红卫兵式的东西，也不意味着‘造反’。

这种小字报当时一共写了三篇，末尾照例都用红铅笔仔细画上了骑士图案，写着‘红卫兵’三个字，‘卫’字用的是简体字。在班里这种装饰美观的小字报，大部分都相当醒目。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是，这些小字报上的‘红卫兵’这个署名，竟引起了预651班，还有其他班的几个人的注意，这几个人后来成为了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领导人。

另一方面，我也参加了从预651班开始的，以后扩展到全校的大讨论，我和同班的哈鸿兴、周春晓三人站到了反对校领导的一边。”（第39—40页）

以上这段文字是请程慎元同志从日文版原文翻译过来的，特此致谢。



同的理解,都这么用就乱了。”其实是采取了取消主义的态度。5、学生说必须把毛主席的书当作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听从团中央和军委的指示:“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要坚决执行,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要坚决反对,坚决抵制”。不管对待任何人,包括学校党支部都要这样。党支部委员、校长万××同志在1966年5月23日的干部大会上就说:“不听基层党组织的,听谁的呀?怎么听呀?只要上级党组织还没有宣布这个基层组织烂掉了,就还要听。”他只简单地提了一句:“当然要听毛主席的。”随后用“但是”引出了一大堆话,把他这句话冲得干干净净。(附:在学生中甚至还有这样的质问:“你们讲只听主席的,主席死了你们怎么办?”)6、在不搞主席著作学习的同时却接二连三地大量印发了1965年《前线》杂志关于教改的三篇社论让学生当做指示学习。这些社论经过研究,是存在许多政治问题的。

在另一份大约同时的清华附中学生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信中说:“我们是清华附中高二的同学,是革命的后代。我们在清华附中生活了几年,觉得我校实行了一整套、系统的资产阶级教育方针、路线。如:关于突出政治问题、关于教学改革问题(主要是预科问题)、关于贯彻阶级路线、重在表现问题,等等。过去,我们有的同学也给学校的一些问题提过意见,但学校丝毫没有接受。当前,在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风浪里,我们提高了阶级觉悟,对学校这些问题看得更加清楚了。我们彻底地看清了在我校几年来一直贯穿着一条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黑线。我们认为非常有必要向党中央,向您——最敬爱的毛主席揭发和汇报清华附中所贩卖的这些修正主义私货。”“有党中央、有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有广大的工农兵给我们做坚强的后盾,我们什么都不怕,即使在清华附中暂时的‘孤立’我们也不动摇,坚决斗争到底。我们是在为毛泽东思想而战,为共产主义而战,这是光荣的孤立!”“因情况紧急,希中央急速派工作

组来。”

6月1日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称北大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北大党组织是“假共产党”、“修正主义的‘党’”,号召群众起来彻底摧毁“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北大大字报的发表大大地鼓舞了刚刚组织起来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当时学校把教学楼五楼一个曾作为阅览室的大教室腾出来,专门作为全校师生贴大字报的场所。6月2日下午,一张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十分醒目地出现在五楼大教室。大字报的题目是《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大字报全文如下:

党中央、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吹响了冲锋号,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后代,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毛泽东思想。对一切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怀着刻骨的仇恨。在大革命中,我们一定要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一脚踢开一切反毛泽东思想的所谓“权威”,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我们就坚决照办,坚决执行,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凡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有多么高的地位,统统都要砸得稀烂!

文化大革命,是两个阶级,两种世界观的决战。我们一定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大搞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不准资产阶级在任何领域中负隅顽抗!

资产阶级的老爷们,你们既然挑起了这一场斗争,那么好吧!我们来者不拒,坚决奉陪到底,不拔掉黑旗,不打垮黑帮,不砸烂黑店,不取缔黑市,决不收兵!

同志们,革命战友们:

誓死跟着党中央，誓死跟着毛主席，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万岁！

红 卫 兵

1966年6月2日

这张大字报的下部留有一大块空白，是给同意大字报观点的人签名用的。当天在这张大字报上签名的有100多人，我和我们班的许多同学都在上面签了名。当时的红卫兵组织很不严密，在红卫兵大字报上签了名的不一定是红卫兵，而有些人未在大字报上签名，却也是红卫兵。关键在于观点是否与红卫兵一致。

这是红卫兵的第一次公开亮相。当时大部分学生的大字报基本上都是两个内容：一是批判“三家村”，二是表示拥护校领导、党支部。也有不少大字报对预651班等反对校领导的人进行批评。以个人名义写大字报对校领导表示怀疑、甚至对校领导进行批判的极少，著名民主人士章乃器的儿子章立凡是当时除红卫兵以外很少的几个明确反对校领导的人，他前后写了好几篇给学校领导提意见的大字报。6月4日，团中央派了两个人到清华附中进行调查。在以后的几天里，他们分别与包括红卫兵观点在内的各派学生代表进行了几次座谈，红卫兵在与他们的座谈中，感觉受到了鼓舞，斗志更加旺盛。此后，形势发展很快，红卫兵逐步从防守转入进攻。6月5日，红卫兵在教学楼一楼门厅正面贴出一张题为《揭穿一个大阴谋》的大字报，开始公开点名批判校领导。大字报全文如下：

万××在5月23日干部会上，以及田××、冯××在以后各班级政治课上宣读的《高教部党委召开座谈会，讨论和布

置高等学校的学术批判运动》纪要^①，经我们分析调查，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反动文件。

(1)文中提到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在4月17日以前已明确指出当前进行的是一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根本不叫什么“学术批判运动”。而这个反动文件所谓的“学术批判运动”是对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恶意歪曲。

(2)上述反动文件的第一条是组织师生展开对《海瑞罢官》和所谓“清官”问题的辩论。统计所谓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学院师生共写出批判性文章1400多篇，“认真地查阅了1400多万字的资料”，这纯粹是宋硕、陆平企图把这次文化大革命拉到所谓“纯学术”上的大阴谋。

(3)上述反动文件第二条是：“组织下乡试行半工半读的文科学生同工农兵结合起来，批判吴晗的反动观点”。这是陆平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打击压制北大革命左派种种罪恶勾当中的一个。

(4)上述反动文件对当前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存在问题的结论是：“领导落后于实际”。这是胡扯。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捣乱。

(5)上述反动文件说什么“北京师范学院、北京大学的实践证明这是一条好经验”，说什么“只有实行领导、学生、教职工三结合”“才能使斗争规模大、声势壮、威力强”。这是陆平独出心裁编制的骗局。总之，这个文件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文件。

^① 1966年4月17日，中共高等教育部委员会召开北京、天津地区14所高等学校党委书记、政治部主任、党委宣传部长和团委书记座谈会，讨论和部署在批判吴晗和辩论《海瑞罢官》、“清官”等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学术批判。

然而，我们有几个问题必须向校领导提出：

(1) 万××在5月23日及田××在此以后说“这个文件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批准的，认为是个好文件”。然而党中央和毛主席根本就没有批准过，也根本不会批准这个反动文件。那么我们要问，是谁告诉你们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批准的呢？你们所谓的党中央是哪个党中央？你们为什么滥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威信来欺骗全体同学呢？

(2) 万××等说这个反动文件“对当前文化大革命仍有指导意义”，我们要问，你们所谓的意义，是什么意思？我们不能不认为是修正主义的意义。

(3) 你们在4月14日华北局接收北京市委（作者按：原文如此，不确。1966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向北京市委派出工作组，协助市委开展“文化大革命”。）相隔一个多月的5月23日还把这个反动文件当作最高指示，那么在以前你们执行的“文化革命”路线，是谁的路线呢？

(4) 你们为什么要5月23日还把这个4月17日的反动文件向同学传达呢？是不是想把这个反动文件作为向学校的革命左派进行压制批判的工具呢？

(5) 我们还要问，是谁精心编制的这个抗拒党中央，欺骗群众的大阴谋？

全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要革命的同学们，好好想想这到底是什么？

我们希望党支部中敢于革命的同志和全体要革命的同志们站在一起，揭穿这个大骗局、大阴谋！

红 卫 兵

1966年6月5日

红卫兵的大字报引起了全校的广泛关注，也招来了很多反对

和批判的大字报，清华附中绝大多数的师生在当时是相信党支部的，对处于反对派地位的红卫兵程度不同地持批判态度。红卫兵在这一天还贴出了一张题为《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字报。在这张大字报里，红卫兵向全校同学发出号召：“一切要革命的同志，立即行动起来，向近在身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黑线猛烈开火！我们要做无产阶级彻底革命派，决不当资产阶级保皇派。”在这里，红卫兵已经毫不客气地把清华附中党支部称为“近在身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黑线”了。

6月6日，红卫兵又贴出题为《一切要革命的同志站出来》的大字报，红卫兵以十分自信的口气写道：“我们与党支部的分歧，决不是什么个人同组织的分歧，而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同资产阶级保皇派争夺教育领导权的阶级斗争。党中央的要在教育领域内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令一下，北京大学的大字报立刻响起了第一声春雷，全北京市各大中学校纷纷响应，这场伟大的教育革命，已经席卷了全国。许多中学的左派已经占了压倒的优势，正以雷霆万钧之力向保皇派进行毁灭性打击！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们坚信清华附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师生是要革命的，暂时受蒙蔽的，一旦了解了事实真相，就会立刻拿起武器，同我们并肩战斗！一切要革命的同志，站出来！党中央和毛主席是我们强大的靠山，全国的工农兵是我们的伟大后盾，全国各地的左派是我们的坚强后盾，我们是无所畏惧的！革命事业必胜！同志们，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围，把子弹推上枪膛，向教育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

四

6月1日以后，北京各大中学校都处于一种极度兴奋和忙乱的气氛之中。大中學生开始走出校门，各学校之间的串连越来越频

繁。清华附中红卫兵一方面积极向党中央、华北局、北京新市委写信，反映情况；一方面向北京各有关中学进行串连，寻求支持。

6月8日上午，海淀区的人大附中、北大附中、地质附中、北航附中等学校以及城区的四中、六中、八中、十三中、二十六中等学校300多人相约来到清华附中，声援红卫兵。学校领导感到来者不善，便以“维持秩序”为名关闭了校门。这些学校的学生在校门外坚持了10个小时后，才被允许进入校园。他们与清华附中红卫兵一起，在校园里刷了许多大字报、大标语。为了表示对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支持，好几个学校的学生都在自己写的大字报和大标语上署上了××学校红卫兵的字样。其中，人大附中红卫兵和四中红卫兵分别送给清华附中红卫兵一副对联，一副写的是：“先驱者，为革命，洒尽碧血；后继人，保江山，掏出红心。”另一副写的是：“为革命，纵一死，又有何惧？！捍专政，复永生，血染河山！”此后，红卫兵的名称很快就在北京许多学校里传开了，以红卫兵或红旗等命名的学生自发组织成批出现。

6月8日晚上，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进驻清华附中。工作组组长章建华，组员多是在中央团校学习的各地团干部，工作组一共15人。同时，担任海淀区工作团副团长的刘晋（原中央团校哲学系主任）也常驻清华附中，指导工作。

6月9日，红卫兵以胜利的姿态贴出题为《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团结起来》的大字报，全文如下：

同志们！新的战斗就要开始了！

几天来，红卫兵出了一些大字报，在同学中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广大同学纷纷揭露了学校中的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和事实，许多校内外同志挺身而出，表示坚决支持红卫兵的革命立场。这一切，大大鼓舞了我们必胜的信心，我们最热烈地欢迎你们，革命的同志们，在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下，在捍

卫毛泽东思想,和一切牛鬼蛇神的搏斗中团结起来。

现在,斗争还仅仅是开始,一小撮保皇党和别有用心的人还在挑拨、谩骂,负隅顽抗,他们企图在学校里制造两派同学的争执,而让我们的敌人从中溜掉。我们决不能让他们阴谋得逞。我们要用主席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洞察一切,决不能含糊。现在,我们的主要敌人是校内外资产阶级当权派和他们的代表人物。这是一场复辟与反复辟,争夺教育界领导权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是培养什么样接班人的大问题,我们千万不要让别有用心的人叉开我们的道路,分散我们的精力。

同志们,为了扫清一切牛鬼蛇神,为了让毛泽东思想的红旗在清华附中上空骄傲地永远飘扬,让我们团结起来,贡献出自己全部、全部的力量!

红 卫 兵

1966年6月9日

其实,到此为止,红卫兵在学校里在人数上还是少数,据工作组进校时的统计,红卫兵共101人,占全校学生总数的8%左右。这时候的红卫兵组织还没有后来那样讲究出身,干部子弟占大多数,但非干部子弟也大约占三分之一。^①红卫兵人数虽少,但它有组织,有目标,有干劲,力量正在迅速壮大;相反,学校领导人却在瞬息万变的形势下显得力不从心,不知所措,只能处于被动应付的局面。工作组一进校,大多数师生就已经认定,校领导肯定是有问题的。

6月9日晚,工作组在学校操场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刘晋在会上旗帜鲜明地表示坚决支持红卫兵,称红卫兵是坚定的革命左派。他严厉要求以万××为首的附中党支部老实交代自己的问题。事

^① 张承志:《红卫兵时代》,第58页。

后知道，清华附中工作组之所以能够一进校就明确表态支持红卫兵，是因为团中央领导人当时已经认定以蒋南翔为首的清华党委烂掉了。胡克实在对刘晋等人的讲话中就说过：“清华大学的领导对文化大革命是采取对抗的态度”，“蒋南翔用他取得的领导权来进行反对文化革命的活动”。他要求清华附中工作组“要进一步挖出清华附中的黑线人物”，“清华附中搞好，是清华的突破口”，“希望从你们附中挖出清华党委的问题”。^①

工作组进校后，校内形势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绝大多数师生很快就从“拥护党支部”，批判红卫兵，转向“口诛笔伐”万××等附中的“牛鬼蛇神”。在工作组的主持下，于6月17日、19日和20日，三次召开全校师生声讨批判大会。在6月20日的声讨批判会上，刘晋宣布清华附中校长万××停职反省。红卫兵的队伍也得到迅速壮大，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人数从101人发展到300多人。红卫兵的组织受到“左”的阶级路线的影响，发展的新成员大多为出身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家庭的学生，即所谓“红五类”，但也并不是清一色的，据当年9月的一个统计，清华附中红卫兵中出身非红五类的大约占10%左右。^②

清华附中工作组于进校后不久写的一份汇报材料中介绍了当时的一些情况：“到目前为止，全校师生已贴出20000多张大字报，揭露了一批严重问题，揪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初步开展了批判斗争，大煞了牛鬼蛇神的威风。工作组进校时，右派势力气焰嚣张，左派力量孤单，左派学生仅101人，占学生总数的8%；左派教师2人，占教职工总数的1.7%。目前，左派学生已增加两倍，占全校学生总数的13.9%。6月8日，外校300多人来声

① 《胡克实、惠漱昌在刘晋汇报时的讲话记录》，1966年6月10日。

② 清华附中红卫兵、革委会：《关于红卫兵组织的七个问答》，1966年9月13日。

援左派，被拒之门外 10 小时，并调来大学部的打手——校卫队，请来海淀分局的便衣队，企图镇压群众运动。6 月 4 日，团中央派 2 人来了解情况，被盯梢、偷听。在工作组进校前，17 名干部子女自发地组织了红卫兵。他们的主要特点：一是根子正，出身成分好，大部分是革干子女；二是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三是敢于革命，斗争性强。工作组进校前，尽管他们力量单薄，受到围攻，但他们坚持革命，勇于向学校提意见，敢于向一切牛鬼蛇神开火。他们不怕开除、不畏失学，坚决顶住了右派的围攻。事实证明，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年轻一代，听党的话，敢于革命，真是可贵得很！可爱得很！……进校二十多天来，基本上没有发生打人、体罚、破坏公共财物等现象。”^①

五

清华附中工作组进校之初是全力支持红卫兵的，但不久即与红卫兵产生了分歧。6 月 21 日，清华附中召开全校师生代表大会。在选举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人选问题上，红卫兵与工作组发生了分歧。工作组要求革委会有广泛的代表性，应该吸收一些红卫兵以外的左派参加。红卫兵认为那是“拉夫”，会使革委会背“包袱”。在红卫兵的坚持下，清华附中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全部由红卫兵担任。王铭任主任，张晓宾、卜大华任副主任。“从这一事件中，工作组发现红卫兵领导核心对工作组的领导和团结大多数的问题上，存在不正确的认识。”^②

在此前后，红卫兵与工作组之间还发生了一些摩擦，一些红卫

^① 《清华附中工作组的汇报材料》（1966 年 7 月 4 日），存于北京市档案馆。

^② 清华附中工作组：《清华附中左派学生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和解决情况》，载于共青团中央《文革简讯》第十期。

兵违背工作组布置的学习、讨论内容，自己另搞一套；一些班级不顾工作组的劝阻，开了“整”右派学生^①的会；有的革委会成员在同学中公开谈论与工作组的矛盾。当时社会上也很混乱，有传言说“团中央有问题，三胡^②完蛋了”。

6月23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社论《左派学生的光荣责任》，强调在文化大革命中团结大多数的问题。红卫兵认为这篇社论只讲团结，不讲斗争，是折中主义。红卫兵决定公开进行反击。6月24日，红卫兵在教学楼一楼门厅贴出两张大字报，一张贴在门厅的正面，就是众所周知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③；另一篇贴在门厅的左面，题目为《左派学生的光荣责任是彻底闹革命》^④，全文如下：

《中国青年报》6月23日社论《左派学生的光荣责任》，是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的文章。它出来之后，立即受到我校右派的赏识，把它当作打击左派的一根大棒。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它充当了许多牛鬼蛇神、保皇党分子抵抗文化大革命的护身符。团中央不是不知道，学校中有严重修正主义思想的师生不在少数；团中央也不是不知道，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出，这场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扫除一切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的大革命；团中央也不是不知道，我们这一代是承前启后的一代，我们的成长和思想的改造，关系到我党我国革命的前途，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前途。我

① 从清华附中工作组编的简报和刘晋向胡克实的汇报记录中可以看出，在对“右派学生”的认定上，工作组与红卫兵并无不同，但在对“右派学生”的做法上，工作组更讲究政策和策略。

② 指当时团中央的三个负责人：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

③ 当时大字报题目是《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后加上“无产阶级”四个字。

④ 这篇大字报后来在收入清华附中红卫兵编印的《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红卫兵大字报选编》一书时，题目改为《中国青年报社论〈左派学生的光荣责任〉应该彻底批判》。

们这一代承担着毛主席的全部希望和世界人民的全部希望。一切拒绝改造的人，都纷纷在这篇社论下，躲避革命的炮火，他们不但固守，而且把它当成大棒，向左派反攻倒算，翻案风顿时大作！你们为右派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反革命弹药。请看那些过去愁眉苦脸的右派们，今天是多么兴高采烈哟！这篇文章的立场不是很鲜明的吗？

在这篇社论中，我们认为有两点原则性错误：

一、不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是一味强调团结，散布了阶级调和论，抹杀了复辟反复辟斗争的严重性。现在，阶级斗争尖锐复杂，有许多学校左、右派分不清，甚至有些工作组，依靠右派打击左派。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应该分清阶级界限，革命与反革命界限，区分左中右，依靠左派打击右派，争取、团结和教育大多数。而绝不能抹杀左中右的区别，搞折中主义，和稀泥。主席说：“划清反动派和革命派的界限，揭露反动派的阴谋诡计，引起革命派内部的警觉和注意，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才能孤立反动派，战而胜之，或取而代之。”（《论人民民主专政》）

二、对各派力量不从阶级本质上分析。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绝大部分反动阶级的子女都是积极的保皇派，他们中间坚持反动立场的为数甚多，这难道仅仅是“受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蒙骗，说了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的问题吗？这不是明摆着为他们开脱罪责吗？

最后，我们要问：到底什么是左派的光荣责任？是首先强调革命、斗争呢，还是一味强调无原则团结呢？希望你们作公开的深刻的检讨，消除它的危害。

红 卫 兵

1966年6月24日

6月25日,红卫兵又贴出题为《必须触及灵魂》的大字报,阐明自己对团结大多数问题的观点:“我们要团结大多数同学,这是毫无疑问的。毛主席说:‘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我们要通过斗争来达到团结,而团结的目的又是为了更好地斗争。事实上也是如此,在斗争中越来越多的同志觉醒过来,坚定地和我们站在一起。我们讲团结,一个原则就是一定要革命。如果你死抱着你自己那一套不放,以种种方式坚持自己的立场(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怎么能出污泥而不染呢?),我们决不能放弃原则去团结你们。我们要大斗特斗,直到这些人真正触及灵魂,敢于清除自己灵魂深处的污秽,我们才能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红卫兵的行动使工作组大为恼火,工作组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这张大字报,“实际矛头是指向工作组的”^①。清华附中工作组将红卫兵与他们之间的主要分歧归纳为:“一是主攻目标的问题。我们认为要首先集中火力打击极少数的牛鬼蛇神,而他们借口‘触及人们灵魂’、‘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清除一切旧思想’,想整同学,有的班已整了三次同学。二是团结绝大多数的问题,我们认为经过斗争,要逐步做到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他们却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有的说:‘我们班上起码有30%的人不能团结’。三是党的领导的问题,我们认为,党的领导通过工作组来体现,他们却提出:‘只相信毛主席’,要‘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实际上是不要工作组的领导,搞红卫兵专政。”工作组当时“确立要采取的方针是:保护左派的积极性,在旗帜鲜明、坚持原则的前提下,以最大的耐心来教育左派,提高警惕,仔细观察动向,注意左派核

^① 《附中新动态》(1966年6月27日),载清华附中工作组编《清华附中文化革命情况简报》第十七期。

心是否有假左派真右派混入。”^①

工作组承认红卫兵是左派,但又感到红卫兵独立性太强,难以驾驭。6月26日,胡克实听了刘晋的汇报后,认为红卫兵“没有政策水平”,“相当不懂事”。他提出“要跳出红卫兵的圈子,团结红卫兵以外的左派。”他在6月27日的汇报会上又说:“我看就是要消化红卫兵,能不能把党团组织恢复起来。对红卫兵的政策,采取教育提高方针,作为依靠力量之一,把红卫兵消化在党团组织之中。”^②6月25日,个别红卫兵成员将《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转抄到清华大学去,表示对反对清华大学工作组的蒯大富的支持。此举引起清华大学拥护工作组的许多学生的愤慨,纷纷到清华附中贴反对红卫兵的大字报,有的大字报甚至提出要求工作组“逮捕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小集团红卫兵”。

当时正值北京新市委书记李雪峰提出“反干扰”的要求后不久,许多反对工作组或给工作组提意见的人被当作“与工作组争夺领导权”的“坏人”,而受到批判,一些学校的红卫兵组织被宣布为“非法”。但清华附中红卫兵此时士气正旺,并没有在这样的形势下退缩,他们于7月4日又贴出《再论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并在文中转引了1966年6月5日《人民日报》一篇短评《汉弗莱的哀叹》中引述的毛泽东1939年的一段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这篇文章一出,使得反对工作组和其他许多人都感到突然和不解,毛主席怎么能讲这样的话?怎么能将马列主义的道理概括为一句“造反有理”?直到查实毛泽东确曾在延安庆祝斯大林诞辰60周年的大会上的讲话

^① 《清华附中工作组的汇报材料》,1966年7月4日。

^② 《胡克实在刘晋汇报时的讲话记录》,1966年6月26日、27日。

中讲过这句话,才默认了红卫兵的文章。

而清华附中工作组为了转变红卫兵的观点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办法。他们多次召开红卫兵骨干会,进行思想工作。他们还发动一些红卫兵家长来教育红卫兵。但都收效甚微。秉承团中央负责人关于恢复党团组织的要求,在工作组一手安排下虽然成立了一个并未包括红卫兵全部负责人参加的分团委,但在红卫兵的坚决抵制下也未能发挥任何作用。红卫兵与工作组的关系日趋紧张,有的红卫兵负责人曾当面顶撞工作组成员,但红卫兵始终没有与工作组公开决裂,总是尽量取得工作组的支持;而工作组也一直力争通过诱导来解决红卫兵的问题,团中央负责人曾指示刘晋,可以通过搞红卫兵某负责人父亲的问题来压红卫兵,刘晋也没有执行。在一般公开场合,红卫兵和工作组还是保持着比较正常的关系。虽然双方的争执、摩擦不断,却也没有立即反目为仇。

7月中旬的一天晚上,为消除工作组与革委会(当时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并未建立单独的领导机构,革委会同时也是红卫兵的核心机构)的矛盾,在学校办公室召开了有工作组全体成员和革委会大部分成员参加的会议。工作组指出红卫兵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个别成员背着工作组搞非组织活动,诋毁工作组,个别人甚至是别有用心坏人。而红卫兵针锋相对地指出,工作组对红卫兵口是心非,表面肯定,具体否定,甚至提出对红卫兵组织要分化、瓦解,这些东西都已写进了工作组的汇报材料中,刊载在团中央所编《文革简报》第四期和第十期中,这些材料已经在社会上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许多学校的工作组提出取缔红卫兵,取消小集团的非组织活动,皆由此而来。会议进行了整整一夜,会上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气氛非常紧张。会议当中,团中央领导还两次来电话,指示要对红卫兵中的“坏人”公开点名,但慑于红卫兵的高度团结和政治理论方面的“骁勇善战”,以及对于未来政治斗争前途的不确定性,

工作组主要负责人并未贸然“公开点名”，因此，工作组与红卫兵的矛盾未能公开激化。^①

7月27日，海淀区召开中学生代表大会，江青等人到会支持学生反对工作组，当场宣布将海淀区中学工作团团长周杰罢官。消息传来，清华附中红卫兵决定将与工作组的矛盾公开。当晚在校内贴出《向清华附中工作组的错误言行猛烈开火》的大字报，全文如下：

清华附中工作组进校后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产生了不少错误。在这里，清华附中革委会和红卫兵向全体革命师生发出号召：向工作组的这些错误猛烈开火！

清华附中工作组在我校犯了哪些错误呢？

（一）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从不指导全体师生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同时自己也不努力学。

（二）毫无阶级感情。以执行党的政策为名，对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爱护备至，体贴入微。对反革命言行不闻不问。对右派学生包庇、袒护，对革命左派红卫兵却猜疑分化，严重地阻碍了贯彻阶级路线，妨碍阶级队伍的形成。

（三）专横跋扈，不走群众路线，独断专行。革委会成为傀儡一个，毫无权力。

（四）打击红卫兵，抬高工作组，不惜使用造谣之手段。对红卫兵、革委会采取突然袭击的卑鄙手段。

（五）反对搞人的思想革命化，不触及灵魂。说什么搞人的思想革命化妨碍打主攻方向，一派胡言乱语。

（六）命令我校同学盲目支持石油附中团中央工作组，却

^① 参见《刘晋谈话记录》（1967年10月16日）。历史也真会和人们开玩笑，这位团中央负责人和他要整的这个红卫兵负责人后来竟成为了翁婿关系。

不许我校同学了解真实情况。

(七)千方百计反对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的造反行动。

(八)工作组的存在,已成为我校文化大革命继续深入的严重障碍。

党中央号召我国全体人民,更努力地学习最高指示,忠实地执行最高指示,热情地宣传最高指示,勇敢地捍卫最高指示!

工作组有很多言行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现在是全体革命师生起来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时候了!

清华附中文化革命委员会和红卫兵再一次向全体革命师生庄严号召:一切革命的师生行动起来,对清华附中工作组的错误言行予以揭发、批判、斗命,坚决地毫不犹豫地捍卫毛泽东思想。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清华附中革委会

红卫兵领导核心小组

66.7.27 发

7月28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在北京展览馆电影厅召开大会,宣布撤销海淀区各中学工作组。清华附中红卫兵代表骆小海、邝桃生在大会上宣读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两篇大字报,并将两篇大字报稿和一封短信交给了在主席台上就坐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请她将大字报稿和信转交给毛主席。红卫兵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有人说这两张大字报是反动的,请您老人家看看,这到底是不是反动的的大字报(大意)。江青当场答应一定给带到。

红卫兵回到学校后,又贴出《三论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其中写道:“造反,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传统,是

红卫兵要继承和发扬的传统。我们过去造反，现在造反，将来还要造反！只要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就要造反！只要矛盾存在，就要造反！革命的造反精神，一百年需要，一千年需要，一万年还需要！”把“造反”的口号喊得更加响亮了。

六

8月3日，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钓鱼台约见了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代表王铭和卜大华，将毛泽东8月1日写给他们的信传达给红卫兵。毛泽东的信全文如下：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在七月二十八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求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由彭小蒙同志于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他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

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毛泽东的这封信，在当天就作为一份重要文件印发给刚刚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尽管没有正式发表，这封信和8月5日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还是很快就传遍北京，传遍全国，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震动。此后，红卫兵组织不但在北京各中学得到迅速发展，而且在各高校、机关也开始有了发展。

随着红卫兵组织的迅猛发展，北京市不少地方出现了乱打乱斗的现象，一哄而起的各种名目的红卫兵组织各行其是，为所欲为。一些红卫兵组织任意揪斗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抄家、打人之风日甚一日。8月6日，在天桥剧场召开的关于对联问题辩论会上，散发了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三校红卫兵联合发出的《紧急呼吁书》，对违反党的政策、随便打人的现象提出批评。《紧急呼吁书》中说：“最近，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运动中出现了一系列极端严重的错误事件。一小撮混蛋和一伙不听毛主席话的糊涂虫披着红卫兵、红旗等革命左派组织的外衣，打着造反的旗号，公然抗拒毛主席的指示，公然违背党的政策，公然违犯无产阶级专政纪律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压制打击不同意见的革命群众，到处殴打一些人，打伤了许多好人和工农革干子弟，捣毁机关学校，进行流氓活动，有人竟敢乘机肆意毁坏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画像和塑像，发泄自己对革命的刻骨仇恨，进行反革命政治活动！这一切，都严重地破坏着革命左派威信，破坏着党的威信，破坏着毛主席的威信。”《紧急呼吁书》提出：“各校真正的左派联合起来，行动起来，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严格制止乱打人、耍流氓，破坏国家财产等坏行为。”“毫不留情地勒令那些故意破坏党的政策的混蛋们滚出红卫兵、红旗及其他真正左派组织；假左派组织一律解散！今后谁还胆敢破坏党的政策，我们绝不答应！”康生、江青等人当场表示支持红

卫兵的《紧急呼吁书》，后来还将此《紧急呼吁书》印发正在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但时隔不久，他们又攻击这个《紧急呼吁书》是王任重搞的阴谋，是压制群众的，并正式通知收回过去印发的这个《紧急呼吁书》。^①清华附中红卫兵后来在8月27日发表的《红卫兵战校（前清华附中）红卫兵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一文中，更进一步阐明了自己反对武斗、反对打人的观点，反对肆意破坏党的统战政策，随意提出解散民主党派，号召要学习十六条，团结大多数，不折不扣地执行党的一贯政策。在当时受到了不少群众的欢迎。许多省市将《十点估计》与《十六条》印成大字宣传品并排张贴，一时成为各级领导要求群众组织自律的典型。尽管清华附中红卫兵一贯反对武斗、反对打人在当时北京的中学中是十分出名的，但实际要做到这一点也难，在清华附中也还是出现了不少打人现象，有少数红卫兵成员甚至带头动手打人，或听任别人打人而无动于衷，这是后话。

8月18日上午，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有首都和全国各地师生参加的百万人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毛泽东出席了大会。经毛泽东提议，1500名学生代表被邀请上天安门城楼，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检阅游行。清华附中的20几名代表也兴高采烈地登上了天安门城楼。那天，我们第一次在那么近的距离看见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第一次与他们在一起照了相。骆小海、韩军、宋柏林3人按捺不住好奇和激动的心情，乘警卫不注意，径自闯进了天安门城楼中央的会客厅，见到了毛泽东。他们激动地连声向毛泽东问好，祝他万寿无疆。毛泽东回答说：“万寿也有疆嘛！”当骆小海等人告诉毛泽东，他们是清华附中红卫兵时，毛泽东

^① 详情见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第337—338页。另据当时传抄的大字报说：毛泽东当时曾说过，“北京太文明了，急急忙忙派工作组，急急忙忙斗右派，急急忙忙开十万人大会，急急忙忙发呼吁书，急急忙忙提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

大声地向他们说：“我坚决支持你们！”红卫兵问起毛泽东写信的事，毛泽东说：“那是草稿，还没有发给你们哪！”毛泽东大概想对这封信进行一些斟酌、修改后再正式发出，但随着形势的发展，红卫兵组织很快就产生了分化，所谓“老红卫兵”的作用和地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此信后来始终没有正式发出。

8月19日，各大报刊在发表大会消息的同时，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毛泽东身着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的大幅照片。毛泽东对红卫兵的坚决支持，对红卫兵运动走向全国，形成强大的政治运动起了关键的作用。“8·18”大会以后，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遍布全国城乡。

人民解放军“三支两军”述略

邓礼峰

1967年至1972年间,人民解放军先后派出280余万名指战员执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三支两军”人员分布在全国各条战线上,范围之广,规模之大,人员之多,时间之长,是我军建军史上前所未有的。

一、“三支两军”的决定

1967年1月初,以上海国棉十七厂王洪文等为头头的上海一批造反派组织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下,夺取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领导权,掀起了所谓“一月风暴”。毛泽东大力支持这个夺权行动,把它看作是贯彻“文化大革命”方针而彻底改组各级领导的有效方式。1月16日,《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传达毛泽东的话,说“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1月22日《人民日报》也在社论中号召:“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胜利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伟大历史任务”。接着山西、青岛、贵州、黑龙江等地的造反派组织也先后宣告夺了省、市委,省、市人委的党政财务领导权,得到中央的认可。在很短时间里,全国掀起了从中央各部门到地方各级党政部门以至各行各业的全面夺权风暴,地方各级

党组织和政府机关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公安、检察、法院等机关失去或基本失去作用，工矿企业停产或半停产，武斗成风，社会秩序混乱，局势难以控制。为了制止上述混乱局面，为了使“文化大革命”按照预定方针继续进行下去，毛泽东决定人民解放军正式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

1967年1月21日，南京军区党委向党中央呈送了安徽省军区的请示报告，转述了首都第三造反司令部驻安徽联络站等单位提出派部队警卫斗争省委主要负责人李葆华等人的会场，防止对立派的冲击的要求，指出“如不派就是不支持文化大革命，并限安徽军区廿一日十四时前答复。”同日，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①而早在1966年10月5日，中央军委、总政就曾发出《紧急指示》，中共中央也于1967年1月14日发出《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都规定军队和军队院校不得介入、干涉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批示后第二天（1月22日），他在接见军委碰头会议人员时，要求他们：“真正站在革命派方面，象唱戏一样，要亮相”^②。他批评许多军区把“造反派”讲得一无是处，要求军队能够公开支持的，就公开支持，时机不成熟的，就半公开支持。

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左派群众的决定》。《决定》规定：1、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违反上述精神的指示，一律作废；2、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凡是真正的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97页。

^② 《中国人民解放军通鉴》，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6页。

无产阶级左派要求军队去援助他们，军队都应当派出部队积极支持他们；3、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4、重申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防空洞的指示；5、在全军深入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

为了贯彻上述支左的决定，同时为稳定军队所需，中央军委于1月28日颁布了《中央军委命令》。因其共有8条，也称为《军委八条》。

《军委八条》在肯定支左、在军队内部大力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对军内外造反派的行动作了许多限制，如“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以及各级干部严格管教子女等。

3月19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一、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机关应视情况抽调1/3、1/2甚至2/3的人员立即投入“三支两军”工作。二、各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包括各军区所属的这些单位），可在整风告一段落后，立即投入上述工作，作为这些单位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步骤。三、各总部、军兵种（包括在北京的所属院校）抽调的人员，由总政治部统一分配、使用。驻各军区所在地区的院校抽调的人员，统一由各大军区，省军区领导、调配和使用。

按照上述指示和决定的精神，人民解放军全军师以上机关设立了“三支两军”指挥部（或办公室），列入编制。各部队陆续派出了大批干部、战士投入“三支两军”工作。

二、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和军训

(一)支左。支左是“三支两军”的核心。既然要积极支持左派夺权斗争,那就须在众多的群众组织中区分谁是“左派”,谁是“右派”。但是毛泽东的指示信和中央的《决定》都没有能够把这些问题讲清楚。毛泽东在指导夺权斗争中曾发过一系列重要指示。概括起来,就是6个字:“大联合”、“三结合”,即“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行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组成的“三结合”。在夺权后组成的临时权力机构,称为“革命委员会”。为了实现这种“大联合”和“三结合”,要求正确对待干部,正确对待各造反派组织,各造反派组织要进行整顿,要反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等等。

但是这些社论、指示和通知却很少收到实效。各派都从维护本派的利益出发来夺权、掌权。对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指示、通知各取所需、各行其是。在各个造反派组织之间发生了无数的纠纷和冲突,甚至酿成武斗流血事件。支左部队介入后,很难避免支持这一派或那一派,于是在造反派组织同支左部队之间亦发生许多纠纷和冲突,不少地方出现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并酿成流血惨案。

为了进一步提高和统一军队高级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解决军队在“三支两军”中遇到的困难,维护部队的团结稳定,1967年3月间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军级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各总部军以上干部100余人。会上,林彪专门讲到支左问题。他说:地方有各派,左、中、右,要坚定不移地站在左派这一边,支左是新的,又是复杂的,所以搞得不好就要犯错误,或者是犯右的错误,或是犯“左”的错误,特别要警惕犯右的错误。他强调要站稳阶级立场,“要采取主动的进攻”。“要抓带枪的刘邓路

线”。林彪极力赞扬“造反派”，论证支左的必要性。他说：“这次革命是最好，是采取打倒他们的最好的办法：搞红卫兵，大鸣、大放、大字报等等。红卫兵就是捉拿牛鬼蛇神，捉拿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头子的天兵天将”。然而，会议提出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如：分不清谁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怎么办？左派夺了权却没有实行大联合怎么办？夺权排斥“长”怎么办？不同建制单位看法不一致怎么办？领导干部站不出来怎么办？军管后，各派组织斗争激烈怎么办？军训时，各派意见不一，要军队表态时怎么办？支农、支工时，干部撂挑子，生产无计划，群众无热情怎么办？军队本身任务和支左等任务矛盾时怎么办？等等，都没有找到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而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问题通过正常渠道又是无法解决的。唯一的办法，只能硬性规定，用林彪的话说，就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于是，山西省军区率先支持山西省的造反派夺权、山西省委、省政府、省人委全部被冲垮而陷于瘫痪。全军立即行动起来，举行支持左派夺权誓师大会，派出部队和人员支持所在省、市、地、县造反派展开夺权斗争。继之而来的贵州夺权，黑龙江夺权、山东夺权，都是在军队明确支持下促成的。

在部队和某些地方群众组织关系紧张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林彪认为《军委八条》无法适应新的形势，决定弄出个新的东西，向全军发出一份新的命令。4月6日，中央军委发布由林彪起草，毛泽东作了多处修改的《十条命令》，其要点是：（一）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二）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三）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四）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五）对待较大的群众组织采取重大行动前，应向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请示报告；（六）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也不要强迫群

众写检讨,群众自动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让他们认错,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七)在军队中要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八)对派到地方上去或主持支左的干部,要详细交代政策;(九)要学会做群众工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有事同群众商量,善于用说服教育的方式,而不应采取简单粗暴和命令的方式;(十)对业已违反了上述诸条做法的,都要立即改正,积极进行善后处理。^①

从表面上看,《军委十条》的主题是“正确对待群众”,但实质上它是支持冲军队、反军队的激进派。它有正确的内容,但关键内容和《军委八条》相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否定《军委八条》的。

《军委十条》颁布后,激进派大受鼓舞,许多支左部队被迫检讨、转向。原先一些支左部队按《军委八条》所做的工作被说成是错误的,他们在原地区就呆不住了,不得不做思想“转变”和“调屁股”的工作。1967年4月13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宣布内蒙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决定改组内蒙古军区。王效禹在青岛夺权后,继而在山东省夺权。人民解放军驻山东省的部队开始并不支持以王效禹为首的“造反派”夺权。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在支左问题上,济南军区党委与山东省革委会之间也有很大矛盾。张春桥、姚文元代表中共中央到济南处理这个问题时,明确表态,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支左工作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被迫公开检查,表示支持王效禹和三大“左派”组织。6月4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转发了山东省军区《关于向革命群众公开检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通鉴》,第1970页。

查支左工作中的错误的情况报告》，将其中“公开检查比不公开检查好，高姿态检查比低姿态检查好，早检查比晚检查好”的3条体会，提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作为范例，推广全军仿行。在此前后，中共中央还分别对福建、四川、甘肃、广东、湖南、江西、河南、吉林等地的支左工作作出决定或发表意见，否定了这些地区前一阶段的支左工作。各地区支左部队先后向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作出报告或公开声明，检讨“错误”，公开支持“造反派”夺权、掌权。军队的支左工作陷于被动、混乱状态。在这种情形下，全国出现了一系列乱军事件。在林彪、江青一伙的煽动下，不少地方的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同支左部队发生冲突的事件急剧增加，抢夺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围攻部队，殴打战士的事件连续发生。到1967年秋，全国陷入大内战、大混乱之中，上海、南京、常州、郑州、长春、沈阳、重庆、长沙等地相继发生大规模武斗，大批人员伤亡。为了扭转天下大乱的局面，毛泽东在肯定“形势大好，不是小好”的同时，要求“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军队的支左人员遵照这一指示，担负起制止武斗、收缴武器的艰巨任务。许多指战员冒着生命危险，亲临武斗现场，宣传毛主席指示，劝阻群众间的武力冲突。经过长期艰苦细致的工作，全国大多数地区的派性组织相继走向联合，武斗基本停止，局势趋于稳定。军队支左人员成为大联合的直接领导者、组织者和仲裁者。在“革命大联合”时8341部队在北京市针织总厂的支左人员提出“支左不支派”原则，为全军所接受。支左官兵深入两派之中反复作大联合的说服工作，把两大派头头组织到一起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讨论与签订解决本地区问题的“革命大联合”和制止武斗的协议。在“大联合”和“三结合”方针的指示下，各地的革委会大多在军队主持下建立起来。驻军代表在其中居于核心地位，起着主导作用。到1968年9月，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军队支左人员担任县以上革

委会主任的,北京市占 78%,广东省占 81%,辽宁省占 84%,山西省占 95%,云南省占 97%,湖北省占 98%。支左人员担任县以上革委会第一、二把手的约有 5000 余人,担任委员的有近 5 万人。

支左人员通过主持革委会和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还直接领导和组织了所在单位的斗、批、改。毛泽东规定斗、批、改的内容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中央警卫部队 8341 部队驻“六厂二校”(北京针织总厂、新华印刷厂、化工三厂、北郊木材厂、二七机车车辆厂、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支左人员,总结了有关斗、批、改的系列经验,为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先后批转全国,用以指导全国的斗、批、改运动。斗、批、改运动后因林彪事件而中断,军队支左人员也于 1972 年从地方撤回,整个支左任务进行了 6 个年头。

(二)支工。支工就是支援工业生产。鉴于“文化大革命”已影响城市、工矿企业等单位的正常上班,1966 年 9 月 14 日,中共中央向地方各部门、各厂矿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科学研究单位和服务行业,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号召乘“文化大革命”的东风,以“文化大革命”为纲,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和建设迅速向前发展。要求工矿企业、事业、商业、服务业、科学研究、设计单位的广大职工,要“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大革命和生产、建设双胜利”。12 月 19 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决定工矿企业、事业、科研、设计等单位的人员,积极开展“文化大革命”,带动生产的发展,要坚持八小时工作制,遵守劳动纪律,完成生产定额。然而这些规定由于一月风暴(夺权)的冲击无法执行。到 1967 年初,国民经济秩序陷入混乱,工业生产建设面临严重危机,工矿企业停工、停产的现象还十分普遍,全国工业生产急剧下降。1967 年 3 月 3 日,毛泽东在沈阳军区的一个报告上

批示，“军队不但要协助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全国厂矿企业革命职工、革命干部的信》，信中宣布“党中央决定，人民解放军大力协助地方，支持工业生产工作”。3月19日，中央军委在关于集中力量执行“三支两军”的决定中，把“支工”作为一项重要任务。由于军队的援助，一些遭受严重破坏的工业生产得到某种程度的恢复，一些停工停产的厂矿得以开工生产，一些因武斗而瘫痪的重点工程得以继续进行。解放军在此时期还参加了许多重点工程的建设，他们发扬打硬仗的精神，吃苦耐劳，作风顽强，令行禁止，成为一支特别能战斗的突击队。工程、铁道部队近100万人，会战成昆铁路，施工襄渝铁路，承担北京地铁的建设，打通了南疆和青藏铁路的最险地段。基建工程兵等部队参加了武汉钢铁公司，第二汽车制造厂、辽阳化工厂、上海金山化工厂、云南天然气化工厂、大庆油田、葛洲坝水利枢纽、南京长江大桥、广西柳江大桥、桑树坪煤矿、平顶山煤矿、天山公路等重要工程的新建、改建和扩建施工。解放军还经常派出人员、机械到车站、码头，突击装卸、运输，解决物资压车、压船、压港问题，还出动大批车、船、飞机，抢运内外贸易的紧急物资，有的部队还替工人顶班采煤采矿，等等。

（三）支农。支农就是支援农业生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大民主”、大串连、武斗之风蔓延到农村，好些农村由于展开“四大”，严重影响农业生产。1966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改变了9月份中央文件关于农村“文化大革命”不进行串连的决定，但是要求农村坚决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狠抓“文化大革命”，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1967年2月20日，鉴于春耕时节，一些地方农民因参加夺权斗争，打派仗，出现农业生产无人管，影响春耕生产的现象，中共中央发出《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

信》，要求“立即开一次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三级干部会议”，“动员一切力量，立即为做好春耕生产而积极工作”。同时，“建议人民解放军当地部队和各级军事机关大力支持、帮助春耕生产工作”。23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号召全体干部战士紧急动员起来，协助驻地农村人民公社，抓好春耕生产。人民解放军派出大批宣传队到各地农村，宣传中央《公开信》的精神；协助当地（省、专、市、县）领导机关和农村人民公社，开好春耕生产会议，安排春耕工作；说服动员农村基层干部承担起组织领导春耕生产的责任；成立领导生产办公室，恢复生产组织，动员外出参加串连、武斗的农民回乡生产。各地驻军还采取定点挂钩的形式，在耕种收割季节，都派出大批人员、机械，不失时机地支援农业生产。人民解放军的支农工作，为农业生产增产，减少粮食损失，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军管。军管即是对一些单位实行军事管制。由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混乱情况，严重危及到边防沿海、交通要道、专政机构、机密单位、宣传舆论阵地、国防工厂、重要仓库等核心要害部门的安全。为了保证这些单位部门必需的正常的工作秩序，1967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一切重要的粮食和物资仓库，监狱，以及其他中央规定必须保护和监视的重要单位，都要立即派出军队，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1月2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又发布了《关于民用航空系统由军队接管的命令》。尔后，又决定对公安局、国防工业部、国防科学技术研究院及所属单位、铁路系统、邮电、电台、消防等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同时，相继发布了对厂矿实行军事管制的布告和军事管制工作的试行草案。布告和草案中对军事管制的组织机构、工作职责等作了明确的规定。军事管制的机构有两种：一种是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设有军管会主任、副主任，军管会成员若干人；一种是建立军管小组，设有军管小组

组长、副组长，军管小组成员若干人。军管会或军管小组，负责本单位或下属系统的全面工作。如：按照中央的精神进行“文化大革命”，领导组织完成生产、业务和工作，维护社会秩序，安排群众生活，等等。军管形式主要是派出军管代表或一定数量部队进驻，保护单位的安全。到1967年2月中旬，全国实行军事管制的单位即达6900多个，大部是公安、国防工业、国防科研、邮电、电台、报社、银行、仓库、监狱等核心要害部门。实行军管的省、自治区有10个。此后，实行军事管制的单位部门还有增加扩大，甚至出现了军队对军队实行军事管制的奇怪现象。如军队的许多院校，总政治部等单位，曾实行过“军事管制”。采用军事管制的方法，全面地长期接管地方工作，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但它也是在“文化大革命”极端混乱、领导干部被打倒、机关瘫痪等严重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的一种非常应急措施。实行军事管制，使一些要害单位在“文化大革命”中免遭更大的损失，对保护国家财产，维护稳定，保证生产等，起了重要作用。

（五）军训。“军训”就是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学生实行军事训练。1966年8月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遍及全国，随后各学校分成两派或几派，难以驾驭，因而对师生实行军事训练，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教育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1966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通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派军队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方法很好。训练一下和不训练大不一样。这样做，可以向解放军学政治，学军事，学四个第一，学三八作风，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强组织纪律性。驻京部队派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经验很好，很有成效，应当在全国推广。”《通知》指出：派军队干部战士训练革命师生，“对加强战备，保卫国防，对加强革命师生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的锻炼，对有些学生将来参加人民解放军，当解放军战

士,对进一步密切军民关系,都有极大的好处。”^①《通知》提出:政治训练内容,主要是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语录和“文化大革命”的有关文件;军事训练,主要进行必要的队列训练,重点是由单个到连的队列动作;训练办法,由各军区、省军区分片包干,各学校按照班、排、连、营、团的序列进行编组;训练地点在本校;每期训练时间半个月到20天。为从组织上保证军训任务的落实,《通知》规定:总参、总政设立全国大中学校短期军政训练领导小组,各省和大中城市,以军队为主。当地省、市委、自治区党委和文化革命小组派人参加,设立大中学校革命师生短期军政训练领导小组,负责指导工作。《通知》要求,从现在起,到明年暑假,派出得力的干部和战士,分期分批地对全国大中学校的革命师生,普遍进行一次短期军政训练。1967年3月8日,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3月7日关于《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报告上的批示:“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预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按照上述指示精神,各部队陆续抽出干部战士,对大中学校师生进行军训。“军训”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集中时间进行短期的军政训练,15至20天;一种是抽出干部战士,组成“军宣队”进驻学校,参与组织领导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和军训。实践证明,军训对于培养青年学生良好的生活习惯,加强组织纪律性很有好处。同时,对稳定学校的秩序,防止更大的混乱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军训”又不可避免地将“文化大革命”的方针贯彻到学校工作中去,将军队工作的经验生硬地移植于学校工作,用带兵教兵的方法对待青年学生,也产生了一些不良后果。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年鉴》,第1958页。

三、“三支两军”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后果

实行“三支两军”，是“文化大革命”中人民解放军的一项重要任务。到1970年底，军队共有干部战士278万余人次参加了“三支两军”工作，此时仍有40多万人在支左，其中担任县（相当县）以上革命委员会委员的有4.9万余人。1971年8月20日，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转发《广州军区三支两军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纪要》，并在中央批语中加注“认真研究”四个字。座谈《纪要》反映，“三支两军”人员中存在着一些错误的思想作风，如骄横跋扈、好大喜功、任人唯亲、打击报复、滥用职权、违法乱纪等等；有些“三支两军”人员不尊重不支持已经成立的地方党委，存在着特权思想。毛泽东指出：“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于是，中共中央责成总政治部、中央组织部对三支两军问题作了一些调查研究，并经中央军委办公会议讨论，代中央、中央军委起草了《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1972年8月21日，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及附件《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决定草案提出：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凡是实行军管的地方和单位，在党委建立后，军管即可撤销；已经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军宣队应立即撤回部队，各级支左领导机构（如支左领导小组、办公室、指挥部、联络站等）及其办事机构即应撤销；所有留在地方工作的军队干部，应一律由地方党委统一管理，其党的组织关系和人事档案，都要转到地方。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通知发出后，参加三支两军的官兵陆续撤回部队，需要留地方工作的军队人员，则就地转业。

总的来看，在“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各省、市、地、县的党政部

门均遭冲击,原有的党的领导系统和政权体系基本瘫痪,局势大有失控的危险,在这种严重形势下,军队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由军队代替地方的党政领导是必需的。毛泽东赋予军队“三支两军”的任务,其动因和出发点是要军队支持“造反派”全面夺权,确保“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但总是力图把“文化大革命”保持在可控范围之内。毛泽东这种指导思想的两重性,决定了“三支两军”功过兼有。此外,人民解放军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即使在执行“左”倾错误方针的情况下,出于阶级属性和对人民负责的本能,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限制错误的程度和规模,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这也是“三支两军”功过兼有的重要原因。

“三支两军”的指战员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做了大量工作,对于缓和紧张局面,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一些老干部、减少工农业生产 and 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整个指导思想错误,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三支两军”在特定历史情况下采取的非常措施,不可避免地受到“左”的指导思想的支配。另外,由于参加“三支两军”的指战员思想上缺乏必要的准备,对地方的历史情况不甚了解,缺乏地方工作的经验;特别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插手、干扰、破坏;参加“三支两军”工作中的个别人员素质不好,因而,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也产生了许多缺点错误,带来一些消极的后果。首先,“三支两军”支持造反派夺权,促进并保证了毛泽东“左”倾错误全面、彻底的贯彻,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后果。第二,在支左中军队内部也产生了严重的派性。支左部队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提出“支左不支派”的原则,并采取“一碗水端平”的态度,然而由于部队内部各支一派当靠山或支左人员分支两派,部队之间或部队内部出现了派性,致使地方两派对立加深,加剧和助长了某些地区“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同时,也损害了军队的团结和统一,破坏了军队建设。第三,以军队领导为主导的“三结合”的

革命委员会,把当时部队盛行的“四个第一”、“三八作风”、“突出政治”、“活学活用”等一整套“左”的东西带进地方工作中,助长了“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冲击了生产、科技和文教事业。第四,在“斗、批、改”中,“三支两军”人员由于没有明确的政策界限,制造了一批冤假错案,数以万计的干部群众遭到残酷打击。

“文化大革命”后期,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对消除“三支两军”造成的消极后果极为重视,军队和地方做了大量工作,在“三支两军”中犯有错误的同志,也主动进行了自我批评,认真吸取了教训。1981年3月,邓小平在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同志谈话时,对“三支两军”作了两句话的评论。邓小平讲:对“三支两军”,“只讲一句话不好,光戴高帽子不好,一定要讲两句话。第一句话:当时军队不出面不能维持局面,出面是正确的,‘三支两军’是起了积极作用的。第二句话:‘三支两军’给军队造成的危害是很大的,带来了许多坏的东西,对军队的威信损害很大。比如派性,还有一些‘左’的东西,相当大的成分是从那里来的”。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三支两军”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中,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后果。

1975年教育界的斗争

张 化

1975年，在工交、科技、军队等领域进行整顿时，教育部门的情况怎样？有过哪些斗争？本文将对此作一些考察和概括。

反击“右倾回潮”后教育界形势的恶化

对建国后十七年教育状况的不满，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1966年3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谈到：“学术界、教育界的问题，过去我们是蒙在鼓里的。”“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握的。”“现在，大学、中学、小学大部分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富出身的人垄断了。”“将来要搞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因此，向教育界发起冲击，进行“教育革命”，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

“教育革命”从打倒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教育界的领导权开始，进而全面否定了党在建国后经过曲折探索并取得明显成效的教育体制、方针、政策。1971年在张春桥、姚文元操纵下形成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了所谓“两个估计”，即：解放后十七年教育工作基本上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从这“两个估计”出发，一系列“教育革命”的政策得到了推行：“工人宣传队”长期领导学校；缩短大学学制；选拔工农兵上大

学、管大学、改造大学；对原有教师边改造、边使用，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实行开门办学等。这些政策的实行，严重破坏了正常的教学规划和教学管理，使教育水平大大下降。

然而，教育界的形势在1972年前后出现了一些变化。林彪叛国外逃事件发生后，周恩来领导各条战线开展了对极左思潮的批判，教育界的极左思潮受到了某些遏制。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发挥教师的业务专长；鼓励学生学习文化知识；加强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从高中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等问题又提了出来。1973年4月，国务院发出高等学校招生要“重视文化考查”的规定，改变了“文化大革命”以来招生不考试的办法。这些措施受到广大师生和渴求知识的青年的欢迎。

但是，这些变化在“四人帮”看来，却是“右倾回潮”、“复辟”。他们利用毛泽东关于批林整风的重点是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的指示，开始大批“右倾回潮”，使形势再度恶化。

反对考试制度，是“四人帮”在教育界“反右倾回潮”的重要内容。1973年6月，辽宁兴城发生了下乡知青张铁生^①考试交白卷，却在试卷背面写信发泄不满的事情。此事发生后，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毛远新称张铁生“是块有棱有角的石头，我要拿起这块石头打人了。”^②按照毛远新的旨意，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发表了张铁生的这封信。江青对这位考生大加吹捧，说：“真了不起，是个英雄，他敢反潮流”^③。姚文元说：“向这个

① 张铁生在1971年大学招生考试中，物理化学考卷得了零分。他在考卷背面写了一封信，申诉自己希望上大学的愿望。他批评招生通过文化考试的做法，抱怨“几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学考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

② 《一个反革命的政治骗局》，1976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

③ 《一个反革命的政治骗局》，1976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

‘交白卷’的先进青年学习。”^① 8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封信,并加编者按语说:“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各地报纸纷纷转载此文,攻击考试制度为“旧高考制度的复辟,是对教育革命的反动”。高校入学文化考试由此停止^②。与此同时,“四人帮”不断制造事端,对知识分子“毫不留情地揭露批判”。1973年7月,江青等人审查讴歌人民教师的影片《园丁之歌》时,说:“剧名就不合适,园丁应该是共产党,怎么是教员?”并针对“没有文化怎能担起革命重担”这句台词说:“这句话简直是反攻倒算”。在他们的指使下,报纸发表了批判文章,指责教师“都是坚持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③。同年12月,迟群、谢静宜发现一个小学生写了对教师不满的日记,便将其日记按照反“师道尊严”的需要加以整理,在《北京日报》刊出,并在编者按中说:“这个十二岁的小学生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远没有肃清,旧的传统观念还是很顽强的”,并在《人民日报》转载。两天后,国务院科教组和北京市科教组用突然袭击的办法,对清华、北大等17所高等院校的631名教授、副教授进行数理化考试。事后大肆宣扬把教授“考‘糊’了!”,“出了修正主义教育路

① 1976年11月28日《辽宁日报》。

② 除上述事件外,影响较大的还有:1973年7月,河南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一名女生在英语考试时,因交白卷受到校方批评后,投水自杀。江青得知后,派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迟群和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谢静宜对这件本已得到妥善处理的事件进行调查,称这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严重恶果”。同年11月21日,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遵照张春桥的旨意,发表上海师范大学工农兵学员刘丽华的一次谈话记录,反映大学里“有的人往往用考试和分数来卡我们”,“‘智育第一’的精神尚未彻底摧毁”。此后,以批判“智育第一”和“资产阶级习惯势力”为中心的讨论在上海的报刊上持续了3个多月。

③ 《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评湘剧〈园丁之歌〉》,1974年8月4日《人民日报》。

线的丑”，^①使“考教授”之“风”扩散到上海、天津等地。在这种宣传的影响下，一些学校提出了“学生打老师是打孔老二”、“砸玻璃是对师道尊严的惩罚”等口号，不少地方在学生中树立了反潮流人物，许多教师受到批判，教室的门窗、桌椅被砸坏。学校又出现了“干部管不了，教师教不了，学生学不了”的混乱局面。学生中流传着“学不学都升学，干不干都吃饭，会不会都插队”的说法。

在“反右倾回潮”的过程中，“开门办学”的做法得到进一步推广，辽宁朝阳农学院的经验被大加宣扬。“朝农经验”主要有三点：学生实行“社来社去”，即由人民公社选送学生，毕业后仍回农村当农民；废除从学科体系出发的教学方法，根据农业发展需要组织教学；办学方式实行“几上几下”，“上”，是在校学习，“下”，是回生产队参加生产实践。^②迟群提出：“大学就是大家来学”，“朝农是越办越大，越办越向下”。迟群和毛远新还提出“与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的口号，宣称“十七年的教育是对经济基础的破坏”，^③知识分子是“知识私有化，经营个体化，成果商品化”。^④

“四人帮”和迟群等人的作法受到了群众的抵制。1975年2月24日，沈阳机电学院自动化专业7名学员针对“当前有人歪曲‘工人毕业当工人’的口号，拼命反对社会主义文化课的学习”的倾向，贴出《我们决不单纯做普通劳动者》的大字报，提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大学生“必须学好文化科学知识”。毕业后回到生产岗位上时，虽然以普通劳动者的身分出现，但应该比普通工人的贡献更大，“而决不可以划等号”。两天后，该院铸造专业12名学员贴

① 《考教授有感》，《教育革命通讯》1974年第2期。

② 《一所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大学——辽宁农学院朝阳分院教育革命调查》，1973年11月28日《光明日报》。

③ 刘冰《风雨岁月——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忆实》，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1页。

④ 引自1975年7月24日周荣鑫与新华社记者谈话。

出另一张大字报,提出“我们就是要做普通劳动者,并且越纯越好!”毛远新抓住此事大做文章,在《辽宁日报》发表这两张大字报,组织全省大专院校展开对“大学生不能同普通劳动者划等号”和“知识私有”的批判。

辽宁的“经验”影响着全国。在“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的口号下,许多高校把“培养农民”、“培养工人”提作学校的培养目标,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受到进一步削弱,高等教育实际上被取消。知识分子统统被划入资产阶级范畴,批判的矛头从原先主要针对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扩大到建国后培养的知识分子。这时,学习文化知识,已经不光是所谓“红”与“专”的问题,而且成为“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表现;知识分子,也不仅因其“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和资产阶级的属性继续受到轻视,还因其与“资产阶级法权”的密切联系更加受到排斥。

围绕教育部部长人选的斗争

“四人帮”和毛远新在教育界的种种做法,引起了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的反对。1975年初,随着四届人大的召开,教育部得到了恢复,教育界出现了扭转局面的契机。

还在1970年7月,国务院成立科教组。日常工作由原8341部队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迟群主持。迟群同“四人帮”关系密切,是他们在教育界的一员干将。“1974年11月,江青曾经写信给毛泽东,推荐迟群当教育部长”。^①可是,由于迟群的所作所为引起干部群众不满,选四届人大代表时,科教组负责人李琦等人意见一致,^②

^① 刘冰《风雨岁月——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忆实》，第195页。

^② 李琦等人以中央提的要注意选年纪轻的、最好有女同志当选等原则为理由，选了一名女同志为四届人大代表。

迟群连四届人大代表也没当上。此事经谢静宜反映给毛泽东，在毛泽东的直接干预下，迟群才被补选为四届人大代表。四届人大结束时，恢复了教育部，国务院科教组从此撤消。

四届人大组阁时，围绕教育部部长的人选有过怎样的斗争呢？李琦回忆道：1975年的教育整顿首先体现在争夺领导权。四届人大召开前，“四人帮”想让迟群当教育部部长。周总理和叶剑英商量，在文化部可以让步，教育部不让！因为教育关系到争夺青年一代，决定由周荣鑫当教育部部长。毛主席划了圈。周荣鑫曾任浙江大学校长、国务院秘书长，懂教育，又是老干部，懂得党的政策。四届人大组阁时，周总理、叶帅能把周荣鑫推上教育部部长的位置，真不简单！当时“四人帮”的势力在教育领域盘根错节，把教育界搞得很乱。大家知道四届人大任命周荣鑫为教育部部长后，都很高兴，对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当时，教育部负责人主要是周荣鑫、周宏宝、我3个人。周宏宝是上海工人纠察队的，中央委员。“四人帮”把周宏宝派到教育部，是为了便于他们掌握情况。张春桥与周宏宝谈话以后，迟群离开了教育部。^①

不过，迟群虽然离开了教育部，但是并没有离开教育系统，依然主管清华大学。“四人帮”在教育系统的势力仍然很大。国务院由副总理张春桥分管教育，教育部的人员没有可能做大的调整。因此，直到1975年3月，周宏宝仍把教育部办公会议的情况上报迟群。1975年4月，国务院批转了《关于推广辽宁朝阳农学院经验和有关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朝农经验”被推广到全国。

迟群退回清华大学后，和谢静宜在校内千方百计地封锁邓小平关于整顿的一系列讲话，极力赞扬当时发表的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和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两篇

^① 1995年6月27日采访李琦。

文章,大力推广“朝农经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批判经验主义”、“打土围子”等“几乎成了他们的口头禅”。^①与此同时,正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又一个人物进一步加强了“四人帮”的力量。这就是毛泽东的侄子、中共辽宁省委书记兼沈阳军区政委毛远新。由于特殊的背景,毛远新受到毛泽东的器重,当上了毛泽东的联络员,成为最高领导层内上情下达的重要人物。从1973年下半年开始,毛远新在辽宁培植的“典型”不断地推向全国。辽宁教育革命的“经验”左右着教育界乃至全国的形势,使“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形成了南有上海,北有辽宁,遥相呼应的局面。无怪乎一年后在天安门广场出现的大量诗词里有这样两句:“追根求源,辽海两家”。

十分明显,虽然周荣鑫被任命为教育部部长,但是教育界的斗争更加激烈、尖锐了。

针锋相对的讲话

周荣鑫在1975年被任命为教育部部长,这是他第二次走上教育工作的领导岗位,也是他自“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被江青在万人大会上点名、打倒,下放“五七”干校后,又一次面临新的人生际遇。在教育部复杂的环境中,他先后举办了司、局级干部学习班,召开了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城市中小学教育座谈会,进行调查研究。教育界存在的大量问题,使这位老教育工作者深感震惊和痛心。面对严峻的形势和人生的沉浮,他抓住来之不易的历史机遇,以不怕被再次打倒的精神,毅然担负起扭转教育局面的重任。

此时,邓小平领导的整顿工作正在工交、军队和科技领域展开。邓小平在几次讲话中都提到了教育问题。9月15日,邓小平在

^① 刘冰《风雨岁月——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忆实》,第200—202页。

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提出要全面整顿的任务,其中,“文化教育也要整顿”是一个方面。9月26日,邓小平听取中国科学院负责同志汇报《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时又提到教育问题,说:“要后继有人,这是对教育部门提出的问题。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只是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科学院要把科技大学办好,选数理化好的高中毕业生入学……这不是复旧!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他提出:“科技人员是不是劳动者?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他还谈到:“要解决教师的地位问题。几百万教员,只是挨骂,怎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教育战线也要调动人的积极性。”^① 这些讲话推动着教育整顿的展开。

在周恩来、邓小平的领导下,周荣鑫针对被“四人帮”搞乱了的一些问题,发表了大量讲话,开始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澄清思想理论是非。

一、教育界的主要问题是极左思潮的影响。

这是周荣鑫首先指出的一点。他说,“文化大革命”以来,林彪的“最、最、最”影响很深,形而上学最厉害。一讲就是讲两个,一个是十七年,一个是七二年回潮,就是不讲林彪路线的干扰。现在有人总是把政治和经济、业务、技术割裂开。调子越来越高。口号越左喊得越凶。^②10月4日,当李琦谈到北京大学把生物系都改掉了时,周荣鑫说:现在有的人,就是文化可以取消,理论可以取消,基础可以取消,教师可以取消,学校也可以取消,什么都可以取消。文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页。

^② 1975年7月9日、7月23日、10月20日周荣鑫的讲话。

科不是以社会为工厂,而是以土地为工厂。劳动可以冲击政治,政治可以冲击教学,政治可以冲击一切。他还指出,这些年教育上的问题,不在教师,也不在学校领导,根子在教育部门的领导,在管教育的。^①

这些讲话的发表和传播,使教育界出现了与迟群、毛远新相对立的声音,打破了被“四人帮”严密把持的舆论阵地,对极左思潮的发展起了抑制作用。

二 知识分子是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

这是周荣鑫明确提出的观点。他指出,把知识分子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错误的。1975年5月7日,周荣鑫和理论教研组同志谈话时,说:现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知识分子问题更复杂化了。批“知识私有”,批“智育第一”,反正运动一来就批知识分子,批得什么也不是。把知识分子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错误的。他指名道姓地针对迟群说:现在到底是“知识私有”,还是不学文化?知识私有是不是资产阶级法权?有知识的是私有,没有知识的就公有?那不要学校好了!他明确回答:没有那么多的资产阶级法权,而且也不能完全取消,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有的还要保护。他还说:现在我们的技术力量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技术人员只占工人数的2%。都社来社去,教师队伍的来源就成问题。把当国家干部说成做官,是错误的。脱离了现阶段的需要和可能来谈教育,很危险。^②他还说:现在有个提法,要拆掉“读书做官”的梯子。这里有个界限问题。是不是工农兵学员上了大学就不能当技术员,不能当干部,只能回去当工人农民。只能从城市到农村,不能从农村来城市。这样成不成?在二十世纪内,我们要实

① 1975年10月4日周荣鑫在理科教育革命汇报会上的讲话。

② 1975年7月23日、8月9日、10月23日周荣鑫的讲话。

现四个现代化,产量提高,农业人口相对减少。县社也要办工业。一再强调社来社去,其他部门需要怎么办?好多问题带有方向性。不能什么口号都接受。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声浪中,周荣鑫这样讲表现了敏锐的历史眼光和极大的勇气。

谈到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必然涉及到“两个估计”。周荣鑫对此进行了反驳。他反问:“到底在上层建筑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怎么专法?专对了没有?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针对工农兵学员“上、管、改”大学的做法,他说:不要捧那么高,对他们只讲“改造者”这一面,而教师却是接受“再教育”,到底谁教谁?这是形而上学,片面性!^①他还说:“两个估计”实际上是一个估计,主要是知识分子政策不落实,认为十七年都是知识分子搞坏的。^②他强调,毛主席当时讲的五百万,是指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现在我国有二千五百万知识分子……大多数是爱国的、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③对知识分子的看法是个大政策,不是小政策。^④他认为,为谁服务,应以政治立场为标准,而不是以世界观为标准。这实际上是重申周恩来1956年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即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⑤这些认识触及到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触及到“文化大革命”发动必要性的问题。

这些讲话在教育工作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广大教师更有久旱逢甘露之感。在教育部的司局级干部学习班上,很快有人对周荣鑫的讲话作出回应,谈到:“在劳动者中也包括有‘脑力劳动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认为培养劳动者就是当农民。还说:那种认为大

① 1975年5月7日、7月24日周荣鑫的讲话。

② 1975年11月8日周荣鑫的讲话。

③ 1975年7月23日、10月23日周荣鑫的讲话。

④ 1975年7月24日周荣鑫的讲话。

⑤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2页。

学的培养目标是当农民、工人的提法,值得研究。理论联系实际,既要反对脱离实际,也不能搞实用主义,^①等等。

三、为什么不能提为革命读书?学校不培养人是要拖后腿的!

这是周荣鑫强调的又一个问题。针对“四人帮”把学习文化知识说成“智育第一”、“复旧”、“回潮”等,周荣鑫提出,十七年的主要问题是“三脱离”,而不是“智育第一”。^②他强调,毛主席批评的是“三脱离”,学生不会做工,不会种田,不会打仗,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违反了理论和实际统一的原则。毛主席从来没有讲过不要学文化。学校要以学为主,这是毛主席提出的。现在一谈学文化,有人就说是什么修正主义“回潮”啊,1972年的翻案风啊。^③把学文化说成是智育第一,是不对的。根据这个思想,《教育革命通讯》发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最大祸害——“三脱离”》一文,说:批判“三脱离”,“对划清两条教育路线的界限,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是很有必要的”。

在打消人们思想顾虑的同时,周荣鑫大讲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形势要求,鼓励人们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他说,现代化要搞上去,科学技术要走在前面,科技干部要靠学校培养。最后落脚要落到教育部门。不培养人是要拖后腿的啊!他还说:贫下中农为革命种田,工人为革命做工,学校为什么就不能提为革命读书?!世界科学技术进步很快,一定要看到形势逼人,差距很大。应该急起直追,迎头赶上。在周荣鑫领导下,1975年7月17日成立了国务院文教规划小组。到8月中旬,连续召开了11次座谈会。会议按照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重点研究了文化教育长远规划的方针、政策、综合平衡、奋斗目标和重大措施等问题,提出,要从指导思想人手,解决

① 1975年教育部半年工作总结时司局长学习班发言。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74页。

③ 1975年8月30日周荣鑫在4省市城市中小学教育座谈会上的讲话。

不少单位不敢提智育、不敢提文化等倾向。

在文化学习中,重视基础理论的学习,是在1972年周恩来就提出、周培源专门写文章作出阐述、后来又受到批判的问题。1975年,国务院的一些领导人再次提出了这一问题。7月11日,国务院副总理王震谈到教育时说:“农学院都学朝农,我不那么赞成”。^①9月26日,邓小平听取中国科学院负责同志汇报时,提出对理论有恢复名誉的问题。周荣鑫在教育部及时传达了这些精神。他说,对理论要恢复名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老批“基础”,批周培源的文章,把基础理论批臭了,基础理论搞不起来了。他表示:对“朝阳经验”,我有点怀疑。过去的一些做法不一定都错。只搞应用科学,不搞基础科学要吃大亏。^②在周荣鑫等人的努力下,教育部和报刊一度停止了宣传“朝农经验”。《教育革命通讯》从第8期起,连续发表文章,宣传要全面关怀青少年的成长,使他们又红又专,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并针对“以干代学”的偏向,批判杜威“从做中学”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③教育部编印了《周总理关于基础科学研究和理科教育革命的部分指示》和《毛主席关于自然科学的部分论述》,供内部学习。

起草《教育工作汇报提纲》,“这就是教育上的宪法”

随着思想整顿的开展,周荣鑫考虑在教育界进一步采取措施,改变现状。他与李琦在小范围内酝酿如何不再提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作出的“两个估计”。李琦回忆道:那时,我们对毛主席的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第475页。

② 1975年8月9日周荣鑫在钢铁学院汇报时的讲话。

③ 《按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搞好基础理论研究》,《教育革命通讯》1975年第9期。

思想崇拜还是有的，与“文革”发动时相比，不同的在于，脑子里积了一堆问题，都感到局面不能再维持下去了，要有变动。当时，周荣鑫和我商量，怎么不再提“两个估计”，怎么做才好？后来，考虑到“两个估计”是毛主席批示“同意”的，如要推翻，难度太大，才没有走这一步。^①

对于“两个估计”，虽然没有正式去触动，但在国务院讨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时，周荣鑫与李琦商量，要搞一个教育部向国务院的汇报提纲，以使今后的教育工作有所遵循。周荣鑫说：“教育战线问题成堆，不向中央领导汇报，这样下去很危险。”“这个提纲汇报后，送到主席那里，如能经中央批发下去，一系列工作也就可以跟上去了。”^② 鉴于教育部领导班子内部情况复杂，为防止走漏消息，受到干扰，汇报提纲是由周荣鑫和李琦亲自找人谈话，在半秘密的状态下，由当时《教育革命通讯》负责人方玄初执笔起草的。

《教育工作汇报提纲》一共有三稿。10月8日，第一次研究汇报提纲时，周荣鑫要求汇报提纲“要用小平同志的讲话来武装”，要头脑清醒，端正路线。汇报提纲要写存在问题，把对立面的典型言论拿出来，让人家一看就懂。“把尖端拿出来，不能掩盖”。他还说，要扣住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写，这样可以省好多文章。把《纪要》重新改动一下，改掉林彪的东西。“代中央拟个通知发下去，这就是教育上的宪法”。通知要写明“不许整老师”、“不能矛头向下”。第一稿写成后，针对性强，观点鲜明，语言也较尖锐。周荣鑫看后，要求在修改时针对偏差，正面讲清涉及面大、有普遍性的几个关系。并对起草者说：《纪要》里有对整顿教育有用的东西，还是讲了一些“文化学习”，我们可以引用这些内容，反驳错误观点，

① 1999年3月3日采访李琦。

② 1975年12月25日《国内动态清样》第262期。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第二稿,突出了教育要注意处理的几个关系,语气较前缓和。第二稿完成时,正值10月中旬李琦转送清华大学刘冰等人反映迟群问题的信件和《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上报之后。当时,周荣鑫对形势的估计比较乐观,说稿子稍微搁一下,看看形势发展再说。11月初,毛泽东批评刘冰等人反映迟群问题的信是针对他的,形势突变后,周荣鑫要求在第三稿中加写有关阶级斗争的内容。第三稿完稿时间是1975年11月10日。这一稿上,共有六个问题,虽然增加了阶级斗争的内容,但原稿的针对性和阐述的主要思想依然清晰可见,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痕迹。主要内容如下:

一、教育革命取得了很大成绩。在当时的情况下,提纲肯定从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以来的四年里,教育工作成绩是很大的。

二、新的形势重新把“十年树人”的历史任务提到我们面前。提出:我们面对着一个严峻的问题,要是教育上不去,就会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把教育整顿好。加快步伐,提高质量,培养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需要的接班人。

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进一步搞好教育革命。提出:要使教育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要正确处理几个关系:(一)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学校工作中有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就是排斥业务和不敢搞业务。林彪大搞“政治可以冲击其他”,实际上是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二)“以学为主”和“兼学别样”的关系。目前主要是有相当数量的学校没有坚持以学为主,劳动和各项活动搞得过多。不坚持以学为主,实际上是取消学校。要保证教学时间和质量,使学生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三)理论与实际的关系。要注意防止和纠正轻视理论、轻视读书的倾向。在实践的基础上着重向理论方

面提高。要重视基础理论教学。对基础理论不但不应当反对而且应当加强。(四)普及和提高的关系。这几年来我们对于提高有所忽视,同四个现代化对我们的要求矛盾很尖锐。如果再不重视,就将要犯很大的错误。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质量都应当进一步提高。有条件的高等学校应办研究班、进修班。那种认为大学培养各种专门人才就是“读书做官”,就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对基础科学、尖端科学和外语人才的培养,要研究出有力的措施。派遣留学生的水平要提高,还要增派科技进修生。此外,要划清“师道尊严”同正确教育和管理学生的界限,“管、卡、压”同执行正确的规章制度的界限。

四、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现在,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存在着“当教师倒霉”的思想。主要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没有很好贯彻落实。目前的教师队伍和1971年相比,有一些变化。许多人正将跨进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行列。要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建议在明年召开一次全国先进教员代表大会。

五、坚持两条腿走路,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指出一些面向全国和大区的高等院校下放地方领导后,有些院校长期处于“三不管”(省教育局管不了,中央有关部门管不上,省委事多管不过来)的状况。少数院校可考虑改为中央部门与地方双重领导,而以部门领导为主。教育部拟有重点地抓一些综合大学、多学科理工科大学、师范和外语院校,与地方实行双重领导。

六、整顿领导班子。目前,有相当一部分领导班子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软、懒、散”的情况,领导思想、领导作风不端正。凭“风”办事,看“风”不看线;只讲成绩,不讲缺点等。不少学校领导干部“怕”字当头,顾虑重重,跟不上形势的发展。有的则认为整顿是“回潮”,提出“要警惕纠偏风”。提出各级教育部门和高等院校领导,有

必要开展一次整风。重点是思想整顿。另外，建议各地党委加强教育战线领导班子的组织建设。要进行组织调整，对坚持资产阶级派性、屡教不改的，尽快调离；对混进来的坏人，坚决清除。

把《教育工作汇报提纲》与60年代初教育部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拟定的《高教六十条》等条例相对照，可以看出，二者在针对当时情况进行纠偏方面，基本点是一致的，提出的措施也大体相同。虽然《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引用了大量毛泽东语录，论述问题多用“一方面……另一方面”、“既……又……”的句式，但是倾向性很清楚，重点在纠“左”，体现了邓小平提出的教育整顿的思想。

就在《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形成的过程中，“教育革命大辩论”开始了，起草工作被迫中断。方玄初将“汇报提纲”的初稿和周荣鑫的修改稿藏了起来。等到“四人帮”得知此事时，“批邓”、批判“三株大毒草”^①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张春桥曾对此大为恼火，训斥周宏宝道：为什么不早报告？要不，就不是“三株大毒草”，而是“四株大毒草”了！^②

形 势 的 逆 转

周荣鑫等人在教育部着手整顿时，有关讲话虽然没有作为正式文件下发，却在教育界不胫而走，广为扩散。人们回忆说，那时“记录周部长讲话的白纸条满天飞”。不少人感到：“周荣鑫的这些

① 所谓“三株大毒草”，即《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草稿）》、《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草稿）》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根据邓小平关于以毛泽东三项指示为纲的多次讲话精神而撰写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一文草稿。

② 1999年3月8日采访方玄初。

观点很显然是同迟群、谢静宜尖锐对立的。”^①毛远新后来也说：“教育部长很多讲话是针对辽宁教育革命来的。”对张铁生的答卷、“朝农”经验、机电学院两张大字报，“人家都提出了相反的意见”。^②周荣鑫完全知道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会带来什么后果。他说：“我讲话有人攻啊！说是右倾机会主义。但我还要讲。”“我的有些话可能刺痛了那些好搞形而上学的人”，“要打倒，我也不怕。要做小平同志讲的那样不怕被打倒的人”。^③

在教育界形势开始好转的情况下，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4人于8月13日和10月13日先后给毛泽东写信，反映迟群、谢静宜的问题。后一封信经李琦、胡乔木递给邓小平转交毛泽东。但是，与此同时，“四人帮”也在毛泽东身边加紧了活动。他们通过毛远新向毛泽东作的汇报，动摇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任。9月至11月，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说：“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对文化革命怎么看？成绩是七还是错误是七，有分歧。刘少奇还要不要批了？”毛泽东逐渐改变了对邓小平的态度，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毛泽东指责刘冰等人写这两封信的动机不纯，是想打倒迟群、谢静宜，又说：“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而“小平偏袒刘冰”。这种武断的说法反映了毛泽东对不断深入的整顿产生的不满。

于是，11月3日至18日，清华大学党委召开会议批判刘冰等人的“翻案”言行。随后，教育部也公开点名批判周荣鑫及李琦，提出“打倒邓小平、周荣鑫、李琦”的口号。1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

① 刘冰《风雨岁月——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忆实》，第220页。

② 1975年12月1日毛远新在市地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第477页。

改》。文章说，教育界出现了“奇谈怪论”，“要把教育革命的方向‘扭’回去”。还说，“当前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坚持教育革命的方向，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为修正主义路线翻案，复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旧教育制度？”

不久，“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由教育界扩展到全国。周荣鑫和李琦被作为“右倾翻案风”在教育界的代表人物，受到追查和批判。在无休止的批斗中，周荣鑫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这位教育界的老共产党员，在扭转教育局面的斗争中走完了生命的最后旅程。

1975年周荣鑫等人扭转了教育局面的努力，虽然被“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所否定，但是，这场斗争为后来的历史发展奠定了基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教育界终于走上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轨道。

听刘少奇讲他第一次去俄国

温 济 泽

1948年11月7日，中央通知我们到西柏坡参加十月革命31周年紀念会。

当时我们在中央直接领导的新华总社工作，我是口头广播部（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编辑部）主任，住在韩家峪，离西柏坡约5里路。提早吃了晚饭出发，当时我正患有慢性肋膜炎，天天发一阵子低烧，这天急忙一口气走了这段路，体温又增高些。

自从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离开陕北战场，于1948年5月到达晋察冀边区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以来，我还是第一次到西柏坡。礼堂不大，只是一间空空的土房子。有100多人比我们先到了，又陆续来一些人。有些人靠墙而立，不少人紧挨着席地而坐。我站在主席台（一个土台子）对面的墙根，由于低烧，难于站着，就依墙根坐下。

毛泽东陪着刘少奇喜气洋洋、神采奕奕地走上主席台。全场一片热烈鼓掌。毛泽东说了几句庆祝十月革命节的话，就请刘少奇讲话。

刘少奇讲话没用稿子，讲得非常生动，十分热烈，激动人心。

事情已过去半个世纪，我的脑子里仍深深留有这样的点滴记忆。

刘少奇说：

……

我第一次去俄国，从海参崴到莫斯科，乘火车走了几个月，走一段路，停好些时间，那时候，燃料不足，要停下车来，找燃料，乘客要下车帮助搬运木柴，砍树木，烧木炭，在冰天雪地之中，乘客还要帮助找车推水。十月革命胜利的开初年代，白匪还在骚乱，物资严重缺乏，人民生活真困难呀！……

我第一次看到的纸卢布，头上印着醒目的几行字，是《共产党宣言》里最后的一句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第一行是俄文，下面是英文、德文，最后一行是汉文，译文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当时汉语中还没有“无产者”、“无产阶级”、“联合”这些词汇，这些词汇是后来逐渐从日文转译到我国来的。革命先要有长时间的思想理论准备，革命真是极为艰苦的呀！……

多少年后，我对这些话仍深有感触：不论俄罗斯，还是中国，还是别的国家，革命的创始总是非常困难的，革命的道路总是崎岖曲折的，革命后建设的事业总是十分复杂的，不会是一帆风顺的；重要的问题在于要能够不断地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及时认真纠正缺点和错误，以往鉴今，以史育人，稳步前进。俄罗斯人对他们自己的曲折历史能够清楚了解的人已经很少了；当代中国人对中国自己的曲折历史清楚了解的人也已经不多了。先烈恽代英说过：“我们的理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实现了，那时世界多么美妙。也许那时年轻人，不易领会我们走过的令人难以设想的崎岖道路……。”是啊！我们一定要把历史实事求是地传诸后代，以史为鉴，以史育人，这是老一代重大的历史责任啊！这是老一代义不容辞的、不能回避的历史责任啊！

西北革命的播火者——王懋廷

高哲中 薛生德

王懋廷，又名王德三，字正麟，1898年8月31日出生于云南祥云县王家庄半自耕农的家庭里。祖父和父辈都是以舌耕糊口、桃李满门的清贫之士。他弟兄3人，兄长王濡廷（又名王复生），弟弟王馨廷。纯正的耕读家风，孕育出三弟兄自幼勤劳正直、力求上进的品格。母亲常虑家大人多，用度艰难，在众妯娌中总是一力操持家务，即使因舂米致右手骨折，负痛多年，仍不肯闲息，终致身染肺疾早逝。王懋廷幼年多病，与母亲相处日久，受母亲自强不息、克己持家的性格的影响尤深，对母亲充满敬爱。接受革命思想后，他把对母亲的“孝”扩大为解放所有母亲的“忠”，他的信念就是“能够解放旧社会的母亲，就可以安慰思念已死母亲的感情”。

王复生于1917年赴北京就读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在李大钊的培育下，研究马克思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加入党的组织。王懋廷时读中学，经常收到兄长关心祖国命运的革命的信件，引发了他追求进步和革命的思想。在中学读书时的王懋廷就因为维护正义，带头痛打了欺压群众的军阀巡警，闹出很大风波，以致无法在校容身，于1919年春也去北京大学补学。不久，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王懋廷投入革命洪流，经受了新文化新思想的洗礼。1921年他考入了北大理预科，参加了由李大钊领导，邓中夏、罗章龙、王复生等19人成立的“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担任法文翻译。他一边研究马克思主义，一边走出校园

到劳工群众中去。他先后与王复生、王有德(也是云南人,当时北大称他们三人为“云南三王”)裹粮步行,多次到北京郊区门头沟煤矿等地调查,并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人的工作。革命实践的锻炼和考验,使王懋廷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22年经邓中夏介绍,在北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为中共北大支部书记的罗章龙曾回忆说:王懋廷“是北大支部很活跃的积极分子”。

王懋廷去北京的次年,三弟王馨廷也去北京求学。王家境清寒,为解决3人求学的经济困难,同时带着发展党组织的使命,1922年王复生先在北大休学去陕西华县咸林中学任教,以其所得资助两个弟弟上学。1年后,王复生回到北大复学,王懋廷接踵到咸林中学任教,为减轻长兄负担,王懋廷还将因参加学运被军阀追捕殴打成疾的三弟王馨廷(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带在身边养病,后又带到陕北,王馨廷终因病重吐血月余病故绥德。

王懋廷来陕北,是李子洲从李大钊和王复生那里请来的。

李子洲,又名李登瀛,陕西绥德县人,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参加了李大钊领导的革命运动,是五四爱国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也是陕西籍学生在京成立的政治性社团组织“共进社”的重要领导。1923年初由李大钊和刘天章介绍在北大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夏毕业,李大钊派他回陕西开辟革命工作。李子洲先到三原渭北中学任训育主任兼国文教员,1924年春应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聘请任该校教务主任兼国文教员。7月,接任了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四师,即今绥德师范前身)校长。

李子洲决心办一所革命学校,创建陕北革命的基地。首要之举就是广为延聘一批进步教师,作为改革旧教育,培养革命人才的依靠力量。开学前,李子洲专程去北大找到当年同窗好友王复生拜访李大钊。在李大钊支持下,《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四师聘教启事。

王懋廷即由李大钊和王复生商定由咸林中学到四师任教,协助李子洲开展革命工作。李大钊还决定李子洲和王懋廷同为北京党组织直属特别通讯员,任务是在陕北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因其时陕西还未建立党的组织,决定李、王与北京党组织直接往来,定下秘密通信方法及地址。

1924年秋开学前,王懋廷带着弟弟王馨廷来到了陕北绥德第四师范。当时统治陕北23县的是土皇帝井岳秀,他和地主劣绅沆瀣一气,残酷压迫盘剥劳动人民。在他的淫威下人民没有任何民主自由可言。在井岳秀的虎视之下,李子洲不得不与上层多方周旋,与当地上层人士、驻绥德团长石谦拉关系,甚至通过杜斌丞与井岳秀接触,以尽力维持学校的稳定,而自己则不能较多和公开直接参与校内的革命和建党活动。除了总的领导和重大问题的决策外,具体的组织活动就交给了王懋廷。

王懋廷是一个出色的革命活动家。1923年在咸林中学就显示了他的组织才能。在其兄王复生组织的咸中“青年励志团”的基础上,加以巩固发展使之成为日后陕西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之一。到四师后,这位20多岁的国文教师,教学认真,为人热诚,口才极好,很受学生欢迎。几十年后很多学生仍称赞说:王懋廷是同学们最敬爱的老师。他于课堂课外,结合教学宣讲马克思主义,组织学生阅读进步书刊,辅导学生自习,常与学生谈心,了解家庭状况、求学目的和思想行为,从中物色党团员发展对象,吸收“真实努力的分子”入党入团。

英文教师田伯英1924年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经魏野畴介绍来四师任教,负责在陕北发展共进社的任务。王懋廷与田伯英同住一个宿舍,他支持田发展共进社的工作,却不以其共进社的活动为满足,经常向田讲解共产党的性质;并给田介绍阅读《共产党宣言》等革命书刊。不久,田伯英认识提高,写了申请入党的信,王懋廷报北

京党组织,1924年10月间得到回信,批准田伯英入党,并指示要在陕北成立党的组织。

王懋廷和田伯英在共进社员中和其他方面积极发展党员,1924年11月四师成立共产党小组,组长由课程较少的田伯英担任。王懋廷又在学生中发展青年团员,于12月上旬成立青年团支部。到年底,王懋廷把发展党、团工作扩大到校外,在放寒假回家的绥德籍榆林中学学生中,在井岳秀驻军石谦团中,秘密发展党、团员。王懋廷宣传新思想成效极大,学生们倾向革命,都以加入党、团组织为荣。1924年12月29日王懋廷在向邓中夏的报告中说,他到四师“不到半年天气,我们的主义在学生中已经种下极深的根苗了,……假如我们要,则全部学生都可以加入我们”。

1924年底,王懋廷在学生中发展到14名团员,准备成立地方团——团地方执行委员会,还计划与关中地区的华县团组织成立陕北和关中统一性的领导组织“区部”,要报上级准许。其时因北京团组织内部有人叛变暴露,被团中央宣布解散,王懋廷便直接给在上海团中央任组织部长的曾是自己入党的介绍人邓中夏写信。邓复信认为团员人数较少成立团地委不够条件,可成立特别支部。寒假中王懋廷在榆林和佳县又发展团员扩大组织,在此基础上,1925年2月召开团员大会,成立起共青团陕北特别支部,领导陕北各县共青团的发展工作,会上王懋廷被公推为陕北特支书记。团组织也就由此在一段时间直接与团中央发生关系。

1925年1月,中共四大通过《关于组织问题议决案》,指出组织问题是当前党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要求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努力扩大党员的数量,以适应日益发展的革命形势。这年春,四师成立党支部,夏季又成立起党的特别支部,王懋廷担任支部和特支干事会的宣传。在驻瓦窑堡的石谦团(石谦团部1925年由绥德换驻瓦窑堡)中,由王懋廷介绍入团旋即转党的该团第三连连长

李象九成立起党和团的支部，王懋廷还到榆林帮助他介绍入党的榆中学生张肇勤和李登霄成立起党和团的支部。党员也迅速增加，四师发展有 20 多名，榆中和李象九连发展了 10 多名，陕北 1925 年有 40 多名党员，其中有 7 人是王懋廷介绍入党，许多人则是王懋廷介绍入团后转为党员的。这一批党员，有建国前牺牲的革命烈士白明善、乔国桢、刘志丹、王兆卿、高光祖等；有建国后在党和政府部门担任重要职务的马明方、郭洪涛、霍维德、阎红彦、武开章、雷恩钧等。同时，共青团员发展到 70 多名。陕北党、团组织的迅速发展和党团员教员的扩大，是形成陕北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领导核心和骨干力量。

王懋廷在积极发展党团员的同时，还认识到了到民间去、搞平民运动的重要性。这是王懋廷在北京大学时从李大钊那里得来的革命要领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启示。他说：“苏俄革命的功劳，我们不能不提及到民间去的志士。”在中国，在陕北，就只有到农民中去，首先发动和组织农民，无产阶级革命才有希望。他在《内地农民的组织问题》一文中写道：“我们固然承认农民的力量散漫，不如工人的急进，但在产业落后的国家中，要是农民没有相当的组织及生活的提高，则无产阶级革命是不会成功的。”

在李子洲领导下，王懋廷首先在四师校内成立学生会、青年协会、文娱演出会等，对外成立了平民学校，“做主义上的平民运动”，进而开展农民运动。

1925 年，绥德城内爆发了反“骡柜”的斗争。这是王懋廷领导学生与农民结合进行的一次卓有成效的反封建军阀的革命运动。绥德农民养毛驴驮贩挣钱度日，军衙却在城内设了名为“骡柜”的店栈，“骡柜”雇有差役，趁农民赶牲口进城驮贩时将牲口强行拉去支应驻军或衙门乘骑和驮运货物，有时拉去行至各县甚至数百里路远的延安，往返 20 多天不给分文。脚户进城又必须住宿“骡柜”

店栈,付出昂贵的食宿费。两头盘剥,农民脚户苦不堪言。王懋廷即以“骡柜”欺压农民的事实,组织学生上街讲演揭露,脚户听讲后很是动情,有的就请求学生与“骡柜”交涉要驴。王懋廷便以学生会名义派出学生联络起数十名脚户成立起“脚户自保会”,不久发展到 100 多名脚户,由四师学生带头,痛打了几次抢拉牲口的差役,捣毁了“骡柜”,自保会还组织脚户们“罢市”,取消了“骡柜”。

反“骡柜”斗争的胜利,使四师的名声大振,被人视为陕北的“上海大学”,学生们吃得开了,连当兵的也怕起学生来。老百姓称赞说:“若要强,背钢枪,强上强,住学堂”。王懋廷又一鼓作气将各中小学的学生联合起来成立了陕北学生联合会,并由榆中党、团员学生主持出版《塞声》半月刊进行宣传。在绥德城将各匠工、理发工、织袜工联合起来成立起手工业工会,还亲自去榆林帮助成立榆林工会。每逢节假日则派学生回到本县本村做社会调查,宣传讲演,有的还在自己的村、区成立起农民协会。

1924 年 10 月,冯玉祥在北京倒戈,孙中山应邀自广州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沿途宣传召开国民会议。中共中央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主张,通告各地党组织全力促成国民会议的召开。李子洲和王懋廷于 12 月 12 日前即在绥德成立陕北国民会议促成会,提出“废督裁兵”、“取消国际间一切不平等条约”、“男女平权”、“规定劳工保护法”、“收回教育权”等口号。寒假中组织四师和榆中两校学生回到本县进行宣传,散发传单 8000 多张,有 10 多个县成立了分会。孙中山逝世后,绥德召开了 1500 多人的群众大会隆重悼念,王懋廷在大会上第一次公开宣传了共产主义,事后,他向邓中夏报告说:“民众不独无反感,且极热烈”。四师学生会还利用五一、五四、五五、五七 4 个纪念日,组织了 5 个讲演队到各县讲演,唤起国民革命。陕北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活动,是王懋廷和党组织在陕北最初开展的一次较大规模的革命宣传运动,对唤醒民众的政治觉悟和

推动陕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起了巨大作用。

当时,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在地方没有基层组织。国共合作后,中共中央指示各地组织帮助国民党建立地方基层组织,王懋廷亲自到榆中建立国民党榆林临时县党部,党部党事都由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主持,按照中央要求,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都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组织,并利用国民党员的公开身分进行革命运动和共产党的活动。1925年9月西安成立国民党陕西临时省党部时,全省只有4个临时县党部,其中3县即属陕北的绥德、榆林、佳县。

在英、日帝国主义惨杀上海工人的五卅惨案噩耗传来后,陕北党组织立即组织学生、农民、工人、市民声援。王懋廷从绥德、米脂到榆林逐一组织起“陕北各界对英日惨杀同胞雪耻会”、“各界救国办事处”,并筹组“国民救国军”以作国民武力的后盾。6月25日绥德、榆林同时停业半日,下半旗,举行游行示威,学生散发传单,沿门募捐援助上海同胞。绥德全城民众倾家走上大街小巷,高呼“打倒外国强盗”、“收回英日租界”、“反对基督教”、“团结全国农工”等口号。绥德铺户稀少,居民贫苦,但一听说上海工人苦状,尚慷慨捐助,共捐出300余块银元,连同其他各县,陕北共捐集3000多元汇寄上海总工会。王懋廷还派出一批学生到清涧等县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宣传。这次运动使陕北的反帝反封建军阀的大革命形成高潮,运动一直持续到10月底。为此,1926年6月25日共青团北方区委向第三次扩大会的总报告中说,北方地区,北京、山西及太原、陕北学联活动“较为有力”,赞扬陕北学生运动,称那里的“党比较健全,而且是该处的教职员,因此可以领着学生前进。”

1925年8月,王懋廷离开陕北调回北京,其兄王复生受党派遣来陕北,与李子洲一起继续领导和发展走向高潮的陕北大革命。王复生在寒假中回北京,后又南下广州、昆明参加国民革命,1928年根据中央指示北上东北。九一八事变后积极进行抗日活动,1936

年8月15日在齐齐哈尔被日伪抓捕,牺牲时年仅40岁。

王懋廷离开绥德回北京后,担任了共青团北京区委委员兼经济斗争委员会书记,后又到上海。他心系陕北,情注四师,不断写信给团中央,建议加强那里的领导。1926年初他从北京到上海,得知1925年冬榆林中学发生了反动教员勾结军阀开除了10多名因要求参加校政的党、团员和进步学生的事件,便与当时在上海大学学习的原四师党员白明善、杜嗣尧等一起开会讨论提出解决事件的对策和整顿发展陕北各地组织以及派人去加强领导等6条意见,报告给曾在团中央工作的林育南。

1926年王懋廷被调到广州黄埔军校任政治部宣传科长兼政治教官,半年后党又派他回云南开辟革命工作。1928年王懋廷作为代表赴莫斯科参加了党的六大,回国后即担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在他回到云南的3年多中,先后建立党的特委和省委,在各县成立农民协会、云南妇女解放协会、学生联合会和昆明总工会,在滇越铁路和个旧矿山开展工人运动,在蒙自查尼皮等地建立游击队,并组织了陆良等地的武装暴动。当不少共产党员遭军阀抓捕杀害时,王懋廷面对一座座遇难同志的坟墓发出誓言:“拚着这傲逆的骨头,粉碎束缚着人的锁链,……一定要让镰刀斧头的红旗,飘扬在你们的冢头,英特耐雄纳尔的歌声,荡漾于你们的四周。”后因叛徒出卖,王懋廷被捕入狱,在敌人的酷刑面前,他铁骨铮铮,视死如归。在狱中留给老父的遗书中,王懋廷写道:“儿自信不〔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父亲、对不起人类的事情。儿已处此境地,如果苟生偷活,那就要做出些无廉耻的事情,那时你儿子又有什么脸在人世上?天下人听见云南,就要骂王懋廷是个无廉耻的人。”

1930年12月31日,年仅32岁的王懋廷在昆明英勇就义。

赵世炎是中共一大前党员

鲜于浩

编者按：1985年5月23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在《关于重新确定周恩来同志入党时间的报告》中认为：在巴黎成立的共产党小组的5人（张中府、刘清扬、周恩来、赵世炎、陈公培）同属于1921年入党的第一批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们入党时间从参加共产主义小组时算起。本期刊登的这篇文章，对赵世炎的入党时间另做了一番新的考证。

赵世炎是不是中共一大前的党员，在中共党史研究中仍存有较大分歧。持肯定观点者，多依据张申府的回忆，但无有力的论证；持否定看法者，以《中共一大以前的党员名单初探》为代表，认为张申府关于赵世炎入党的回忆“是不准确的”，未将赵列入中共一大前的党员名单^①。我认为第二个看法值得商榷，而张申府的回忆又当予以论证。

据我多年对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研究，我以为，赵世炎应于1920年4、5月间在上海经由陈独秀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张申府两次回忆称：“上海又去了两个党员：赵世炎、陈公培。他们两人是上海入党的，都是陈独秀介绍去的”。“赵世炎到了法

^① 此文中列入《旅欧的党员名单》的有张申府、陈公培、刘清扬3人，见《党史资料》1981年第11期。

国,他是在上海由陈独秀介绍入党的。接着陈公培也到法国来了,他也是在国内由陈独秀介绍入党的。”^①

陈公培回忆,被驱逐回国后,“我负责介绍李立三、蔡和森二同志于党组织。”1922年,他又在海南岛“发展了十来个同志”。但是在他的回忆中,没有提到他是赵世炎的人党介绍人。^②

需要强调的是,张申府、陈公培均负有在法国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的使命,他们赴法的时间均晚于赵世炎。

既然早期旅欧的中共党员均不是赵世炎的人党介绍人,那么赵世炎的人党介绍人只可能在国内,人党的时间只可能在他动身赴法勤工俭学之前。从赵世炎出国前的活动、行程考察,他只可能在上海由陈独秀介绍入党。

赵世炎是1920年5月9日乘法国邮船“阿尔芒勃西”号离开上海的。在此之前,赵世炎先后在北京高师附中和北京法文专修馆学习,主办过《工读》半月刊等杂志。1920年4月1日,《工读》杂志被北京警察当局查禁,“该杂志编辑赵世炎、经理周梦雄于二日晚在西城寓所被警察捕去”,但随即被释放。4月8日,赵世炎即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发表了致张东荪、宗白华的信,对北京警察当局“大施虎威”表示强烈的愤慨。从信中“前日一个《工读》半月刊查禁”等语,可以推断该信系赵世炎于4月3日在北京写的。按照常理,“本拟不日离京赴法求学”的赵世炎获释之后,应当到上海办理出国手续;又杂志被封,更无继续呆在北京的必要。^③5月4日,赵世炎等人致函华法教育会上海分会,叙说他们已经订妥船票,验讫

^① 《张申府关于建党前后情况的回忆》、《张申府谈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共产主义小组》(下),第916、920页。

^② 陈公培:《回忆党的发起组和赴法勤工俭学等情况》,《共产主义小组》(下),第954页。

^③ 张允侯等编:《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第二册,第412—413页。

所携之款，填写了入会志愿书，声明“到法国以后，还望会中的指导与援助。”^① 从前述赵世炎在1920年4月和5月的行踪判断，赵世炎在上海逗留时间少则一个星期，多则可能20余天。在此期间，陈独秀也在上海，正忙于筹建中国共产党，虽然很多回忆均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于1920年5月，其最初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并无赵世炎，但并不能排除赵世炎5月上旬甚至4月中下旬与陈独秀有过私下接触。此外，从赵世炎在北京时有函致上海《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的情况分析，赵世炎亦有可能通过张而接触陈独秀，因为张也曾参加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最初几次活动。

1920年初夏，赵世炎到过的并且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的城市只有上海。张申府在1920年9月和10月两次到过上海，均住在上海渔阳里2号陈独秀家中，并且“同陈独秀谈过建党的事”。^② 张申府这两次在上海与陈独秀晤谈的时间，均在赵世炎赴法勤工俭学之后，因此，张申府回忆中关于赵世炎是由陈独秀介绍入党一事，可能是陈独秀本人告诉张申府的。

需要指出的是，张申府同赵世炎在北京时有可能相识。他们二人均于1919年7月以后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属较早参加该会的北京会员。张申府曾任《少年中国》的编辑，后又与李达、陈独秀等人支持北京工读互助团。少年中国学会1919年7月1日成立大会至1920年3月13日前后召开的常会，参加者均为北京会员，赵世炎、张申府在这些会议上有可能谋面。赵世炎发起成立的少年学会及其主办的《少年》、《工读》杂志在北京青年和知识界中颇有影响，特别是《工读》被警察当局查禁一事在京城内外反映强烈，张申府也不可能不知道。

① 张允侯等编：《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第二册，第412—413页。

② 《张申府谈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共产主义小组》（下），第919页。

1920年底,张申府与蔡元培等人同船抵达法国。张申府曾回忆,他们几个在法国的党员“成立了小组,没有正式名称。成立后报告了陈独秀。”^① 这表明,张申府与赵世炎、陈公培已经取得联系。不过,他们这几位党员的主要活动,如在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筹建具有共产主义思想倾向的团体,进行组织宣传工作等,多由赵世炎出头露面。

^① 《张申府谈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共产主义小组》(下),第920页。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鲜为人知的外文刊物

程 慎 元

党的外文刊物是党向国际社会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回顾一下党在各个历史时期所创办的外文刊物,对我们研究党的历史,总结斗争经验,指导今后工作,都是很有意义的。现将笔者几年来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情况介绍如下。

一、上海英文版《中国工人通信》

上海英文版《中国工人通信》,是中国共产党在严重白色恐怖下创办的英文打字通信稿,大约创办于1931年4月。国内未发现存件。据日本《无产阶级科学资料》记载,《中国工人通信》的第7号发出时间是1931年5月12日,107号是1931年9月29日。1931年9月13日至9月26日出了5期《特别号》。日本《无产阶级科学》、《无产阶级科学研究》和《无产阶级科学资料》上记载的《中国工人通信》稿,共计174期。据有关同志回忆,该通信从采编、撰稿到打字油印,都是在夜间进行,非常快捷,一般是3天发一期,工作人员直接按中宣部提供的国际通讯地址,向共产国际及其所属各国共产党的机关报、进步的外国报刊寄出。从事过这项工作的有朱

伯琛^①、朱镜我^②、潘企之^③等。从日文刊物上记载的 174 期《中国工人通信》稿看，它主要向国外报道了以下内容：（一）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及革命团体的宣言和文告，如中共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满洲的宣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土地法大纲，左翼作家联盟抗议白色恐怖宣言及《中国工人通信》向日本工人农民群众发出的通电等；（二）关于苏区和红军的报道。《通信》第 52 号，报道了平汉路红军的发展壮大，65 号报道了鄂豫皖苏区红军概况，98 号报道了鄂豫皖苏区政权建设以及湘鄂西苏区群众斗争等；（三）关于白区群众斗争的报道，其中 67 号、93 号、103 号、108 号连续报道了上海 1931 年 4—8 月的群众斗争，统计资料极为丰富、具体；（四）揭露帝国主义、国民党、各国反动资本家镇压和屠杀罢工工人的情况，如第 77 号、78 号、83 号、85 号，连续报道了这方面的情况。83 号还单独报道了国民党捕杀中共总书记向忠发的消息，85 号报道了苏区红军粉碎国民党第三次“围剿”的消息。据日本学者北田定男先生向笔者提供的《工农通讯集》复印件证实，英文《中国工人通信》，是中国共产党向全世界进行“宣传”、“鼓动”的重要通信报道刊物。

二、上海中英文对照版《中国论坛》

上海中英文对照版《中国论坛》创刊于 1932 年 1 月，它是由

① 朱伯琛，生卒不详。周南女校校长朱剑凡之子，王稼祥妻弟。据他自己写的材料称，他 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在国家安全部工作。

② 朱镜我（1901—1941）浙江鄞县人，1928 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 年任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党团书记，后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和中央文委书记，1931 年调中央宣传部工作，1934 年任中共上海中央局宣传部长，1941 年皖南事变中牺牲。

③ 潘企之，生卒不详。南京中央大学经济系毕业，解放后任山东大学校长，“文化大革命”中写有《我在工农通信社的工作》一文。

“曾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美国青年”伊萨克担任主笔公开发行的。该刊初为英文版，后改为16开中英文对照版。《中国论坛》曾发表过大量关于红军和苏区建设的报道。如1933年“五月特刊”发表了史沫特莱的《国民党五年来的反动统治》（该文以伊萨克的名义发表），1933年5月出版的第二卷第9期，发表了“成都蜀笑”写的通讯，报道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张琴秋率领500名红军女战士生俘川军一个团的英雄事迹。1933年9月“九一八特刊”发表了《中日妥协原则》，揭露和批判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行径和镇压抗日群众的罪行。该刊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公开出版发行，对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斗争和苏区红军的反围剿，起了积极的作用，受到了国外读者的普遍欢迎。该刊曾发行到3000多份，在北平、上海、浙江、福建以及纽约、洛杉矶等国内外读者中很有影响，他们还自发成立了《中国论坛》读者联谊会，发起支援中国工农红军的募捐运动。1934年2月14日，朱德曾以红军总司令的名义在《中国论坛》上发表致敬电，感谢国内外读者联谊会对中国工农红军的资助和声援。该刊1935年停刊。

三、重庆英文版《中国重讯》

重庆英文版《中国通讯》创刊于1939年，小32开，铅印。它是由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的新华新闻委员会编辑出版的，发行对象主要是抗日战争期间在重庆的国际友人和外国记者。从1939年到1940年，共发行16期，发表文章50余篇，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共中央有关抗战的文献，如1939年7月的《中共中央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1939年9—11月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决议和电报》，1939年10月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党的任务决议案》，1940年2月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等等。

其次是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王明、博古、董必武、彭德怀、叶剑英等的重要讲话和报告。第三是各根据地斗争概况，如《陕甘宁边区年度报告》、《晋冀豫边区 1937 年—1939 年度报告》等。第四是对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揭露与批判，如《平江事件》等等。该刊在抗日大后方的出版，对当时在重庆的国外记者、国际友人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事迹起到了很大作用。目前，国际上有关中国抗日战争的研究著作中还有不少引用该《通讯》者。

该刊在中央档案馆、北京图书馆都没有发现存件，只有爱泼斯坦家中还保存有其中的第 9、11、12、13、16 等 5 期。据爱泼斯坦回忆，为了保存这些英文本的《中国通讯》，日本投降后他撤离重庆时，特意把它们从重庆送回了美国家中保存，新中国成立后，才又把它们带回了中国。

四、香港英文版《新闻通讯》

香港英文版《新闻通讯》创办于 1939 年，是在中共香港办事处领导人廖承志直接协助下创办的宋庆龄保卫中国同盟机关刊。从 1939 年 4 月到 1941 年 11 月，共出版 36 期，刊登各种英文稿件 150 余篇，其中大多数是在中国帮助抗战的外国朋友撰写的，如爱泼斯坦、马海德、白求恩、路易·埃文斯、卡尔逊·杰姆斯、贝兰特、希尔达·克拉克夫人等，都是它的积极撰稿人和热心赞助者。第 11 期刊登了白求恩在河北游击区的工作报告，第 20 期刊登了马海德在华北前线的来信，第 25 期刊登了卡尔逊生活在抗日战士中间的特写，第 32 期刊登了贝兰特目睹日军在华北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报道。这些文章，报道了八路军、新四军在西北战场上英勇杀敌的事迹，报道了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成就，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

略中国的罪行。它对向国际社会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攻击中国共产党游而不击、制造事端等谎言起了积极作用。宋庆龄还通过《通讯》向全世界发出呼吁，援助中国西北和华北战场上流血奋战、急需援助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该《通讯》已由宋庆龄基金会译为中文出版。

五、延安出版的英、俄、法文版《中国报导》

延安英、俄、法文版《中国报导》创刊于1941年3月18日，由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领导的国际宣传委员会编辑出版。撰稿人有马海德、巴苏华、黄正光、肖兰等。当时定的原则是，谁会什么语言，就用什么语写稿件。1941年3月18日的创刊号是用英、俄、法三种文字编写而成的，由季宗权用蜡纸刻版，并负责油印出版。陈庶从美国回到延安后，由他负责编辑工作。在创刊号上，马海德用英文写了代社论“中国破裂了吗？”，吴文涛以温·特尔的译名译写了皖南事变经过及中共中央处理皖南事变的方针。黄正光是越南人，懂得法文，就用法文写稿子。肖三刚从苏联回到延安，住在文化沟，张闻天就让他用俄文写稿子。该刊第2期以后改为英文版，每月1期，到1941年底共出版了10期。《中国报导》后因编辑陈庶调到博古主办的《解放日报》而停刊。据当时在延安的记者王维真回忆，该刊的文章曾在重庆、香港、马尼拉翻印刊出过。廖承志在香港办的《华商报》也曾转载过该刊的消息。该刊对国统区以及东南亚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及其所起的作用，进行了积极的宣传工作。

六、烟台英文版《芝罘新闻》

烟台英文版《芝罘新闻》是解放战争时期我党在解放区出版的唯一一份英文刊物，创刊于1947年3月，由山东根据地烟台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宣传科创办。该刊的稿件除少量是对住烟台侨民的采访稿以外，大部分是根据新华社的电讯稿翻译的。发行对象主要是烟台的外国侨民、联合国救济总署的工作人员和美蒋为准备发动内战而抢运到烟台的美军士兵。《芝罘新闻》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结束后的和平主张，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及保护烟台各界侨民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烟台外侨和外籍人员的情绪，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帮助国民党进行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后因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工作人员转入农村，《芝罘新闻》被迫停刊。

赫鲁晓夫眼中的毛泽东

——俄文版《赫鲁晓夫回忆录》选译(一)

马 贵 凡 译

译者按：赫鲁晓夫于1964年被赶下台，1967—1971年口述了他的回忆录，由于当时苏联政治气候的限制，未能在国内发表。赫鲁晓夫去世后，美国利特尔—布朗出版公司于1974年首先出版了英文版《赫鲁晓夫回忆录》。赫鲁晓夫之子谢尔盖·赫鲁晓夫认为英文版选编的内容不完整，对其父亲的思想有歪曲，遂根据他保存的3000多页录音手抄稿和录音磁带选编了俄文版《赫鲁晓夫回忆录》，并从1990年起在《历史问题》杂志上连载，持续4年之久，1997年该回忆录在莫斯科正式出版。俄文版与英文版比较，内容基本相同，但编排顺序有别，对一些事件和问题的说法也不尽一致。为便于我国史学工作者进行比较和研究，现将俄文版《赫鲁晓夫回忆录》中有关中国的部分选译如下。应该指出的是，赫鲁晓夫谈中国问题时有自己的立场和角度，他对一些问题的说法并不客观，明显带有片面性，或极力粉饰自己，或为自己的错误作辩解，或对中国领导人的思想进行歪曲和诬蔑，望读者注意鉴别。文中重复的部分，译者略作删节。本文译自俄国《历史问题》杂志1992年第11—12期，大标题为译者所加，小标题为原文所有。

毛 泽 东

如今在中国，毛的学说定会取得彻底的胜利，而在40年代中期，有人却宣称这是不可能的，说中国共产党人取得不了胜利。中国开展“文化革命”时，有人也作出这样的断言，但我说：“这是胡说八道！”他们肯定能取得胜利。因为他们有强大的军队，他们那里没有什么道德可言，不承认任何法律。若是你不顺从，那就要掉脑袋。而且他们干得很巧妙。在一个广场上集合几千人，当众将持不同政见者绞死。这是什么行为？是政治？甚至也不能说是政治。这是野蛮的政治。是某种难以捉摸的行为。但是，这是实际情况。没办法，那里就是这种生活条件。

刘少奇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不投降，他不同意毛泽东的政策，并设法同毛作斗争。当时他有许多拥护者，但这些人没有实力，所以刘少奇的存在，不是因为他有那些不向毛泽东出卖他的拥护者，不是的，毛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把刘置于死地。但这样做会引起很了解刘的民众的公愤。毛明白这一点，所以他现在反对刘，不是把他作为个人而是作为某种政治思想体系的代表。毛想从政治上把他孤立起来。

毛的个人崇拜也是个复杂现象。我们过去和现在都遇到过崇拜，不只是在中国。很多世纪以来，人们总是在祈祷：“主，可怜我吧！主，可怜我吧！”这起作用吗？对谁起作用了？一般都不起作用，但牧师还是要说服我们，民众还是信上帝。中国那里也一样。顺便说一句，我们这里也有人开始吹捧毛。例如，有这样一件事。我当时还在苏联领导层工作。我听说，我们军队印发了毛的军事著作，我叫来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对他说：“马利诺夫斯基同志，您的部门在印发毛的著作。苏军打败了精锐的德国军队，我们的敌人再没有

更好的军队，而毛在中国打了 20 年到 25 年的仗，他和他的敌人只是耍刀枪而已，现在你们印发毛的‘军事著作’是为了什么？是要用这些著作来学习将来怎么打仗吗？您的哪个部门作出了这样的决定？”这是 5 年前的事。一般说来是聪明人决定事情，但决定了一件蠢事。是的，他们自己也认为是做了一件蠢事。现在这些书可能堆在库房里，也可能烧掉了。

我还想谈谈“个人”。一年或一年半以前，有人对我说，在苏联流行一种看法，认为是我使中国同苏联争吵了起来。我不想争辩，因为历史本身已经表明了这种看法的价值。但使我感到惊讶、伤心和生气的是，苏中冲突刚开始时在中国当大使的尤金，也在散布这种无稽之谈，因此我要说说尤金。尤金说我惹恼了毛，使他变成了反苏的人。若是尤金当着我的面说这番话，我就要拿出文件来向他证明，我们同毛冲突表面化就是他尤金造成的。若是就此问题进行不客气的辩论的话，那我有充分根据可以说，尤金在哪个国家当大使，我们就会同哪个国家发生冲突。尤金去南斯拉夫当大使，我们就同铁托吵翻了，派尤金到中国当大使，我们就同中国闹翻了，这决非偶然。

我对尤金是尊敬的。他怎么到中国去的呢？事情是这样的：毛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请他推荐一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让他到中国去，因为毛想编辑他的著作，需要有一位有学说的人帮助他整理，以避免出现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错误。尤金被选上了，派他去了北京。尤金在北京工作期间同毛泽东相处得很好，毛到使馆去拜访尤金的次数甚至比尤金去拜访毛的次数还多。尤金是这样说的，实际情况也是这样。甚至连斯大林都有点儿担心尤金对毛泽东不够尊重。

一切进行得都很正常。突然我们收到尤金的一份很长的密码电报。尤金在电报中讲述了他从毛泽东那里听到的有关苏联、我们

共产党以及尤金本人的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说法。如果说以前得到的印象是，毛好像奉承尤金，那么在收到这份电报后可以看出，毛根本不尊重尤金。我们得出一种意见：应该把尤金调离中国。作为大使尤金是很差的。但是在毛和尤金个人关系很友好时，他是有用的。而尤金的纯大使工作，鬼知道有什么作用？让外交官去从事这项工作吧！尤金同毛泽东发生冲突时，他既是大使，又不是大使，在哲学方面他同毛的关系已完全破裂，这时我们把他召回了苏联。

1954年我访问中国时，同毛进行了几次交谈，后来我对同志们说：“我们同中国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我是从毛的答话和我们周围的气氛中得出这个结论的。这种气氛是亚洲式的：非常客气，殷勤得令人难以置信，但很虚伪。我同毛热情地互相拥抱、亲颊，一起在游泳池里游泳和谈各种问题，我们友好地度过了所有时光。但实在是亲密得令人恶心，同时他向我提出的一些问题也引起了我的戒备。那时我就对所有同志说，我觉得最主要一点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除中共外别的共产党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头。他不允许出现这种情况。

若是斯大林还活一段时间的话，这种冲突发生得会更早，苏中之间会彻底决裂。政治，一般说来是一种游戏。毛在推行自己的政治，进行自己的游戏，其特征仅仅在于使用亚洲的方法：奉承和搞阴谋。苏共二十大后，毛说：“赫鲁晓夫同志打开了我们的眼界，讲了真实情况，我们要改变自己的观点。”毛本人发表了这个看法，但后来还是发生了冲突。当毛开始实行明显错误的政治方针，提出“百花齐放”口号时，他与我会见时问我：“赫鲁晓夫同志，你怎么看‘百花齐放’口号？”我回答说：“毛泽东同志，我们根本不懂这个口号的意思。”当然，我没有就此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我同毛个人发生了冲突，但我们都没有公开谈这一点，尽管我们也有一致的意见。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有什么可张扬的。我对毛说：“我们不明白

提这个口号的意思，因为花有各种各样的：有有益的花、令人讨厌的花，也有有毒的花。”我认为这个口号不适用于我们，毛赞同这个看法。毛是个聪明人，他知道，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发表意见，那就意味着我们不赞成。

突然毛又提出一个新的想法：在5年内赶上美国（原文如此，应为15年——译者）。他开始组织公社，建设小高炉，并宣布和平共处思想是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观点。后来中国人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口号，指责我们当了资产阶级的尾巴，提出了国家今后向什么方向发展的原则性问题。我们没有跟着中国走，可是现在哲学家尤金却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个人身上，这使我感到震惊，我认为他不是傻子。

再如战争与和平问题。有一次，我在北京同毛穿着游泳裤躺在游泳池边讨论战争与和平问题时，毛对我说：“赫鲁晓夫同志，你怎么认为：如果把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的军事实力作个比较，那么中国能动员多少个师？苏联能动员多少个师？其余社会主义国家能动员多少个师？而敌人能动员多少个师？很明显，我们占有优势。”我说：“毛泽东同志，现在这样计算力量对比已经不行了。靠拳头或刺刀解决问题的时候，可以计算谁有多少刺刀，优势在哪一方。出现机关枪以后，兵多机枪少的一方就不一定能战胜人数少的敌方。现在有了原子弹，各方会有多少炮灰，实际力量对比是说明不了的。”他说，他不同意我的看法，而我难道能同意他的看法吗？

又如他在1957年来参加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时作出的声明。当时我们进行了很亲切的交谈，而且非常坦率。毛泽东对我说：“赫鲁晓夫同志，朱可夫元帅在报纸上发表声明说，如果帝国主义国家胆敢进攻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就立即给予反击。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我说：“毛泽东同志，朱可夫不是代表他个

人说这番话的，这是我们党中央的决定，我们责成苏联国防部长表这个态，我也说过这个话，这是苏联的观点。”我们没有发生争论，而是进行了友好的讨论，说明了真实情况。

这时毛对我说：“我认为，如果帝国主义真的进攻我们中国的话，苏联不必介入，我们自己将进行战斗。只要保存住苏联，一切都会逐渐就绪。或者打比方说，如果进攻你们，你们也不要还击。”“那该怎么办？”“撤退，撤退1年、2年或3年。”“撤到哪里去？”“你们撤退过，当时撤到斯大林格勒，而现在可以撤到乌拉尔，有我们中国作后盾。”“毛泽东同志，如果发生战争，会打多久呢？要知道，这次战争可不同于上次，那次战争使用的是飞机和坦克，而现在是导弹和原子弹。我们会有3年时间撤退到乌拉尔去吗？或许我们只有几天时间，而后我们的残余物同敌人混杂在一起。现在谁也不能作出预言。因此我们坚持的立场是阻止敌人发动核战争。如果说我们不还击的话，那就等于让敌人来进攻我们。所以我们声明，我们要还击敌人，阻止他们的进攻。”

分歧就是这样。不过我们谈毛是一回事，谈整个中国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如果我们辱骂起中国人民来，那就要滑到民族主义立场上去了。如果我们认为某一民族拥有特权，比其他民族优越，那就是民族主义，那就是纳粹主义。因此我们现在也真诚地相信，中国人是我们的兄弟。这些人和我们一样。如果说被欺骗的中国青年袭击了我们的使馆，那也不能说明我们应该敌视中国人民。青年还不是整个民族。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明白还有另一些青年。要知道，不是全中国的青年都在那个广场上，不是所有在那个广场上的人都在大喊大叫，都赞成这种行为。事情就是这样。现在有多少中国人为他们身边发生的事情感到痛心啊！中国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中国人在互相残杀。在我们这里，斯大林枪杀了成千上万的公民。我们是党员，要为此负责，但现在还不能认为这是全党行为，

那是斯大林滥用职权，现在毛泽东在重复这种做法。

我再举出我们同中国关系史中的几个事件。斯大林对毛泽东是很不满的，他给毛加了个头衔，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恰如其分地给他起了个绰号，称他是什么山洞里的马克思主义者。是的，当毛在全国胜利进军的时候，共产党人曾逼近上海，但后来他们停了下来，未去占领它。斯大林问毛：“为什么不拿下上海？”毛回答说：“那里有600万人口，如果占领上海，就要养活这些人，我们用什么来养活他们呀？”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吗？毛泽东依靠农民，而不是工人阶级。他轻视工人的上海，不想接收它，不想依靠它。斯大林不止一次地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批评他。斯大林这样做是对的。但事实终归是事实，毛泽东依靠农民取得了胜利。这不是奇迹，而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修正。他依靠农民取得了政权，就是说，历史的真理在他那里，只不过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要知道，胜利也常有暂时的，有各种各样的结果。从历史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况。

还有另一个具体的事情。斯大林在世时，苏联同中国签订了共同开发新疆地下资源的协议。这是个错误，甚至是对中国人的侮辱。以前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剥削过中国，现在苏联人也步其后尘。这是不可思议的！斯大林在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等国也做了这类事情。后来我们取消了所有这种混合公司。第三个例子：一天，斯大林给我们打电话问：谁知道在中国的什么地区有可开采的金矿或钻石矿？我们都没有这方面的知识，都回答说不知道。后来我们聚集在斯大林那里时常常拿这件事情悄悄地开玩笑。贝利亚说：“你知道谁知道吗？演员科兹洛夫斯基知道。他不是经常唱‘你数不清石窟里的钻石’吗？”顺便说一句，贝利亚本人常常怂恿斯大林，说什么中国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而毛瞒着不讲，我们向他提供贷款，他就得给我们一些宝

藏，所以斯大林对此也产生了兴趣。

有一天，我们在斯大林那里研究橡胶问题，好像是我提出一个想法，问问毛泽东在中国的什么地区可以建立橡胶园。开发这个项目，向中国提供贷款和技术，我们就可以摆脱依靠资本主义国家进口橡胶的状况。我们给北京发去电报，中国人回答说，在海南岛可以建立橡胶园。如果我们提供贷款，他们同意。事情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我们签订了协议，但后来发现，可以种植橡胶树的地方不大，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这件事就告吹了。

后来斯大林又喜欢起菠萝罐头来了。他立刻口授给毛的电报，马林科夫扮演了秘书角色。“让他们为我们提供一块地方建一座菠萝罐头厂。”我说：“斯大林同志，他们刚刚取得政权，那里有好多外国工厂，如果再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工厂，这肯定会伤害毛的。”斯大林瞪了我一眼，生气了，大声训斥。电报还是发了。过了一两天收到了毛的答复：“我们同意。如果你对菠萝罐头有兴趣，请给我们一笔贷款，由我们建厂，我们将用这个厂的全部产品来偿还你们的贷款。”当时大家听到斯大林在发火和咒骂。当然，斯大林伤害了毛泽东。后来从未有过由我或我们政府成员签署的这类电报。在中国人起来整我们之前，我们未做过任何伤害中国的事情，而当中国人起来整我们的时候，我也未当基督，任人欺凌。

在我们同中国人还保持着各种关系时，他们做出了什么事情呢？他们为争夺无用的沿海岛屿同蒋介石分子进行了一场战争。我们为北京提供了武器，我们感兴趣的是缴获的美国技术。中国人有几颗美国人发射的而未爆炸的导弹。我们对新型“空对空”导弹感兴趣，请求中国人提供给我们进行研究。北京未作答复。我们再一次提出请求，北京答复说：“暂时我们自己要研究。”但是比较一下他们和我们的军事技术水平嘛！何况我们不断地向他们提供秘密军事技术、导弹，签订生产原子弹协议，提供原子弹模型。然而他们

却拒绝向我们提供美国导弹。于是我们就停止了某些技术的提供。北京着急了，我对我们的军人说：向中国人作出解释。就说你们在利用我们的技术，可是你们连缴获的美国导弹都不想给我们看！他们明白了，现在把这个导弹给我们运来了。我去看了看，这个导弹比我们的好，但中国人有意未给我们运来热弹头的敏感部分。我们后来为解决这个课题研究了好几年。这大概是1958年的事情。

根据协议，我们的飞机可以使用中国的机场。后来有远程潜艇时，为了与这些潜艇保持联络，需要在中国建立一个无线电台。这个时候中国人正要求我们向他们提供设计图纸并教他们造潜艇。我们随即向他们提出了建立无线电台问题，很快就收到了他们的答复：“不行”。不久就收到了关于中国领导人有反苏情绪的密电。这时我对同志们说：“按照外交礼节，现在该轮到毛泽东到我们这里访问了。但是鉴于出现的这种情况，是不是我们先去同他们就两个人的会晤问题达成协议？秘密的或公开的都行，需要进行私下会晤来作解释。”

这之后我去了中国（最后一次），那是在1959年。那次会晤未取得任何成果。我们的会谈是友好的，但未取得成果。我同毛也谈到无线电台问题，我对他说：“毛泽东同志，我们向你们提供贷款来建这个电台，我们一开始给你们写信说要自己建，但也许这是个不成功的方案。电台属于谁，我们不感兴趣，我们感兴趣的是能使我们国家同潜水艇保持联络。我们可以把这个电台完全送给你们，只希望能尽快把这个电台建立起来。我们的舰队现在到太平洋活动，而我们的主要基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我们能不能达成协议，让我们的潜艇在你们这里有个基地，以便加油、停泊等等？”“不行！”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生气。我接着说：“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让你们进入摩尔曼斯克地区，你们在那里可以拥有自己的潜艇。”“不需要！我们不想去摩尔曼斯克。英国人和别的外国人

在我们这里呆了多少年，我们再不能让任何人到我们这里来。”他始终没有同意。

后来中国报纸开始刊登文章说，符拉迪沃斯托克是中国的领土，是俄国人从中国夺走的。历史上中国人曾在那里统治过，后来好像我们的沙皇打进了那个地方。我们同意就共同边界问题同中国进行谈判。他们拿来了自己的地图，我们无法平静地看这个地图，因为他们就是那样画的。

现在有些人流露出一种看法，认为毛泽东是昏聩的傻瓜。这不对！他不傻，他是我们的对手，是一个聪明人。他骗过我们。塔列兰^①曾说过，外交家长着一个舌头就是为了隐藏自己的思想。外交，这是政治。比如说戴高乐，他是个聪明人还是个蠢人？其实他曾一度被一些人看作是白痴，然而他是个很聪明的人，只不过我们思想上的对手是自己阶级的代表，但他不是蠢人而是聪明人。毛是民族主义者，是个聪明人，他有自己的观点，我不能苟同，而且我实在难以容忍。如果看一下我在党的二十一大上作的报告，就可以发现，那里有好多议论是谈中国问题，虽然我并未提及中国。我驳斥了毛的论点。

当中国人提出自己的口号时，他们的宣传品在我们的西伯利亚随便散发。我了解这个情况后对我们的同志说：“要加以制止！你们以为平均主义口号在我们这里找不到土壤吗？你们错了，平均主义口号是很有诱惑力的。我们应该作出实质性的答复，而不只是制止。”顺便说一句，他们有一项措施我是拥护的，就是毛取消了军衔。我认为这是个明智之举，而我们戴肩章缝勋线的做法是不明智的。这对我们有什么用？我们不带肩章也打赢了国内战争。我当

^① 塔列兰(1754—1838)，1797至1807年、1814至1815年任法国外交大臣，以权变多诈闻名，为19世纪资产阶级外交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时的职务是政委，我没有戴肩章，红军战士都承认自己的政委、自己的司令员。我们不戴肩章打败了敌人。而现在军人打扮得很漂亮，像金丝雀。

在我们同中国关系好的时期，他们从我们这里要去了所能要的一切。1954年，我们还很穷，没有吃的，有些地方闹饥荒。但当我们来到北京时，周恩来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或许你们能赠送给我们一所大学吧？”我回答说：“我们很穷，原则上讲我们可能比你们稍富些，但战争刚刚结束，很遗憾，眼下我们不能赠送。”而这之前实际上我们无偿地归还了旅顺口和大连。我们向中国投入了很多很多的资金，修筑了从乌兰巴托到北京的铁路，而不是蒙古人建造的。是我们在蒙古修筑了铁路，而中国人修筑自己领土上那一段。但是1957年我们同毛交谈时，他说：“对这条铁路我们兴趣不大，我们感兴趣的是哪条铁路呢？”他在地图上指出从北京穿过群山到哈萨克斯坦一线。我说：“你比我更熟悉自己的国土，我们认为途经乌兰巴托的路线最近，不过我们也同意通过这条路线同你们连接上。你们境内一段由你们修，我们境内一段由我们修，修到边界线，在那里接轨。”

我们再一次举行了会晤。周恩来提出：“是不是我们境内这一段也由你们来修？”我们看了一下地图，发现那里也要穿过群山跨越河流，不管谁去修，都很艰难。我回答说：“不，最好还是各修各的。”而且好像毛也喜欢这样干。但是，若是我说：“当然，我们都用自己的钱来修建这条路”，那会怎样呢？我们都动工了。在修建过程中他们又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我们还是说：“我们已经达成协议，各修各的。”结果我们修到了边界线，他们未修到。主要问题还不在这方而。当时毛迫不及待要统治全世界，先是统治中国，然后是整个亚洲，再后是哪里呢？中国有7亿人口，马来西亚有一半人口是华人，亚洲其他国家华人也不少。从理解中国民族主义的角度来

看，喝茶时的“天真”闲聊确实很有意思。

毛问：“各种征服者占领中国多少次？”他自答说：“不止一次，但中国人把所有征服者都同化了。”他瞄准了未来：想想看，你们那里有2亿5百万人，而我们有7亿。接着他谈论起中国的独特性来，话头是汉语中没有外来语。他沾沾自喜地说：“全世界都用‘electricity’（电）这个字，那是从英国人那里借用来的，而我们有自己的字。”他的这种自负心理简直使我打了个寒颤。

人们常说，中国离我们很遥远，其实中国靠我们很近，它同苏联接壤，我们有漫长的共同边界线。这就是说中国是我们的近邻，但又是比较远的邻居，因为我们同中国（我只是讲我本人经常接触的人）很少有共同之处。革命前，像我这样的人，只是从画片上看到过中国人，很少读到有关中国的书籍。我们见到中国人，主要是在他们贩运各种商品的时候，如在顿巴斯，他们卖过丝绸，就是在这种接触中，我们形成了对中国的概念。当然，俄日战争使我们更近距离地接触到了中国人，但俄国士兵对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看法。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同中国、同中国革命领袖孙中山建立了联系。20年代中国爆发内战时，孙中山实行进步政策，持同苏联友好的态度，苏联人民同情他，我们的报纸教育读者同情中国人民，同情它为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而进行的斗争。后来蒋介石在中国掌握政权，他断绝了同共产党的关系，国共之间爆发了战争。我国人民又是同情中国的苏区，同进行反压迫斗争的中国人民同命运共呼吸。

我记得有过这样一个插曲，大概是在1926年或1927年，我当时任尤佐夫卡地区党委组织部长。我有一个熟人，叫阿赫特尔斯基来找我，他在国内战争时期表现得很出色，出了名，他指挥过装甲车，他的装甲车就叫“阿赫特尔斯基”。他是个勇士，但在政治方面，他一半是共产主义者，一半是无政府主义者。他来到区委，像往常

一样喝醉了。他对我说：“赶快给我开一张介绍信，我去中国，去打蒋介石。快点，不然我晚了就参加不了攻打上海的战斗。”我对他说，没有他，中国共产党人也能拿下上海。这个插曲表明当时我国人民是什么心情。

还有一些我国内战时期的见闻。当年我未亲眼见到为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的中国志愿人员。在我任职的部队里没有中国人，但是在我们的战线上有中国部队。红军战士说，中国人在战斗中表现得很出色，并且开玩笑说，中国战士据说是这样：给吃的就干，不给吃的就不干。一句话，给我吃的我就打仗。他们在战斗中确实无所畏惧，都是很出色的同志。在我国劳动人民当中，反蒋斗争组织者的名字无人不知，特别是指挥中共军队作战的朱德。高岗这个名字也很熟悉。人们也提到了反革命分子张作霖，我们把他看作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中国工人阶级的敌人。也闪过共产党的对手吴佩孚等人的名字。好多名字我现在都忘记了。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当中，我很熟悉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此人在莫斯科工人当中很有名望，经常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讲。当我们请他到某个工厂来时，他从不拒绝。他现在还住在莫斯科，始终是我们的朋友。不管中国今天的领导人采取什么态度，他始终同我们共产党和我国人民保持友好关系。这就是王明同志，出色的共产党人。确实，在20、30年代，我没有研究中国问题，我既不了解中共的组织结构，也不了解它的许多领导人。我记得，这些人经常在我们的报纸上提及，但他们的名字我现在想不起来了。而毛泽东这个名字我一次也没有听说过。

日本人侵中国后，我们同蒋介石建立了非常密切的联系，尽管他敌视中国共产党。斯大林支持蒋介石，认为他是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和争取中国解放的进步力量。我认为这是正确的立场。需要支持蒋介石，因为搞垮他就意味着加强日本，加强我们共同的

敌人。在远东，日本是我们的头号敌人。后来我见到毛泽东时，他指责斯大林对蒋介石实行这种方针。其实斯大林并没有助长蒋介石的国内政策，他帮助蒋介石是因为他反对日本，这对我们有利。

丘吉尔也实行过类似的政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他支持苏联，虽然他是我们政治上的敌人。丘吉尔从苏维埃国家诞生之日起一直到他去世时始终是我们的敌人。但他是个明智的政治家，认为在同希特勒进行殊死斗争时英苏联手是有好处的。这并不是说，丘吉尔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苏维埃政权，并想为苏联人民做什么善事，绝对不是，而是世界出现的局势和对自己国家有利的考虑促使他同我们联手。苏联支持蒋介石也是出于这一原则。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我们同中国的边界线上是平静的，我讲的是蒋介石控制的那一段，而日本人占领的地段，形势越来越紧张，经常发生各种冲突。日本人一直在“试探”我们。他们在太平洋战场上，一开始取得一些胜利，后来开始吃败仗，这时陆地上的形势渐渐有利于中国。中国军队开始取得了一些胜利，因为日本已经不能像以前那样在中国保持主动权了。苏联在打败希特勒德国及其盟国之后，过三个月就参加了对日作战。在打败日本的最后阶段，我们的军队成功地发挥了作用。按照与同盟国的协议，我们解放了满洲和朝鲜北半部分，这时才有可能更有效地援助中国，包括给予广泛物资援助和武器援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开始更加关注中国问题，我们决定给予毛泽东和人民解放军直接援助，帮助他们进行争夺国家政权的斗争。由于打败了日本，日本关东军放下了武器，给我们留下了大量战利品，其中很大一部分，特别是作战技术，交给了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些武器，我们与盟国有这样的协议：我们无权把它们转交给中国任一交战集团。因此，要把武器交给毛，但又不能造成我们不履行义务的印象。所以我们把武器运到了某个地方，好像毛

的人“劫持”了这些武器，武装了自己的军队。这时他们已经用缴获的日本武器装备了一支规模很大的部队。

我本人第一次听说毛的行动，是在中国内战时期米高扬作为我们的全权代表去延安（原文如此，应为西柏坡——译者）会见毛泽东的时候。斯大林想弄清楚中国共产党需要什么，以便组织对他们的直接援助。我记得，米高扬回来后，斯大林常常在和他的亲信聚在一起吃午饭时讨论中国问题，并有点儿搞不清楚“毛泽东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有些独特的农民观点，好像害怕工人，要把自己的军队同市民隔开”。特别令我们迷惑不解的是毛的这种做法：当他的军队顺利向南推进，逼近上海时，有几周时间不进上海。我已经提到，毛就此向我们作出了什么回答，他把自己的行为方针同无法养活 600 万上海人的情况联系在一起了。斯大林感到很愤慨：“这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者？”他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不去援助上海工人，不想为上海工人的命运承担责任。

那时我还在乌克兰工作，只能在去莫斯科时从斯大林那里了解到中国的一些详细情况和我们在为中国做什么工作。中国共产党人在 1949 年取得胜利时，我正好调到莫斯科工作，任莫斯科州委和市委第一书记，同时任联共（布）中央书记。这时我经常同斯大林来往，因此熟悉与中国有关的问题。其实没有斯大林参加，我们谁也不能决定这类问题，不仅不能决定，而且也不能研究。我不认为，我对中国问题都了解，主要问题是斯大林同莫洛托夫决定的。但我知道，苏联向毛泽东提供了越来越广泛的援助，为的是巩固他的革命成果。那里的共产党人通过武装斗争取得了胜利，美国帮助蒋介石组建了反共战线，所以打败日本人后中国内战持续很久，共产党需要我们的援助，并且得到了我们的援助，首先是武器。

同取得人民革命胜利后的中国的关系

毛泽东对苏联的第一次访问，安排在斯大林 70 寿辰之际，正好这一天我从乌克兰来到莫斯科担任新职。斯大林对我说：“交出乌克兰的工作，务必在我 70 寿辰时来到莫斯科。”我这样做了，但我未参加同毛泽东的会谈。会谈是斯大林单独或与莫洛托夫一起同毛进行的。这样的会谈举行多少次？是怎样进行的？我现在很难说清楚。但在这些会谈后，斯大林从未高兴过，也没有特别因见到毛而引以为荣。但是在为毛设宴时，斯大林却表现得非常好客，他喜欢举行这种宴会，喜欢表现出自己好客，殷勤待客。如果他想这样做，他会做得很好。我出席了这次宴会，边吃边进行无拘无束的交谈。

我高兴地看到，我们同新中国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我们都希望这样。确实，在毛访问期间发生过一起不愉快事件。在举行了这次宴会和友好交谈之后，斯大林一连几天未会见毛。既然他本人未去会见毛，又未委托他人去会见毛，所以我们当中谁也没有去看毛一眼。这时毛开始不高兴了，他被关在屋子里，什么也不给他看，也没有人理睬他，于是他宣称，如果这样继续下去，他就走人。此情况有人向斯大林作了报告，说毛表现得很不满，这时斯大林在自己的别墅里又一次为毛举行宴会，会见他。现在斯大林尽量满足毛的要求，建立良好关系，并表明完全站在他的一边。

毛走了，当时苏联政府驻华经济事务全权代表是铁路专业干部，他以前在满洲工作，赶走日本人后在那里修复了铁路，后来成了毛泽东的顾问。斯大林认为他是个可信赖的人。不久他就报告说，发现中国领导人有对苏联的不满情绪，刘少奇、周恩来和其他一些国家领导人尤其表现出了这种情绪。高岗在毛泽东来访莫斯

科之前也给我们发来了类似信息。当时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满洲的全权代表，同时也是北京政府在那里的全权代表，好像是满洲的总督。他同我们的代表建立了很好的关系。高没有谈毛本人的态度，也没有谈毛对那些对我们明显表示出不满情绪的人采取了什么措施，而是为证明存在这种不满情绪举出了许多事实。

下面是其中的一个事实。中国的一个节日来到了，举行了阅兵式，当广场上驶来用我们的坦克武装的部队时，中国军人生气了，说什么俄国人给他们的是旧坦克。是的，是旧坦克，不是新坦克。当时我们自己也没有那么多新坦克可以给中国。苏联刚刚结束战争，在恢复工业，坦克产量减少了。只能是这样。所以我们不认为有理由抱怨我们。当然，坦克是旧的，但还是完全有作战能力的。这种说法激起了对我们的不满情绪，一切都成了责难苏联的理由。

斯大林试图使毛对我们有好感，在毛访问期间要表现出对他的友好和信任，因此斯大林拿出我们驻满洲代表发来的含有同高岗谈话记录的文件交给了毛。我以及我与之交换过意见的其他政治局委员都确信无疑高岗告诉了我们真实情况。他为了什么目的，我不得而知，但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是从对苏联友好的立场出发的。现在斯大林把这些文件交给了毛。如果你要寻找历史上的类似事例的话，则可以看到科楚别伊向彼得大帝报告哥萨克首领马泽帕叛变的例子。彼得为了把马泽帕争取到自己一边来，并表示不相信他叛变，就把这个报告交给了马泽帕本人。结果马泽帕处决了科楚别伊，并开始帮助查尔斯七世征讨俄国。^①普希金在他的《波尔塔瓦》一诗中讲述了这个故事。马泽帕对待科楚别伊是处决他，毛也是这样对待高岗的。开始是把他软禁起来，后来我们听说，高

^① 马泽帕是17世纪哥萨克的一位首领，为控制乌克兰，曾同瑞典国王查尔斯七世密谋反对俄国沙皇彼得一世。科楚别伊是马泽帕手下一官僚。

岗“服毒自杀了”。……

现在我们失去了一位同我们关系密切的人，他用具体行动证明了这一点，向我们报告了中国领导人内部的情况和他们对苏联的态度。这是很宝贵的。斯大林不是支持高岗，而是把他出卖了。我认为，斯大林这样做有以下理由：斯大林不相信任何人，甚至连自己也信不过。他认为，高岗向我们提供秘密情报的事迟早会被毛泽东发现，那时他就会处于尴尬境地，好像他在教唆北京政府的反对派。因此斯大林利用机会表明，他完全信任毛，他不想得到反对北京领导的人提供的情报。虽然高岗本人从未向我们谈过他对毛的态度，但对许多中国人来说，这已不是秘密。

我记得，我们在中国的人报告说，在一个城市里，年轻人举行娱乐晚会，当他们喝得酩酊大醉时，便开始敌视性和示威性地冲着我们说：“带走你们的高吧，他是你们的人，而不是我们的人。”此事还是发生在他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时候。可见那个时候高就有些孤立了。人们都知道，他不忠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对苏政策。这一点也应该注意到。可能斯大林出卖高，是认为他反正是要被揭露的。这就是我的结论。但我本人从未从斯大林那里听到这种说法。我不能用别的任何理由去解释为什么斯大林把上述文件交给毛。我们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说真的，我们对斯大林的行为感到愤慨。高岗就这样被葬送了。

至于毛在莫斯科的逗留，我发现，斯大林表现得不是很诚恳，感觉得到他对待毛的某种傲慢。毛根本不是傻瓜，他当时就觉察到了这一点，这使他大为恼火，虽然除上述情况外，表面上他未再表现出任何不满情绪。

还在米高扬访问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就提出了新疆问题。中国的这个省，实际上是我们的人统治着。我们从那里向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引人注目的具体援助，这也不是秘密。但是蒋介石统治中国

时是一种情况，而毛取得胜利后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毛访问莫斯科时，这个问题被正式提出来了。斯大林说，新疆是中国的领土，我们对它没有任何野心。我们呆在那里，是因为以前这样做对中共对苏联都有利。蒋介石无法插足新疆，他知道我们在那里扎根很深，他不能采取任何实际步骤，因此他不得不从实际情况出发。

现在我们对毛说，我们撤离新疆，但斯大林建议在那里建立苏中混合公司。中国人接受了这个建议，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虽然他们肯定还是不满意。他们认为，苏联在那个地区有什么特殊的计划，尽管斯大林声明苏联对新疆没有野心。建立苏中开发新疆资源的公司，在北京看来，是对中国独立的损害，是对中国与苏联接壤的领土的侵犯。总之，我认为，建立联合公司是斯大林的一个错误。无论同中国还是同其他兄弟国家都不能干这种事。

以前我们在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也成立过这种混合公司，如在罗马尼亚，这使罗马尼亚人感到非常气愤。斯大林去世后，我们撤销了所有这些公司。建立联合公司不仅触及民族自尊心，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侵占另一个国家的资源。如果说在罗马尼亚或者在匈牙利设立这种公司可以解释为，这些国家曾站在希特勒一边同我们打过仗，那么对于中国就没有这样的理由了。

当我们同中国争论得很激烈的时候，毛在同我会谈时说，斯大林不仅不支持他，相反却对蒋介石采取了违背中共利益的步骤。而某些类似于建立混合公司的行为，在新中国造成了反苏、反俄情绪。遗憾的是，我们还做出了给巩固我们同相邻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带来很大损害的其他举动。例如，斯大林曾强求北朝鲜和中国把获得或开采的所有换汇商品和原料都交给苏联。我认为，这种做法是狂妄的、背信弃义的。不言而喻，每个国家都应当拥有自己的外汇，以参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市场。要知道，苏联并不能给它们提供一切。我们自己也不得不靠开采黄金或向西方出口换汇商

品来筹集外汇,以便用来购买我们不能生产的商品。

这种需求中国也有,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有,应该考虑到这一点,应该考虑到它们的利益来制定我们的政策。但是斯大林置若罔闻,他不了解,也不想了解这种情况,特别是在打败希特勒之后。他认为,亚历山大一世在打败拿破仑之后可以在欧洲立法,他现在也可以立法。这是夸大了自己的能力,忽视了朋友们的利益。这种政策使朋友们受了委屈,受到了伤害,并在同苏联的关系中种下了仇视的种子。我记得在我们同中国的相互关系中发生的各种插曲,我们考虑不周的行动给我们的友谊罩上了阴影,其实也没有什么客观原因。

另一方面,有时毛泽东本人不仅表现出对斯大林的尊敬,而且也有某种自卑感。例如,他请求斯大林推荐一个人,帮助他编辑他在内战时期发表的演讲和文章。现在毛想出版这些材料,请求给他派一个有马克思主义修养的人,不仅能帮助他搞编辑工作,而且能避免出现理论上的错误。这种请求表示了对斯大林的权威的承认。对此斯大林感到很高兴。我认为,毛这样做有自己的考虑,他要给斯大林造成一种错觉:他准备从自己的角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并不谋求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确立自己的什么观点。但后来的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完全不是这样。

中国人还提出了援助武器、提供设备、建设工厂等更多的要求。苏联给予了中国巨大的援助。我现在说不清楚花费的具体钱数。这里谈的是钢铁厂、汽车制造厂、拖拉机制造厂和生产现代武器的工厂。我们为这些工厂提供了贷款,寄去了图纸,还给予了其他实际上无偿的援助,甚至还本着友好精神而不是通过交易方式转让了技术资料。我们向中国派遣了各种部队的军事教官,如飞行员、枪手、坦克手等。我同样认为,这样做对我们对中国都有好处。我们把加强中国看作是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和保证我们东方边界的

安全。在这里我们同中国的利益是一致的。我们对待中国的要求同对待自己的需要一样，尽我们的物质能力去迎合他们，满足他们的一切要求。

在东方，不只是苏联和中国的利益，而且还有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利益是非常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对北朝鲜苏联也很关注，在建设军队和恢复国民经济方面向它提供了各种援助。一句话，我们尽力使北朝鲜在经济上发展得比南朝鲜更快，进而成为对南朝鲜人民具有吸引力的方面。当北朝鲜同南朝鲜开战时，北朝鲜、中国和苏联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因为南朝鲜的胜利就是美国对北朝鲜的胜利，这对中国和苏联都有威胁。我们完全同情北朝鲜，同情金日成领导的政权。

许多年来我们都持这样的观点：在那场战争中首先发起进攻的是南朝鲜。现在我认为，没有必要纠正已确定的说法，因为这样做只会对我们的敌人有利。但是，如果不详细地规定说法的话，真实情况是这样：这场战争是由金日成发起的，得到了斯大林和我们所有人的支持。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同情朝鲜人民，想帮助他们推翻资本主义的压迫，在全国建立人民政权。斯大林去世后，战争还进行一段时间。我们早就想寻找机会结束战争。我们通过外交渠道采取一些措施，开始对美国人作出试探，看他们对停火持什么态度。美国人作出了积极的反应，于是开始进行谈判。后来为了举行交战各方的直接谈判，成立了由朝鲜人、中国人和美国人组成的混合委员会。谈判持续很长时间，但最终还是达成了协议。部队停留在它们停止军事行动的地方。大致在三八线一带。三八线即是打败日本后确立的苏美军事分界线。

当时我们同中国关系很好，至少表面上是这样。我讲表面上，是因为后来我们得知，毛在内部不承认我们是平等的盟友，并且他有大国主义野心。我们给了中国很可观的援助，中国工人在我们这

里实习,在汽车制造厂、拖拉机制造厂和其他工厂里学习,中国在我们的帮助下也建设了这些工厂。我们的工程师和工人到中国工作,直接参加了这些工厂的建设。最初中国公民对我们很好,而我们也尽一切努力使兄弟关系更加巩固。我们认为,苏中两国人民是兄弟,这不仅对我们而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有好处。

我们还根据斯大林的建议,提供给中国人民解放军许多武器,如大炮、坦克和机关枪、步枪和冲锋枪、飞机等,中国人得到了当时苏军装备的武器。确实,有些作战技术苏军已采用新式装备。其实在战争期间和特别是在战后,在军队的建设过程中武器种类是要不断更新的。我们在同中国的关系中总的原则是什么呢?随着武器的不断改进,我们先用新式武器武装自己的军队,然后提供给中国重新武装它的人民解放军。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是兄弟关系的基础,我们希望中国强大,而它的军队要处在现代发展水平上。我们尽一切努力提高自己军队的作战能力,同时也希望提高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

我们听说,在中国有敌视苏联的力量。我们得到消息说,中国报纸上写道:中国人对同苏联的边界线不满意,希望得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等地。这些报纸对读者说,俄国沙皇用武力确立了现有边界,并把它强加给了中国。它们还使用了对苏联不友好的其他表达方式。我当然不为沙皇作辩护,但苏联边界是对原有边界的继承,我们始终认为,这是苏联的合法领土。其实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新的革命政府也都是原有统治者的继承者,认为它们从被推翻的政权那里所接收的边界之内的整个国家领土是自己的领土。

我认为,这种态度是明智的,是正确的。如果现在提出重新审定边界问题,寻找有不同边界的某些历史时期,那就要追溯到很远。这样做不仅不会加强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而相反,会使我们争吵起来。此外,真正的共产党人、国际主义者看问题应该超

越国界,对于他们来说,这个问题在争取使革命运动最终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事业中和在马列主义哲学范围内根本没有意义。

我们在北京谈了这个问题。他们回答说,不要管它,我们有许多党派,每个党派都有自己的报纸,那里也可以看到地主资产阶级代表的敌对意见,但这不是我们领导的观点。我们对这种说法感到满意,但也希望公开发表中国领导人的观点。然而他们没有这样做,我们没有直接提出这种要求,而是完全听信了中国领导人的话。

我们主要同周恩来保持了工作上的联系。周经常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就同他讨论了各种问题。同他预先就朝鲜停战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制定了总的行动策略。周常常就一些经济问题来苏联访问,包括签订向中国提供设备的协议和谈中国的其他需求。我们同周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我们非常尊敬他。他是个精明强干的人。同他好交谈,容易找到互利的解决办法。我们认为,总的来说我们同中国建立了很好的工作关系。当时周是总理兼外长,因此苏联同中国外交关系问题也是同他处理的。

我已经说了,我们向中国提供了大量设备,在那里建设了工厂。我想专门谈谈这个问题。我退休后,各方面人士见到我时都表示担心,我们给其他国家援助太多会分掉苏联的财富。是的,我们在援助我们的朋友们,比如说中国,但中国为我们做了补偿,我们援助的其他国家也会为我们补偿的。有人说,若是做补偿,这算什么援助呀!好像这是交易。不完全是这样!既然有补偿,当然是交易,而援助在于,我们提供用贷款支付的设备,并由我们帮助安装。我们建设工厂,训练工人,然后提供组织生产所需要的一切。这样,受援国会立即具有生产钢铁和设备的能力。

当然,如果看看资本主义世界形成的关系,就可以发现那里的每个公司都只盘算什么对它有利。是出售设备对它更有利,还是不

出售设备而出售由这些设备生产的产品更有利？它们常常是选择后者。而我们是想加强友好国家的经济，帮助提高那里居民的生活水平。我们既提供设备又提供整个工厂。另外，我们是按优惠价提供设备。例如，资本家提供年利率5%至7%的贷款，而我们提供贷款的利率是2.5%或2%，这是很大的优惠。因此我们有理由说，我们是在向兄弟国家提供援助。

这个时期同中国还进行了谈判，最后签订了关于旅顺口和大连地位的协定。在这方面，我们确定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的出发点是，旅顺口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我们在那里保持驻军既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利益又要符合苏联的利益。我们作出的努力是旨在反对可能出现的共同敌人，即以前曾被打败过的日本。何况具体到那个时候，已经出现了新的情况，来自美国方面的威胁在日益增大，实际上美国已经在华南组织了对人民政权的战争，因此它也可能从日本方面来威胁中华人民共和国。

过去我们花了很多人力和财力改建旅顺口要塞，对它重新进行了武装，并在那里保持了相当规模的警备部队。所有设施后来我们都移交给中国了。除此之外，我们还放弃了在满洲中东铁路上的权益。我认为这些决定是正确的。我们不想造成冲突，不想在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领土上拥有财产。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把旅顺口交给了中国。但是看来，这样做还没有完全使他们感到满足，毛希望得到更多的东西。

斯大林去世后，我们取消了一切不平等条约，以及开发新疆资源的合作公司，并就旅顺口移交给中国的问题和我们撤军的问题达成了协议。在最后一个问题上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预备性会谈。拖延解决这个问题的不是我们，而是中国方面。中方这样做，我们是理解的。朝鲜战争还在进行，中国担心美国会利用这个机会。美国人扭转了战争局面，现在有利于南朝鲜。北京担心：他们是否会

发起对中国的侵略行动?美国在南朝鲜有足够的军队,因此当年中国人不仅不急于要求移交旅顺口,而且拖延移交时间。

1954年,我们决定派党政代表团访问北京。根据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的决定,代表团由我率领。代表团组成人员很多,很有代表性。其中有布尔加宁、米高扬、什维尔尼克、福尔采娃、谢列平、纳斯里金诺娃等人。代表团起程时间被安排在中国人民革命取得胜利和建立劳动人民政权的周年日——10月1日。这一天我们来到中国,受到非常热烈的欢迎。确实,我们很高兴踏上中国领土,同它的人民的领导人会见和交谈。除共同的防卫问题外,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要向北京提出。为了巩固国防,必须加快发展中国的经济,特别是工业。我们对中国政府只有一个请求,我们认为,这件事是双方感兴趣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中国的帮助。中国失业者很多,我们想引进一定数量的中国工人来开发西伯利亚的资源,首先是木材采伐。

我现在记不得确切谈的是多少人。我们需要一百万,也许更多。根据各专业部门报的数字,总需求量就是这些。当时的看法是,我们缺少劳力。这个看法是不对的,后来作了纠正,因为查清我们的劳力是够用的,甚至还有富余。实际上我们的劳力使用得不好,因此出现了某种不足,主要是在西伯利亚感觉到劳力不足。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为了开发西伯利亚的资源,应该从苏联的欧洲部分引进劳力,因为在西伯利亚人口太稀少。我说到这儿打住,接下来要说明毛泽东对我们的要求作出了怎样的反应。

我们聚在一起喝茶,在中国,我未发现有酗酒现象,就是我们吃午饭时,也是适量随意喝些啤酒,不像在斯大林那里,每个人不是想喝多少就喝多少,而是斯大林想给他的机体灌多少。在这方而毛泽东与斯大林截然不同。我不知道他本人对喝酒有多大爱好。一般人们都是喝茶。开会时(按中国传统)给一杯茶,你刚喝完就又送

来下一杯，如果你未来得及喝完，他们就把茶拿走换上新的，过一会儿还换。不时还给你送上一块蒸过的热毛巾，中国人用它擦头擦脸，爽快爽快。对这种礼节我们不习惯，但出于对主人的尊重，我们也用毛巾擦擦。

送茶次数很多，我们不习惯这样喝饮料。布尔加宁喜欢喝茶，极其认真地履行了礼节，但后来他得了失眠症。医生给他检查时问他：“您喝绿茶了？喝的多吗？”“是的，喝了不少。”“如果您继续喝那么多绿茶，失眠会更严重。您要少喝。茶含滋补剂，会使人睡不好觉。”布尔加宁不再喝茶了，后来他对我说，又恢复了正常。

毛对我们的劳力要求作出了怎样的反应呢？他看看我，然后低下眼皮，接着又抬起眼皮心平静气地小声对我说：“都把中国看作是劳力储备国，认为我们有许多失业者，我们是个不发达国家，因此可以引进中国人这样的廉价劳动力来从事任何无需专业技能的工作。但是在中国，对中国人民的这种态度被认为是一种侮辱。你们的要求（这就是他怎么提这件事的）使我们感到为难，并会在中国造成对苏联的误解，人们会得出，苏联也把中国视为粗野劳动力的提供者。过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是这样看待我们的。”

听到他这样说，特别是作这样的比较，我们心里很不愉快。我们对中国是真诚的、友好的、也是开诚布公的。我们认为，这种建议对中国是有利的，因为它想暂时解决多余人口的吃饭问题，这样一来，一些中国人就能够自己挣得面包吃。可见，这样做对那些到我们这里工作的人，对中国都有利，因为他们在西伯利亚也能得到一定的劳动报酬。我们商定，由我代表苏联代表团进行这次会谈。因此我回答说：“毛泽东同志，我们不想给你们制造困难，我们认为，这个建议对你们也有好处。如果它使你们感到为难的话，我们就不坚持了，我们将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

谈话到此结束了。同毛交谈之后，我们在住处开了会，并作出

决定：既然我们的要求使中国同志感到为难，就不要再坚持了，我们可以靠自己国内力量来解决西伯利亚资源开发问题。这样，我们就放弃了这个问题，再没有提及。但是我们在中国转了一圈回到北京后，中方又问我们：你们怎么不提劳力问题啦？我们解释说，得到毛泽东同志那样的答复后，我们放弃了自己的建议。这时北京正式向我们说：中方只是谈了自己的想法，但对苏联的需求是理解的，中方准备帮我们的忙。既然中国人又主动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就又同意恢复会谈，并由双方签订了相应的协议。协议中规定了从中国引进劳动力的数量和工资待遇。我们同意签订协议是因为这个问题是我们先主动提出来的，而现在是北京又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不好后退，不然我们就得作出某种解释，这会恶化我们的关系。

最初我们决定接收 20 万工人，于是中国人开始来到我们这里。但是从我们在北京的交谈中，特别是考虑到他们提出让中国劳力到西伯利亚做工的问题，我们明白了，不该这样做。不久，我们听到一次内容丰富的中国历史讲座，讲到入侵中国的成吉思汗和其他征服者，讲到中华民族是个很坚强的民族，它同化了入侵中国的所有征服者，讲到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相比较所具有的优越方面。毛泽东向我们讲的东西听起来很有意思，但我们自己得出结论：毛看不起其他民族。我产生一种看法，认为在中苏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困难，因为毛有民族主义思想，他认为中国人比所有其他民族都优越。

我们还注意到毛的这样一种品质：他认为没有谁可与他并驾齐驱。就是说他只能同那些承认他高明，不是在法律上而是在对国家和党所面临的问题的理解上遵从于他的人友好相处。我觉得，毛不能容忍为保持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健康关系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即每个国家和每个执政党都占有平等的地位。他妄想得到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

回到苏联后，我们在苏共中央主席团就这个问题坦率地交换了意见。我们的通报引起了大家的担心。我作为代表团团长作了报告。我的看法是：在我们同中国的关系中蕴含着危险的前景，因为毛在评价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作用时和在评价他自己在中国人民的历史中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中的作用时表现得很傲。突出个人就有可能造成两国之间的磨擦，也许还不止于磨擦。因此（大家都同意我的看法）我们应该尽量防止出现这种情况，并要保持这样一种态度：既不要引起什么猜疑，也不要培养他机体中的民族主义毒菌。我们还决定尽一切努力不破坏中国同苏联的兄弟关系并尽可能加强这种关系。

但是我个人有一个看法，我认为很难做到这一点，甚至根本就做不到这一点，因为毛不同意在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集体领导中同其他人居于同等地位，而要求承认他的领导权。在这样的问题上往往难于达成一致意见。在这里一切都取决于个人品质，取决于一个领导人如何对待自己和他往哪个方向作出努力。如果要求的不是实际上的服从，而是通过表现出对历史发展进程和共产党集体所制定的政策的发展的更深入理解来确立自己的主导地位，那是另一回事！然而不是这样。我觉得，毛无条件地把自己确定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这是危险的。

我们在北京的另一些交谈直接涉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我们认为，在同非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建立联系方面做某种“分工”是合适的。由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取得了胜利，所以我们认为，最好是它同亚非拉国家的兄弟共产党建立更密切的联系。此外，按工业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中国更接近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国人民。我们首先指的就是这些国家。我们想留给自己的是加强同西方共产党，而首先是同欧洲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联系。

当我们把这个想法讲给中国同志时，毛反驳说：“不，这不行。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苏联共产党应起主导作用。它有丰富的经验，它曾有列宁，苏共造就了一些对马列主义理论理解得较深刻的干部，而我们没有苏联，根本无法承担这样伟大的事业。其实，我们自己也是在仿效苏联去做工作，向它学习。应当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中心，设在莫斯科。”可是在我听到毛关于承认苏联和苏共主导作用的各种理由时，我无法摆脱这样的想法：这些都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毛想的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他在为自己准备相应的条件。这使我感到很痛心。我感觉到，在我们两党两国之间某个时候会发生磨擦，也许不止是磨擦。我再次声明：这对我来说是很痛心的事情。但是我们也不能像鸵鸟那样把头埋在沙子里，而要直接面对这种危险性。另一方面也告诫自己要尽一切努力消灭这个萌芽，争取在我们两党两国之间保持最好的兄弟关系。

我们回到苏联后，决定更深入地研究一下我们自己的能力。斯大林去世后，我们感到对国家的命运负有很大责任，这迫使我们去更深入地搞懂经济问题，尤其是计划问题。我们确信，认为我们劳力不足的看法是不对的。苏联的劳力甚至还有富余，只不过没有得到合理利用罢了。因此我们就不再需要我们请求中国提供的那么大量数的工人了。第一批工人已经来到我们这里，后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未再表现出主动。好像这种转变定会使北京，使毛向我们所谈的观点得到安慰，但出乎意料，中国人自己开始提醒我们：“你们怎么啦？签了协议却不要工人。不要不好意思嘛！我们愿意给予你们兄弟般的帮助。”

我们向他们说明了情况，在同毛会晤时，我道了歉，说我们过去对进口劳力的需求估计过头了，实际上我们现在不需要这么多。这个历史事件是这样结束的：同中国工人的合同期满后，他们都返回了中国，而我们未再要以前那么大量数的中国工人。我们渐渐有

了一致的看法,认为中国人想用这种方式渗透到我们的远东地区。我再提及一下毛的很有意思的花招:开始他说,我们的建议是对中国人民的侮辱,然后他自己开始要求我们要更多的工人,如果需要的话,他们还可以增加。

我们得出一种看法:北京试图尽可能多地向我们这里移民,“帮助”我们开发西伯利亚资源,以便渗入西伯利亚经济,同化它为数不多的俄罗斯居民,最后从人种角度说西伯利亚就会成为中国的西伯利亚。以后我们的关系恶化时,他们就会干得更彻底,因为当时中国已经对我们的远东地区提出了要求。他们直接没有这样说,但肯定他们也想得到西伯利亚。中国拥有的根据不比苏联少,这一点从他们对苏中边界的看法上,从他们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中和从我们的人同中国人在高层或在群众中的交谈中都可以看出。

这样就出现了我们发生分歧的最初迹象和我们对同中国关系的第一次担心。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些表现出中国民族主义的迹象,发展成了狂妄的侵略性的、伴随有毛个人崇拜的民族主义。我们感到遗憾的是,现实生活证实了我们以前的担心。

在一次会晤中,我们提出了从旅顺口撤走苏军的问题。我们想把除刚刚提供的重武器之外的所有不动产交给中国。毛表示反对,他问现在是否值得这样做?他们担心,美国会利用我军撤离旅顺口的机会,从这个地区入侵中国。我讲了我们的想法:“毛泽东同志,我们怀疑美国能这样做,此外我们还相信他们不会这样做。确实,不可能有任何保证,因为美国在实行侵略政策,朝鲜战争刚刚结束。但是我们把军队调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就在旁边,如果敌人入侵,我们当然要援助你们。”最终,毛同意了,他说:“好吧,既然你们认为美国不会入侵,那我们就不反对撤出你们的军队了。”

这样我们就达成了一致意见,并责成我们的代表起草从旅顺

口撤出苏军的协定。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经常会面),周恩来又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希望你们把炮兵装备留在旅顺口。”我们同意给他们留下装备,但要付钱,而周一再说中国希望无偿地得到这些装备。这是令人不快的问題,不大好答复,但我不得不回答说:“请原谅,我希望你们正确理解我。这些武器很贵,我们可以低价卖给你们,我们想把这些武器按我们提出的条件转给你们。我们同德国进行战争,受到巨大破坏,还没有恢复元气。经济受到破坏,人民生活困难。因此我们请求你们不要再坚持你们的要求了,同意我们的意见吧!请正确理解我们吧!”此事就谈到这儿,北京未再坚持。

我回忆往事,未看文件,因此个别细节可能不很准确,但所列举的事实总的准确性我可以保证。中国人还提出了修建铁路的问题,中国人直接宣称,他们希望有一条经过蕴藏丰富矿物资源的地区的铁路,它大概通到我们在阿拉木图地区的边界上。我们没有表示反对,我们说,如果这条路对你们有利,我们方面将尽一切努力保证修建。后来相应的委员会进行了工作,我们达成了一致意见,中国人将在自己一侧靠自己的力量修建通向我们边界的铁路,而我们在自己一侧修建通向阿拉木图地区苏中边界的铁路。

修建铁路的工程开始了,中国人从他们一侧开始,我们从我们一侧开始。我们一侧的路程较短,地形不很复杂,干部和技术力量都较强,因此我们较快地接近了边界,而中国人还远不可见。当他们的代表又一次来到我们这里时,他们已经开始做具体的工作了,并如通常所说,尝到了梨子的滋味,知道了如何铺路,感受到核桃的坚硬,而要把它咬碎则要有好牙齿。这时他们又通过周恩来提出了那个问题。所有不很令我们愉快的问题,一般他们都是让周提出,第一,他是总理,第二,他更有交际手腕。

周问:“你们也承建我们这一段,你们看怎么样?”这个问题的提出,使我们感到很突然,但我们立即明白了,这是什么意思。我们

暂时不清楚这要花多少钱。估计这是非常昂贵的人情事。这条路要穿过高山、峡谷，需要架多少座桥梁，开多少个隧道，无法计算。这是非常吃亏的事。回答朋友们这个问题是个令人不愉快的任务，这次又落到了我的头上。我说，非常抱歉，这个工程我们现在承担不了。我们连完成自己的任务都很吃力，根本无法承担修建中国一段的任务。其实很明显，不光是要靠我们的力量来进行修建，而且还要由我们支付费用。这个问题就这样取消了。

看来，抛给我们而我们拒绝给以解决的这种问题，像石头一样落在了我们友谊的天平上，落在了那个低了下去而无助于巩固我们的友好关系的秤盘上，出现了使我们的关系变得很沉重的负担。但友谊归友谊，服务归服务。每个政府、每个政府代表都应为自己的国家服务，因此这种事件从原则上讲不应该恶化国家之间的关系，确实发生争吵的主要原因也不在这里，但所有这一切毕竟也加剧了关系的恶化。

现在谈谈中国人对苏共二十大决议和对揭露斯大林滥用职权一事作出了怎样的反应。以刘少奇（好像还有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出席了二十大（原文如此，实为朱德任代表团团长——译者）。他们理解我们的动机，并支持我们的做法。会后，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不止一次地表示支持大会决议。最初我们同中国仍保持着良好关系，尽管我们揭露了斯大林的罪过。现在毛不同意了，他谴责二十大决议，并借用斯大林的做法。毛现在在迫害反对派方而所使用的方法与无产阶级专政毫无共同之处。这是他个人的专政。斯大林那时就是这样干的。他消灭了党的中央委员，消灭了中央、边区、州、市、地区、工厂等的机构的领导人，以及普通的共产党员。

我不认为，我工作那些年在同中国的关系中发生了什么特别的磨擦。我们的相互关系像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关系一样，基本上

是正常的。我甚至可以说要更亲热一些，因为中国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一个过去受到帝国主义压迫的陌生国家，对它很久以前就有一种关切的态度，既关切它的人民也关切他们的领导人。关系恶化是逐渐发生的，但这是感觉得到的。

当时在近东爆发了战争，英法和以色列对埃及发动了战争。它们的侵略行动同匈牙利的悲惨事件相偶合。在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我们需要同中国保持更密切的关系。我们请求北京派一位中国领导人来莫斯科，同我们商定处理同波兰、匈牙利关系的总方针。

匈牙利的事态发展得很快，那里已开始镇压共产党人，枪杀他们、绞死他们，捣毁党的委员会。拉科什请求我们帮助他逃离他的国家，我们给他派去了飞机，他来到了苏联。拉科什被清出领导机构后，格雷成了匈牙利共产党人的首领。我们信任他，他无疑是个好共产党员，是我们的朋友，但在那里谁也不听他的。控制国家的各个机构都掌握在纳吉手里。不知为什么纳吉很敌视苏联，虽然他在我们这里侨居过，并在共产国际工作过。拉科什向我们解释说，纳吉一直持极右立场，虽然他还算是共产党人，并进入了匈牙利共产党和后来的匈牙利劳动党的领导班子。

这样，刘少奇同志就来到了我们这里。好像代表团成员有邓小平和康生。现在邓小平失宠了，我对他的命运一无所知，而康生对我们的态度很坏，他在中国领导班子中是对苏联和苏共很敌视的人。刘少奇是令人喜欢的人，同他可以真正研究和解决一些问题。党中央主席团授权我去进行会谈，我方代表团成员还有波诺马廖夫。我们通宵进行了会谈，讨论了事态发展过程，研究了处理方案，考虑了我们应该采取的措施。

问题很尖锐地摆着，我们要不要在匈牙利采取军事行动？如果不采取，那有什么理由？要知道，反革命势力非常猖狂，匈牙利侨民

已从维也纳回到布达佩斯，要掌握国家领导权。当时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在布达佩斯，他们向我们报告说，那里在进行枪战，展开了搏斗，其他地区看不到这种情况，那里较安定，感觉不到任何敌视苏联和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的特别表现。

同刘少奇讨论匈牙利出现的复杂局势时，我们感觉到两个代表团和两个党彼此是绝对信任的。我们在会谈过程中，一会儿找到一种解决办法，一会儿找到另一种解决办法，一夜里改变了好几次，刘立即同毛联系，向他转告我们的看法。一般说来，我们都取得了他的同意。尽管看法有改变，毛也同意我们在这里，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举行苏中匈牙利问题混合委员会会议时制定的解决办法。我们研究了一夜，最后决定不在匈牙利使用武力，让事态自行发展。我们想相信，那里的内部力量足以能够占据上风，恢复秩序，不让反革命势力夺取政权。一夜里看法改变了几次：要么苏联，要么中国建议动用军队，而另一次则相反。但是，尽管我们摇摆不定，我们争论，代表团彼此之间的关系还是很好的，是建立在互相完全信任和坦诚的基础之上的。

我们在斯大林的别墅和在中国代表团驻地——利普基开会，回家时已是早晨，决定不动用苏军。而就在这个早晨，我们收到来自布达佩斯的报告，说反革命势力已经开始进行真正的大屠杀。他们把共产党人，特别是捷克人和党的领导人倒挂起来，实行了残酷的野蛮的镇压。党中央主席团成员再次开会讨论，后来决定使用武力。但是我们已经同中国达成一致意见：不使用武力。刘早就把这个决定告诉了北京。我方说一套做一套，这不好。刘在这一天晚上要飞回北京，于是我们同他约定，提前到伏努科沃机场，在那里再举行一次总的会谈，我们说，我们想再谈谈我们谈了一整夜的问题。

我记得，我们全体主席团成员都来到了机场，中国代表团也来

了。在一个单独房间里我们举行了会谈。说明了改变我们的看法的原因后，刘表示同意这样的看法：看来没有别的出路，不得不采取极端措施。同时他还表示相信，兄弟共产党和匈牙利人民会明白，这是迫不得已采取的行动，有利于工人阶级，有利于进步力量。要知道，现在很难想象反革命势力在匈牙利站住脚后可能产生什么后果。

中国人飞走了。我们对他们的访问很满意。在我们两党关系中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裂痕。匈牙利恢复秩序后，周恩来来到莫斯科，又由这里飞往华沙、布达佩斯，然后我觉得是去了贝尔格莱德。平息匈牙利反革命叛变后，我们同南斯拉夫的关系又恶化了，虽然关于使用武力一事，南斯拉夫同志，而首先是铁托同志完全同意我们的意见，并赞同采取这种行动。其实，我专门同马林科夫去过他那里商量我们要不要使用武力的问题。

我们对周恩来的到来很满意。我们同波兰的关系很紧张，而中国没有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认为中国是最好的中间人，它能缓解苏联共产党同波兰和匈牙利共产党之间的紧张关系。虽然同南斯拉夫的交往也不是都很顺利，但我们认为，不应去恶化关系，而应寻求使关系正常化，在我们各国共产党之间建立兄弟般的关系的途径。周恩来来到苏联时心情很好，但我要说，已经出现了某种过堂风，好像感觉到有某些裂缝，风是透过这些裂缝吹来的。也许，这是我们过于敏感的缘故！具体没有什么表现，只是我们感觉到谈话语气有些冷淡。不客气地说，现在周发表自己的见解比过去我们同他会晤和交谈时更加不受他人左右了。

对此，我们理解。要知道，同波兰和匈牙利关系恶化归咎于斯大林，当然也归咎于我们。斯大林制造了这种关系，必然在某个时候发生破裂，不能不留痕迹。以前斯大林给波兰、匈牙利领导造成了流血事件，现在我们要为之付出代价。我们需要正确理解我们的

立场，即谴责暴力方式，谴责斯大林行为的立场。我们希望同我们的朋友在平等的基础上恢复正常的兄弟般的关系，希望把我们的关系建立在尊重各国人民和其共产党领导人的基础之上。

关系就是应该在新的基础上实行正常化。因为以前斯大林认为自己是发号施令的人，他说出共产主义运动的规矩，而其余人则应像糊涂虫那样点头，看着他的嘴，只是重复说：“是，是，英明，完全同意。”那时没有更多的要求。但现在需要有另一种关系。如果要建立平等关系，那就要学会听取不顺耳的意见，理解对斯大林所使用的方法的抱怨。这些都落在了我们头上。斯大林煮的一锅发了酸的面糊，在他去世后需要加以清理。

在这里，中国发挥了积极作用。而我们自我感觉不很自在，并发现中国领导人在讨论我们共同的问题时举止有些变化。不过同波兰关系正常化的工作进行得很快。在这里，哥穆尔卡、西伦凯维奇、斯贝哈尔斯基等人有巨大功劳。他们都进入了波兰领导班子。匈牙利的反革命势力被镇压下去之后，那里的局势也很快恢复了正常。匈牙利同志非常理解我们使用武力清除反革命势力，因为那里出现了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但在其他兄弟党出现一些困难。法国、意大利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有部分党员不了解事件实质，公开谴责我们在匈牙利的行动。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其他代表尤其感到难于接受发生的事件。我们同南斯拉夫关系正常化的工作也在进行，我们和南斯拉夫人都从各自方面为此作出了努力。

《中共党史资料》61—70 辑目录索引^①

文献资料

- 致陈乔年等的一封信 王若飞(61·170)
- 旅欧、旅莫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报告 (63·1)
- 林伯渠日记(1935年5—11月) (64·1)
- 中国加入联合国问题与朝鲜问题必须区别开来解决 周恩来(65·1)
- 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声明 周恩来(65·3)
-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纪要
(1928年6月18日) (66·1)
- 中共中央关于正确处理劳资关系发展生产致东北局电 (67·1)
- 《共产党员的修养》报告大纲 刘少奇(67·3)
-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彭德怀的两次讲话 (68·1)
-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年计划
任务的意见书 (69·1)
- 1956—1967年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和中心问题名称一览 (70·1)
- 附: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编制 王晓峰(70·5)

回 忆 录

- 难忘的1945年 李 新(61·1)
- 主持全军训练工作 萧 克(61·32)
- 中共中央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 李 锐(61·54)
- “文化大革命”初期对新闻界的冲击 穆 欣(61·91)

^① 索引分类文章按发表先后顺序排列;标题后面括号内中圆点前数字代表辑号,后数字代表页数。

- “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真相 熊向晖(62·1)
- 抗战胜利时我与港督代表的一次谈判 谭天度(62·55)
- 追记“一二·一”运动 郑伯克(62·70)
- 军事学院八年 萧克(62·102)
- 留法琐忆 郑超麟(63·24)
- 追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期间的几个问题 毛齐华(63·50)
- 50年代初赴苏学医 涂通今(63·65)
- 在西花厅周总理身边工作 吴群敬(63·85)
- 井冈岁月今忆 欧阳毅(64·35)
- 毛泽东与《光明日报》 穆欣(64·50)
- “四清”记 李新(64·85)
- 忆周总理1964年访苏 阎明复(65·7)
- 周总理与松村谦三的三次访华 刘德有(65·20)
- 周恩来与中印关系 李达南(65·38)
- 记周总理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蒋本良(65·54)
- 母亲对周总理的怀念 吴青(65·60)
- 忆陈独秀与安徽党团的建立 濮清泉(66·10)
-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风雨历程(上) 罗章龙(66·17)
- 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的前前后后 唐韵超(66·49)
- 我和“三家村” 李筠(66·58)
-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风雨历程(下) 罗章龙(67·7)
- 反“右派”亲历记 李新(67·34)
- 我和张闻天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生活片断 刘芙(67·44)
- 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政治风云 西门宗华(68·15)
- 关于朝鲜战争与停战谈判 乔冠华(68·24)
- 关于准备理论务虚会的一些情况 于光远(68·34)
- 回顾安徽的农村改革 周日礼(68·41)
- 皖南事变和周恩来的领导艺术 陈舜瑶(69·14)
- 忆日内瓦会议的军事谈判 雷英夫(69·56)

- 关于“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情况…………… 穆欣(69·63)
- 新中国派出的第一批留学生…………… 骆亦秉(70·9)
-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北大工作组…………… 张承先(70·16)
- 《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出台的前前后后…………… 方玄初(70·45)
- 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一个转折点…………… 蒋本良(70·53)

专题资料

- 博古与《解放日报》的四年…………… 陈夕(61·127)
-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和1975年的整顿…………… 程中原(61·137)
- 邓小平支持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 戴煌(61·159)
- 南昌起义军主要领导人、部分参加者脱险行踪考…………… 王玉强(62·125)
- 刘邓大军在鲁西南…………… 田浩存(62·139)
- 毛泽东与“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王骏(62·144)
- 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的金融建设…………… 张晓军(63·119)
-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农业税征收情况…………… 李成瑞(63·132)
- 马林来华与国共合作…………… 王德京(64·127)
- 1925—1926年胡汉民的莫斯科之行…………… 李玉贞(64·146)
- 苏联、共产国际与东北抗日游击战争…………… 郭红婴(64·156)
- 周恩来与人民军队的创建…………… 王植华(65·76)
- 周恩来与1946年的国共谈判…………… 陈浩(65·87)
- 周恩来的非洲十国之行…………… 周溢潢(65·103)
- 邓小平与六大期间的留守中央…………… 牛桂云(66·82)
- 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王文(66·92)
- 炮击金门的决策及其影响…………… 苏格(66·113)
- 知青政策的一次重大转变…………… 史卫民(66·130)
- 取消人民公社的前前后后…………… 黄道霞(67·56)
-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社队企业发展的历史考察…………… 王建梅(67·83)
- 中国共产党与新疆三区革命…………… 祁若雄(67·101)
- 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的历程…………… 高富峰(68·93)
- 刘少奇与解放区的土地改革…………… 杨青(68·107)

“文化大革命”初期党中央健康力量抵制

- “左”倾错误的四次重大斗争 柳建辉(68·124)
- 皖南事变前中共中央对形势的分析 李良志(69·95)
- 抗战后期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始末 袁武振(69·106)
- 建国初期“政务院党组干事会”的演变
及中央人民政府调整的原因 李 格(69·124)
- 50年来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的发展变化 郁曼飞 林晓光(69·137)
- 雷任民与1954年日内瓦会议 王红续(70·63)
- 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始末 卜伟华(70·96)
- 人民解放军“三支两军”述略 邓礼峰(70·128)
- 1975年教育界的斗争 张 化(70·143)

专 稿

- 关于斯诺最后一次访华的几件史实 熊向晖(65·148)
- 我的一点补充 龚育之(65·175)

访谈录

- 流放西伯利亚的25年——访王一同志 王林育(63·105)
- 十月革命与俄国现代化进程——访吴恩远 陈 夕(64·112)
- 在周恩来指导下做地下情报工作
——访沈安娜、华明之 薛 钰(65·63)
- 贵州实行联产承包制的前前后后
——访池必卿 李海文 刘荣刚(68·82)

人物介绍

- 我的祖父孙中山 孙穗芳(61·172)
- 祖父郑洞国的一生 郑建邦(61·175)
- 刘少奇二三事 郑超麟(62·160)
- 谢子长在陕北的最后岁月 郭洪涛(62·163)
- 纪检监察战线上的钱瑛 刘克境 王钧 李捷(63·150)
- 胡耀邦与青年团工作 陈 模(64·171)
- 李硕勋在香港、海南的英勇斗争 何锦洲(64·181)

- 周恩来与曹禺之交 陈刚(65·117)
- 周恩来与袁雪芬 高义龙(65·132)
- 张国焘的弟弟张国庶是怎样被追认为烈士的 钱文益(66·139)
- 邓小平担任过哪些重要职务 王乃德(66·141)
- 周恩来在苏区纠正肃反扩大化错误 辛崇贤(66·157)
- 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记冀朝鼎 廖训振(67·114)
- 韩练成小传 韩毓(67·120)
- 中国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创者——周恩来 熊向晖(68·146)
- 永怀难忘的彭老总 冯征(68·155)
- 高克亭小传 郭洪涛等(68·160)
- 桂北四清时期的陶铸 张汉青(69·160)
- 秦邦宪青年时代的一首诗作 周国昌(69·179)
- 听刘少奇讲他第一次去俄国 温济泽(70·161)
- 西北革命的播火者——王懋廷 高哲中 薛生德(70·163)

史实考证

张国焘另立“中央”与私刻“中央”大印

- 西路军三枚木质“中央”大印由来考辨 曹定云(63·159)
- 对斯诺1936年赴陕北采访出发地的考辨 史纪辛(63·167)
- 关于确定新中国成立的时间问题 钟惠玲(63·171)
- 一个值得查证的重要史实
- 初期推动陈济棠同红军谈判的中共使者 力群(66·166)
- 也谈刘晓何时到上海任地下党负责人 翁三新(66·171)
- 周恩来在日本留学期间住过的地方 张志强(68·166)
- 一张护照的来历 杨德修(69·191)
- 入党誓词演变考 薄金花(69·194)
- 赵世炎是中共一大前党员 鲜于浩(70·171)
-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鲜为人知的外文刊物 程慎元(70·175)

资料文摘

- 我负责一个行动小组抓江青 张耀祠(63·156)

关于旗帜问题的历史回顾 郑必坚 龚育之(64·200)

邓小平何时首次提出“一国两制”的概念? 高 放(64·203)

邓小平与高校招生制度的恢复 何东昌(66·162)

会议介绍

华北财经会议始末 罗一恒(67·132)

扭转东北战局的“七道江会议” 洪英莲 白玉武 于晓航(69·184)

大事记

建国后毛泽东 45 次回湖南纪要 夏远生(67·140)

地方党史

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作用 王 棟(64·190)

信息窗

“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概述 霍海丹(64·219)

新时期党的重要文献出版述略 沈学明 李新芝(67·162)

新时期党史资料的征集 彭咏梅(67·184)

保加利亚出版《季米特洛夫日记》 马细谱(68·183)

《萧楚女文存》简介 米 琳(68·185)

中共党史重要著作、论文目录索引(1997 年)

..... 中央党史研究室图书馆(68·188)

研究动态

战后日本中共党史研究五十年评述

(1946—1996) 张会才 韩凤琴(62·186)

战后日本中共党史研究五十年评述

(1946—1996)(续) 张会才 韩凤琴(63·187)

译文选登

斯大林与蒋经国会谈记录

(1945.12—1946.1) 陈春华译(61·193)

1941 年日本对苏联的立场 姜 杰 左凤荣译(62·169)

二万三千公里的夏日之旅 [越]胡志明著 洪左君译(63·174)

联共(布)领导对国民革命军北伐态度的演变

- [俄]A. И. 卡尔图诺娃著 马贵凡译(64·207)
- 苏中领导人眼中的 1960 年
- [俄]米·尤·普罗祖緬希科夫著 闻一译(65·191)
- 在中国的经历及其他 [越]胡志明著 洪左君译(66·189)
- 施存统与中共日本小组 [日]石川禎浩著 张会才译(68·173)
- 动荡的中苏关系(1942—1944)
- [俄]A. C. 潘友新著 峦景和译(69·198)
- 赫鲁晓夫眼中的毛泽东(一)
- 俄文版《赫鲁晓夫回忆录》选译 马贵凡译(70·181)
- 档案译介**
- 邓小平亲笔填写的一张履历表 薛衔天(65·178)
- 中美关系解冻过程中一份鲜为人知的建议书 资中筠(65·181)
- 有关罗易给汪精卫看共产国际密电的历史档案
- 路 远 选译(66·177)
- 关于 1950 年中苏条约谈判的部分俄国档案文献 沈志华(67·198)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中共党史资料 第七十辑

作者 =

页数 = 2 2 3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目录
正文